

学校代码: 10246
学 号: 10210760018

復旦大學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明代倭患背景下的闽东地区城市地理研究

院 系: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专 业: 历史地理学

姓 名: 蔡志鹏

指 导 教 师: 安介生 教授

完 成 日 期: 2013 年 6 月 2 日

目录

摘要.....	iv
Abstract.....	v
引言.....	1
一、研究动机与意义.....	1
二、学术史回顾.....	2
三、研究史料与方法.....	5
四、研究范围.....	6
五、闽东地区地理概况.....	8
第一章：明代闽东地区筑城时段特点.....	10
一、海防建设时期（洪武元年至宣德十年）.....	10
二、内陆筑城时期（正统元年至嘉靖三十七年）.....	15
三、沿海筑城时期（嘉靖三十二年至嘉靖四十二年）.....	18
四、土堡兴筑时期（嘉靖元年至崇祯十七年）.....	23
五、小结.....	32
第二章：明代闽东地区治所城市形态.....	35
一、宏观择址.....	35
二、官衙择址.....	39
三、轮廓形态.....	41
四、城市规划.....	51
五、小结.....	52
第三章：明代闽东地区军事堡垒与民筑城堡外部形态.....	54
一、卫所城.....	54
二、巡检司城.....	59
三、土堡.....	63
四、复式城市.....	68
五、小结.....	73
结论.....	74

附录一：明代闽东各城营建历史.....	75
附录二：文献所见闽东地区各城池图.....	83
参考文献.....	96
后记.....	103

图表目录

图 1 万历四年闽东地区政区图.....	7
图 1-1 洪武二十年闽东地区海防图.....	14
图 1-2 嘉靖二十八年朱纨巡视福宁州东南地区示意图.....	20
图 1-3 万历年间福宁州土堡分布图.....	25
图 2-1 理想的的城市风水格局.....	40
图 2-2 从福州城外仰视将山体围入城内的城墙.....	43
图 2-3 洪武六年（1373）福州府城复原图.....	44
图 2-4 嘉靖二十年（1541）连江县城复原图.....	45
图 2-5 万历二十二年（1594）福清县城复原图.....	46
图 2-6 弘治十五年（1502）古田县城复原图.....	47
图 2-7 万历三十七年（1609）永福县城复原图.....	48
图 2-8 嘉靖三十四年（1555）福宁州城复原图.....	49
图 2-9 临敖江而建的连江县城墙.....	50
图 3-1 洪武二十年梅花守御千户所城大致范围图.....	55
图 3-2 洪武二十年万安守御千户所城大致范围图.....	56
图 3-3 嘉靖四十年定海守御千户所城大致范围图.....	57
图 3-4 隆庆元年大金守御千户所城大致范围图.....	58
图 3-5 廉村堡轮廓图.....	64
图 3-6 甘棠堡图.....	65
图 3-7 古县三堡图.....	67
图 3-8 嘉靖四十年年镇东卫城与海口民城大致范围图.....	69
图 3-9 方志所见镇东卫城与海口民城.....	71
图 3-10 嘉靖三十七年柘洋堡与东安新堡图.....	72

表 1-1 洪武二十年闽东沿海地区军事堡垒列表.....	12
表 1-2 嘉靖后期闽东地区各治所城市倭患列表.....	21
表 1-3 明代闽东地区土堡列表.....	26
表 1-4 明代后期闽东地区治所城市改筑列表.....	30
表 2-1 闽东地区各县始设年份.....	35
表 2-2 闽东地区治所城市规划列表.....	51
表 3-1 巡检司城的宏观择址与微观地形列表.....	59
表 3-2 明代闽东地区巡检司城规制表.....	62
表 3-3 明代闽东地区土堡形态与规制表.....	67

摘要

本文立足于城市形态的研究视角，通过历史文献的分析与考证，辅以民国实测地图以及 Google Earth 软件，试图厘清明代闽东地区的筑城时段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治所城市、军事堡垒以及民筑城堡三个不同类型的城市形态。通过以上的探讨，本文欲回答三个问题，即：筑城运动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当时人如何处理城市与山的关系？治所城市与军事堡垒、民筑土堡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研究认为，明代筑城运动反映了政府社会控制能力逐渐下降的过程。筑城运动呈现的不仅仅是各地城墙从无到有的演变，更是一处人造景观逐步适应周围地势的过程。此外，从运作情况来考察筑城运动，往往能获得理解一段历史的全新视角。从治所的城市形态研究中，笔者指出地理因素从长时段左右着聚落的择址与发展，文化因素影响了一地政治中心的位置，而社会背景则决定了一地社会对一件事情做出的判断，进而出现不同的结果。最后，本文认为军事堡垒与民筑土堡较治所城市善于利用周围地势筑城，原因在于治所城市在筑城之时触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往往不能有效地施行筑城计划。而复式城市的出现，说明了当地的军政与民政各自为政，缺乏整合。

关键词： 明代 闽东 福州 城市形态 筑城运动

中图分类号：[K928.6]

Abstract

From the urban morphology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period characteristics in East Fujian area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of urban morphology between administrative city wall, military fortress and civil-constructed city wall based on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local gazettes from Ming Dynasty till the present day, supplemented by the interpretation of survey map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and schematic diagram drawing using Google Earth. Following the above discussion, this article serves to answer three main questions, which are: What is the social background behind the fortification movement? How did people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y wall and mountain?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dministrative city wall, military fortress and civil-constructed city wall?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fortification movement during Ming dynasty reflects the decreased social control abil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fortification movement shows not just the erection of city wall from scratch, but how a man-made landscape adapts to its surrounding terrain. Besides, a brand new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certain historical event can be acquired by examining the exact operation of the fortification movem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urban morphology of the administrative cit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geographical factors affect the site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ettlement, whereas cultural factors determine the exact location of the political centr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one region affects the respond of the society to certain events which ends up in different outcome. Lastly,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military fortress and civil-constructed city wall make better use of the surrounding terrain compare to administrative city wall due to the complex social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administrative city. In addi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multiple cities implies the weak integration between military and civil administration in the local area.

Keywords:

Ming dynasty East Fujian area Fuzhou urban morphology fortification movement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number: [K928.6]

引言

一、研究动机与意义

明清方志中设有“城池”一卷，主要记载一地的筑城过程以及城墙规模。此外，“艺文”一卷则收录各地官员、士绅所写的“筑城议”或“修城记”，详细叙述筑城始末、工费以及规划等。笔者在阅读闽东地区方志的时候发现，许多治所城市在明代正统年间的大规模民变后倡议筑城，多数城市则于弘治至嘉靖年间筑城。嘉靖倭患时期，许多治所城市都被攻破。后人在回忆那段历史的时候都提及原城墙未将北面山体围入城中，导致倭寇占据地利优势，轻易攻陷城池。这段历史引起笔者的好奇，衍生出几个问题。什么因素决定了一地城墙的择址？而城市与山的关系是什么？另一厢，闽东地区的沿海巡检司和内地巡检司不同，几乎都筑有城墙。明代后期，闽东地区沿海又兴起了大量土堡。究竟这些军事堡垒与民筑城堡有什么样的地理分布、择址特点以及规制？治所城市、军事堡垒以及民筑土堡三类不同性质的城市之间，又有什么共性和差异？

与上述问题最接近的学术领域，无疑是历史城市地理学。历史城市地理学从历史的纵线揭示现代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并从地域空间的延展和差异说明现存城市在历史上的演进过程。¹对于城墙以及衙署等城市元素的研究，能够较好地直观上阐述这门学科。这类研究即城市形态研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城市形态研究包括城市实体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空间物质形态，而广义的城市形态研究则涉及城市物质形态形成以及背后的社会、政治、礼法等人文动因。²城市是自然和人文相互作用的结果，地貌类型、政治变迁、经济活动、文化思想以及军事控守等因素都会在城市外貌中留下印记。就学术脉络而言，中国的历史城市地理学界于近年来经历两大变化，即：从古都研究深入到地方城市研究以及从单个城市研究转向区域研究。

福建偏处东海之滨，山地丘陵众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这样多山临海的地域特点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颇具价值。章生道先生在谈及古代中国城市以低地为主的选址特征时便以福建作为典型例子，说明即使在多山地形中，古代中国城市还是偏好以河流、溪水以及其他水体沿岸为城址。³在福建各地中，尤以闽东地区最值得重视。以福州为中心的这一地区开发较早，今福州城区的筑城历史更可以上溯到汉代。明代的东南沿海倭患掀起闽东地区多波筑城高潮，在这一历史洪流中，治所城市、军事堡垒以及民筑城堡三类城市应运而生。

¹ 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² 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³ Sen-Dou Chang, "Some Aspects of the Urban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Hsien Capital", I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51, No.1, Mar., 1961, pp.30.

尽管目前已有涉及闽东治所的筑城史研究，但这类研究仅专注于城墙的始筑时间以及地理分布，尚未揭示社会背景对筑城的影响。城市形态研究方面，就笔者所见，仅局限于福州府城。另一方面，近年来不少区域城市形态研究的学位论文相继付梓，但较缺乏比较视角。尽管也有学者重新反思城市形态研究的方法，也有不少观点新颖的著作问世，但学界都认为对于一般府、州、县城的细致考察尚待展开。至于城市与山的关系，学者往往都从山水格局的角度探讨。论及军事控守的著作，多数都肯定山为一地防御的重中之重，却未从筑城过程来考察两者间的关系。

此外，卫所与巡检司一直被视为海防体系研究的一部分，关于制度的讨论方兴未艾，作为实体的城市则未受重视。另一厢，史学界多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研究土堡，而建筑学学者多关注闽中与闽西的土堡，往往忽略闽东地区民筑城堡的价值。笔者认为，卫所城市以及一些较大规模的土堡，同样应该纳入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范畴。正如李孝聪先生所论，许多边城和卫所除了军事防御外，更兼具物资集散、加工以及买卖等社会经济功能。¹除了经济功能外，这些军事堡垒同样拥有城墙、衙署、学校以及寺庙等元素，且规模形制也与治所城市类似，但相关的探讨甚少，仍有研究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大型土堡或民城，尽管初时为当地大姓所筑，但后来成为巡检司驻地，甚至升为县治。²探究这些土堡的外部形态，能够使学界加深对于一地聚落从民属转向官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比较以上三类城市以及与其他区域研究对话，必能总结出古代中国城市的共相，亦能探明古代中国各区域城市的殊相。

有鉴于此，笔者拟重新梳理明代闽东地区的筑城史，厘清治所城市、沿海卫所城、巡检司城与土堡的发展脉络，并着重分析社会背景与筑城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借鉴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以上三类城市的地理分布、择址原则以及城墙規制等问题，藉以为理解古代中国城市提供新颖的视角。

二、学术史回顾

本文要理解的是明代闽东地区城市形态特点，以及其背后的人文动因。与此范围有关的研究成果对笔者多有裨益，大致可分为城市形态综合研究、城市形态区域研究、福州城研究、闽东地区筑城史、闽东地区卫所与巡检司研究、闽东地区土堡研究以及倭患研究七类，兹概述如下。

（一）城市形态综合研究

美国的章生道先生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研究的论文，讨论范围涉及中国古代县城的历史发展、选址与分布、外部形态、内部

¹ 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81页。

² 柘洋堡始建于元末，明正统六年成为巡检司驻地，民国三十四年升为柘荣县。此外，桐山堡于嘉靖三十八年由高家一姓所筑，七年后巡检司入驻其地，乾隆四年成为新设福鼎县的县城。

结构以及主要功能等，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奠基者。¹ 章先生的研究有整体的观照，亦有扎实的史料基础，许多结论至今仍然适用。台湾的陈正祥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文化地理》中设有“中国的城”一篇，同样是古代中国城市形态的开创性著作。² 由于时代局限，陈先生无法对古代城市进行全面研究，只能选取一些主要城市进行测量，一些观点被近期研究修正。马正林先生于九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探讨城市选址、城墙、城市形状以及平面布局等问题，³ 以叙述为主，所举例子多为都城，较少关注地方城市。李孝聪先生则在《历史城市地理》中注意到明代分阶段大规模修筑城池、城市规模突破城墙以及工商业城市大量涌现等特点，并认为明清城市有向礼制传统复归的倾向。⁴ 李先生的观点大多建立在对北方城市的观察上，较少涉及南方城市。近期，成一农先生的《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反思当前城市形态研究的局限，呼吁重视长时段研究、侧重分析区域差异以及结合物质层面与社会背景的研究方法。⁵ 之后陆续发表的文章，也展现了成先生对城市选址以及如何复原城市形态等问题的真知灼见。⁶ 此外，张驭寰先生的《中国城池史》亦述及城池择地、形状、城墙、城门、城内道路、城池与山水的关系以及城内公共建筑布局等城市元素，⁷ 其中包含许多珍贵的实地考察资料供学界借鉴。

（二）城市形态区域研究

近年来，古代中国城市形态的区域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不少学位论文陆续发表，其中包括陈庆江的《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⁸、刘景纯的《清代黄土高原城镇地理研究》⁹、于光健的《清代河西走廊城镇体系及规模空间结构研究——以府州县城为中心》¹⁰、孙长龙的《兰白地区明清时期城市地理研究》¹¹以及张利坤的《明蒙军事冲突下的筑城运动与地方社会——以山西治所城市为中心的考察》¹²。这些区域著作各有侧重点，但囿于篇幅较少相互参照，学界尚无法从中理解各区域城市的特点抑或

¹ 参阅 Sen-Dou Chang, "Some Aspects of the Urban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Hsien Capital", I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51, No.1, Mar., 1961, pp.23-45; Sen-Dou Chang, "Some Observation on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Walled Cities", I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60, No.1, Mar., 1970, pp.63-91; 章生道：《城池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见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第84-111页。

²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第59-100页。

³ 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⁴ 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

⁵ 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⁶ 成一农：《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方法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7卷第1辑，2012年1月，第84-93页；成一农：《中国古代城市外部形态复原方法》，《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第322-335页。

⁷ 张驭寰：《中国城池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

⁸ 陈庆江：《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

⁹ 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¹⁰ 于光健：《清代河西走廊城镇体系及规模空间结构研究——以府州县城为中心》，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¹¹ 孙长龙：《兰白地区明清时期城市地理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¹² 张利坤：《明蒙军事冲突下的筑城运动与地方社会——以山西治所城市为中心的考察》，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总结出古代中国城市的共性。鲁西奇先生的《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区域研究著作。¹作者在质疑“城墙内的城市”的传统看法后，对城外街区以及城内格局等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文中阐释与实践的方法论，使复原古代中国城市形态这一艰巨的任务成为可能。

（三）福州城研究

恕笔者寡闻，目前已知的闽东地区聚落研究，多集中在村镇。²至今尚未见关于闽东地区各治所城市的个案研究，唯有历史悠久的福州城受到学界重视。郑力鹏的《福州城市发展史研究》详尽论述福州城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自制的许多城图，为往后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³刘晓芳的《近现代福州城市形态演变研究》尽管聚焦于近现代福州城，但作者对古代阶段的福州城用力甚勤，深入剖析汉冶城、晋子城、唐罗城、后梁夹城、宋外城以及明府城的外部形态与空间结构。⁴张恒宇的《福州城市历史地理初步研究》继承了郑力鹏与刘晓芳许多关于福州城市形态的观点，结合最新的考古资料阐述，并探讨制约历史时期福州城发展的因素。⁵

（四）闽东地区筑城史

闽东筑城史是研究该地区城市形态的基础，朱维干先生在其名著《福建史稿》中广引史料，详细论述福建沿海卫所、巡检司、水寨以及墩台的设置过程，较少涉及治所城墙修筑以及土堡兴建。⁶尽管如此，朱先生对于倭患事件细致的梳理加深了人们对这一地区筑城史的认识。徐泓先生曾写过《明代福建的筑城运动》一文，其目的是为了反驳一般认为传统的中国城市都有城墙围绕的说法。⁷徐先生征引大量方志，将元元末至明末福建的筑城运动分为四大时期，详录各府、州、县城的筑城与修城时间。徐文不但清晰展现了明代福建城墙从无到有的过程，亦对筑城原因、筹集经费的方法以及一般民众的反应进行探讨，对笔者多有启发。

（五）闽东地区卫所与巡检司研究

卫所城与巡检司城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但过去学界主要将福建沿海卫所以及巡检司的设置作为海防的一部分进行论述。另一方面，学界关于卫所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邓庆平先生曾详细梳理相关学术史。⁸从邓文中清晰可见，学界研究卫所的旨趣集中在军事制度上。尽管也有学者将卫所视为行政区划抑或地理单位，但对于实

¹ 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年。

² 期刊论文有胡亚楠、李华珍：《廉村传统建筑的审美意象透视》，《福建建筑》，2009年第3期，第17-20页；学位论文有洪珍：《福州地区古村镇的历史考察》，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陈春风：《连江古村镇历史文化资源的考察》，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陈宁：《海口古镇历史文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³ 郑力鹏：《福州城市发展史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

⁴ 刘晓芳：《近现代福州城市形态演变研究》，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⁵ 张恒宇：《福州城市历史地理初步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⁶ 朱维干：《福建史稿（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⁷ 徐泓：《明代福建的筑城运动》，台湾《暨大学报》，1999年1期，第25-75页。

⁸ 邓庆平：《明清卫所制度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4期，第14-21页。

体城市的探讨并不多见。就笔者所知，目前已有关于浙江的蒲壮所城以及广东的大鹏所城和南头所城的外部形态研究，¹但福建的卫所城研究则附之阙如，仍停留在史实钩沉以及外部描述的层面。至于巡检司的研究，吕进贵先生的《明代的巡检制度——地方治安基层组织及其运作》是一部史料丰富，且论述全面的著作。²在其关于巡检司的建置、沿革、人事制度、分布区域以及功能的探讨中，有不少以福建为例的说明，对笔者多有启发。此外，伍跃先生的《明朝初年的福建沿海巡检司》详细考证洪武年间于福建沿海设置的诸巡检司，本文亦受益良多。³

（六）闽东地区土堡研究

土堡研究鲜少进入史学界视野，杨国桢先生与陈支平先生于八十年代撰写的《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显得弥足珍贵。⁴作者于文中结合实地考察与民间文献，从社会经济角度探讨土堡的兴起与作用，并根据造型、高度与规模等特点将土堡分成围城式、碉堡式以及家保合一式三大类型。其中，围城式土堡“实是模仿官城结构而筑起的，也可以说是乡族的围城。”之后，两位先生发表《明清福建土堡补论》，根据闽东民间文献《甘棠堡琐记》进一步探讨土堡的对内控制，并指出明中叶发展起来的土堡是乡族势力发展的产物。⁵值得一提的是，福建土堡一直受到建筑学学者的关注，但他们的研究大多聚焦在闽中与闽西山区，较少述及闽东土堡。⁶有的学者在区分土堡类型的时候认为一些规模较大的土堡实为城堡，“实质上就是一个带有城防设施的村镇于聚落。”⁷这类城堡和上述围城式土堡正是本文的研究旨趣所在，但却因为不属于严格意义的土堡而未受到建筑学学者的重视。

（七）倭患研究

明代嘉靖年间的倭患问题，一直是东亚史学界关注的课题。八十年代初，众多学者围绕倭寇的构成、抗倭战争的性质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展开讨论，研究的重心是对于倭寇事件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评价。⁸樊树志先生于新世纪初发表的《“倭寇”

¹ 罗一南、王颖芳、张彦芝：《明代海防所城空间形态特征探析——以蒲壮所城为例》，《建筑与文化》，2011年1月，第100-101页；林怡琳、李伟：《试析岭南海防所城形态的空间表达》，《山西建筑》，第33卷30期，2007年10月，第46-47页。

² 吕进贵：《明代的巡检制度——地方治安基层组织及其运作》，（台湾）明史研究小组明史研究丛刊06，2002年。

³ 伍跃：《明朝初年的福建沿海巡检司》，《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第174-198页。

⁴ 陈支平、杨国桢：《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中国社会经济史》，1985年第2期，第45-57页。

⁵ 陈支平、杨国桢：《明清福建土堡补论》，《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29页。

⁶ 参阅曹春平：《明清时期福建的土堡》，《福建建筑》，2000年第1期，第16-19页；曹春平：《福建的土堡》，《华中建筑》第20卷，03/2002，第68-81页；第84页；潘凯华：《福建土堡探析》，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陈鑫：《福建土堡为代表的传统夯土版筑建造体系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⁷ 楼建龙：《福建土堡建筑综述》，《福建文博》，2009年第1期，第39页。

⁸ 参阅陈抗生：《嘉靖“倭患”探史》，《江汉论坛》，1980年第3期，第51-56页；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王守稼：《试论明代嘉靖时期的倭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第85-97页；陈学文：《明代的海禁与倭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30-38页；戴裔煊：《明代嘉靖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在许多东亚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总结嘉靖年间长达十几年的倭寇事件，认为戚继光、俞大猷“从事的不是一场抵御外患的战争，而是一场平定内乱的战争”，“‘嘉靖大倭寇’的实质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此外，沈登苗先生于 2006 年撰文指出八十年代的许多“新论”其实早在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初见雏形，论点之新颖并不落后于八十年代的日本或台湾学者。¹ 在寓褒贬的论战中，一些学者尝试另辟蹊径，从历史地理角度探讨这一事件。学者冯贤亮、王日根以及沈冬雨分别于《城市重建及其防护体系的构成——十六世纪倭乱在江南的影响》以及《明末至清代诏安地方防御体系设置及其变迁》中探讨倭寇对江南地区和漳州的诏安县造成的冲击以及该地区城防体系的建立。以上研究拓展了倭患问题的研究范围，探讨防御体系与当地社会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

三、研究史料与方法

本研究以文献考证为主，将文献内容整理成表格后，进行归纳与分析。笔者使用的史料主要有以下几类：（一）官修史书——以《明实录》以及《明史》为主。

（二）兵书与文集——包括《读史方輿纪要》、《筹海图编》以及《皇明经世文编》等。（三）旧方志——上至明代，下至民国。与本文主旨接近的资料有其中的“城池志”、“艺文志”中的“修城记”、“筑城议”以及卷首的“城池图”。（四）新方志——自八十年代起，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各县市的方志，是笔者理解明代各城现状的最佳途径。

制图方面，笔者参考鲁西奇先生与成一农先生示范的城市形态复原方法。² 首先从民国实测地图逆推明代后期的城市形态，再将之反映在现代城区图或 Google Earth 上。民国时期，现代城市发展刚起步，基本上还保留帝制晚期的城市形态。因此，当时的实测地图能与明清方志的文献记载相互参照。此外，地名知识也是复原城市形态的重要方法。现代城市中依然保留北门路以及东城路等地名，而环绕老城区的环城路也很可能是古代城墙的遗址，对定位城市形态有莫大帮助。第三，注意现今的军政机构以及学校的位置，因为这些建筑往往沿用明清时期的官地。这些标志性建筑的定位，是考察明代后期城市格局的绝佳途径。最后，重视街巷这一城市中最稳定的元素。中国古代城市内多有十字街或丁字街等主街，与城外较为凌乱的布局形成强烈对比，同样有助于我们辨析城墙内外的界限。

¹ 参阅沈登苗：《一段不该被遗忘的现当代学术史——中国大陆学者独立提出了倭寇“新论”》，《浙江社会科学》，第 2 期（2006 年 3 月）。

² 参阅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 年，第 437-440 页；成一农：《中国古代城市外部形态复原方法》，《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第 322-325 页。

四、研究范围

本研究贯穿整个明代，自明太祖吴元年（1368）平定陈友定起，至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为止，共 276 年。文中所指的闽东地区，即福建“下四府”中的福州府。就政区而言，包括福州府附郭的闽、侯官、怀安三县，以及长乐、连江、福清、古田、永福、闽清以及罗源十县。此外，后来升格为直隶州的福宁县以及下辖的宁德、福安二县一般也属于闽东的范围。

图 1 万历四年闽东地区政区图



（此图以《福建省历史地图集》中编绘的《明代福建宣承布政使司》为底图绘制）

明代闽东地区所见的城市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型为治所城市，即府、州、县官衙的驻地。由于闽县、侯官县以及怀安县均属附郭县，而闽清县迟至清顺治十七年

(1660) 方筑城，因此本文研究的治所城市只有福州府城、长乐县城、连江县城、福清县城、古田县城、永泰县城、罗源县城、福宁州城、宁德县城以及福安县城十座城市。第二类型为军事堡垒，即筑有城墙的卫所与巡检司。卫所方面，笔者研究的范围包括福清县的镇东卫城与万安守御千户所城、福宁州的大金守御千户所城、连江县的定海守御千户所城以及长乐县的梅花守御千户所城。至于巡检司，筑有城墙的有福宁州的水澳巡检司、大箕筭巡检司、清湾巡检司、高罗巡检司、延亭巡检司、长乐县的石梁蕉山巡检司、小祉山巡检司、松下巡检司、连江县的北茭巡检司、福安县的白石巡检司以及宁德县的麻岭巡检司。第三类型则是民筑城堡。文献中的“土堡”一词定义模糊，经常与土楼、碉楼以及寨堡等概念混淆。本文所指土堡也作“民城”，和治所城市一样筑有城墙，主要分布于人烟辐凑之处，城内则分布着不同类型的公共建筑与居民住宅。¹ 纳入本文研究范围的土堡主要是福清县的海口镇民城、福宁州的东安新堡、冷城堡与柘洋堡以及福安县的廉村堡与甘棠堡。

五、闽东地区地理概况

自然地理对闽东的筑城影响颇深，在讨论该地区的筑城过程以及城市形态前，必须理解这一重要“舞台”。另一方面，政区地理亦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为了在稍后清晰展示闽东的筑城过程，笔者拟于简述该区的自然地理之后概括当地于明代的政区沿革。

闽东西枕鹫峰-戴云山脉，地貌类型以山地、丘陵为主，地势由西北向东南渐次下降，中山、低山、高丘陵、低丘陵、台地平原，渐抵大海。福州平原是闽东最大的平原，敖江与龙江下游以及山区盆地内也分布着较多的小片平原；闽江以北地区则平原狭小，山地和丘陵直逼海滨。内陆地区以高丘陵地貌为主，沿海城市除罗源县外，多为低丘陵地区。其中，福清与长乐拥有较多的台地。另一方面，山地地势最高，主要分布在永福、闽清、福安以及宁德西北部。多山的地貌特点使得闽东城市不得不与群山打交道，西北-东南的地势走向也决定了闽东众多河流的流向，形成闽东城市“西北傍山，东南濒水”的特点。

闽东海岸线曲折，港湾发育，半岛众多。福宁州拥有沙垵港、福宁湾、三沙湾、官井洋、三都澳、赛岐港、三沙港以及漳湾港等众多港湾，而福州府自罗源鉴江至福清江兜直线距离尽管只有 118 公里，大陆岸线却长达 800.3 公里。1: 68 的海岸曲折率更是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1: 57）。漫长的海岸线使得倭寇、海盗能够轻易登陆，袭击闽东各地。有鉴于此，明廷于洪武二十年于沿海地区兴筑众多卫所城以及巡检司城，构建防御体系以拱卫东南沿海。

¹ 楼建龙先生曾撰文辨析土堡与土楼、碉楼以及寨堡等的区别。笔者于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土堡概念主要取自楼文对城堡的定义。参阅：楼建龙：《福建土堡综述》，《福建文博》，2009 年第 1 期，第 39 页。

闽东地区靠海，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这一地区雨、干季分明，水分充沛，全年降雨量为 1,100 至 2,000 毫米之间。五月至六月的梅雨季，雨期长，降雨量多且大。夏季则多刮台风，伴随雷阵雨，容易造成洪涝。明清方志中记载许多城墙因洪水而倾圮的事件，与闽东地区夏季多暴雨的气候特征不无关系。

至于政区，闽东曾经历四次调整。洪武元年为 1 府 2 州 11 县时期，福州府属福建布政司，下辖福清州与闽、侯官、怀安、长乐、连江、古田、永福、闽清以及罗源九县，而福宁州则管辖宁德福安二县。洪武二年为 1 府 13 县时期，福清州与福宁州俱改为县。¹ 洪武十二年（1379），将怀安县移入郭内，与闽县、侯官县同为福州府附郭。² 成化九年为 1 府 1 州 12 县时期，福宁县因为“其地接山海寇盗出没，况军卫杂居，县官职卑莫能抗制”³ 而升格为州，下辖宁德与福安二县，另外十县仍属福州府管辖。万历八年为 1 府 1 州 11 县时期，“以省城并设三县不便，乃裁怀安县”。⁴

¹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洪武二年三月庚子”条；《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四，“洪武二年八月庚寅”条。

² 《明史》卷四十五志第二十一，《地理六》。

³ 《明宪宗实录》卷一百十四，“成化九年三月壬寅”条。

⁴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四，“万历八年九月癸未”条。

第一章：明代闽东地区筑城时段特点

明代闽东地区的筑城与军事冲突相始终，治所、卫所、巡检司以及土堡的兴筑与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在探讨这一地区的城市形态之前，笔者拟厘清整个明代闽东地区的筑城历史，以便能深入理解军事冲突这一社会背景与筑城之间的关系。明代闽东地区的筑城历史主要分为四个时期，即：海防建设时期、内陆筑城时期、沿海筑城时期以及土堡兴起时期。

第一节、海防建设时期（洪武元年至宣德十年）

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1368），征南将军汤和与副将军廖永忠从水路击败陈友定夺取福州。¹同年，福州改路为府。洪武二年（1369）五月，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洪武九年（1376），改行中书省为宣承布政使司，治所为福州府。²

明人顾祖禹在谈及闽东地区地理形势之时认为福宁州“独当东南北三面之冲，岛夷入寇，必先犯此，故防为最急也”³，而福州府“扬帆突至，则有海道之虞，踰险飙驰，实切上游之惧，封疆不可凭，山溪不足恃，国门以外皆战场也。”⁴由于地处要冲，闽东地区是福建沿海倭寇肆虐之境。洪武初年，“国珍及张士诚余众多窜岛屿间，勾倭为寇”，⁵闽东地区动荡不安。当时日本正值南北朝时期，倭寇主要是来自日本的亡命之徒、武人、失业人民与商贾，而中国沿海一带的海盗则有张士诚、方国珍旧部以及江浙失业人民。⁶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三年至洪武五年中，倭寇就曾三犯闽东。洪武三年（1370）六月，“倭夷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县。福州卫出军捕之，获倭船一十三艘，擒三百余人。”⁷洪武五年六月，“倭夷寇福州之宁德县。”⁸洪武五年（1372）八月，“倭夷寇福州之福宁县，前后杀掠居民三百五十余人，焚烧庐舍千余家，劫取官粮二百五十石。”⁹稍后，内陆地区同时爆发诸多民变。首先是福州山民“聚众作乱，据白塔岭”，¹⁰之后罗源县、古田县以及永福县相继发生类似暴乱，遭到官兵的镇压。¹¹

¹ 《明史》卷一《本纪第一·太祖一》。

² 《明史》卷四十五《志第二十一·地理六》。

³ （清）顾祖禹撰 贺次君 施和金 校点：《读史方輿纪要》卷九十六《福建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422页。

⁴ 同上，第4381页。

⁵ 《明史》卷九十一《志第六十七·兵三》。

⁶ 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9页。

⁷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八，“洪武三年六月乙酉”条。

⁸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四，“洪武五年六月丙戌”条。

⁹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五，“洪武五年七月丙申”条。

¹⁰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八，“洪武六年正月甲辰”条。

¹¹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八，“洪武六年正月庚午”条；《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一，“洪武六年四月壬辰”条；《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二，“洪武六年五月乙丑”条。

为了应付倭寇的威胁，明廷采取一系列措施。占领福州之时，即设立福州卫。¹洪武四年（1371）正月，置福州卫指挥使司。²由于立国之初根基未稳，明廷在闽东地区只能依托原有的防御性建筑进行军事部署。福州长期为福建的核心地区，元末时陈友定又曾加筑福州城，³因而成为军事防御中心首选。“洪武四年，驸马都尉王恭修修砌以石。六年（1373），福州中卫指挥李惠等重加修治，并建楼橹，周而覆之。城高二丈一尺七寸，阔一丈七尺，周围三千三百四十九丈。凡为门七。”⁴洪武八年，又置福州左卫和右卫以拱卫福州城。⁵此外，福宁县尽管不是府治，但由于山区多盗，海岸线曲折，易为海盗所攻，因而受到明廷的重视。在洪武二年经历海寇的袭击以及洪武三年山寇郑龙、子美的进犯后，福宁县于隔年筑城。“城周三里，高一丈九尺，厚一丈，东北隅穴水门以泄涧水。”⁶

除了在福州府与福宁县筑城以维持秩序，明廷亦在各地要冲设置巡检司协防。洪武元年，宁德知县王子景重建元代所设的麻岭巡检司。⁷隔年，闽县设闽安镇与五虎门门官母屿二巡检司。⁸洪武三年，福安县设渔阳巡检司。⁹洪武六年，长乐县设有石梁蕉山、松下与小祉三个防倭巡检寨司。¹⁰此外，同属沿海县份的福清于洪武十二年（1379）分别将元时的南日、径江以及练门三个巡检司移置劈头山、牛头门以及泽朗山三处。¹¹同年设巡检司的还有古田县的杉洋。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当古田县民廖十等“作乱”之时，杉洋巡检司亦协助福州卫平息叛乱。¹²其他明初所设的巡检司尚有怀安县的五县寨巡检司、连江县的荻芦巡检司与亭角巡检司、永福县的际门巡检司、古田县的谷口巡检司以及福宁县的松山、蒋洋、桐山、西臼、小澜以及库溪六个巡检司。¹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巡检司多沿袭宋元旧制，或因地方不靖而设，并未筑城，仅能平息一方之乱，却无法抵御大规模入侵。

¹ 《明史》卷一百一十七《列传第十八·张赫传》：“洪武元年，（张赫）擢福州卫都指挥副使。”

² 《明太祖实录》卷六十，“洪武四年正月庚庚”条。

³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八，“吴元年十二月庚午”条。

⁴ （明）黄仲昭 修纂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 整理：弘治《八闽通志》卷十三《地理·城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页。

⁵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一，“洪武八年九月癸丑”条。

⁶ （明）殷之辂 修 朱梅等 纂：万历《福宁州志》卷三《建置志·城池》，《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影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⁷ 同4，卷四十三《公署·郡县》，第1240页。

⁸ 同4，卷四十《公署·郡县》，第1151页。

⁹ （明）陆以载 总修：万历《福安县志》卷九《杂纪志·古迹》，《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

¹⁰ （民国）李驹等纂 孟昭涵 修：民国《长乐县志》卷六《城市志·防海各城》，《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页。

¹¹ 同4，卷四十《公署·郡县》，第1154-1155页。

¹²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九，“洪武十四年九月庚申”条。

¹³ 同4，卷四十《公署·郡县》，第1152-1157页；（民国）曹刚 修 邱景雍 纂：民国《连江县志》卷六《城市·堡》，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第56页；（清）辛竟可 修 林咸吉等 纂：乾隆《古田县志》卷二《公署》，《中国方志丛书》（据乾隆十六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51页；同6，卷五《兵戎志上·古巡检司》，第76页。

洪武十六年（1383）以前，明太祖曾尝试通过外交途径解除倭寇威胁。¹ 交涉失败后，更因丞相胡惟庸和宁波卫指挥林贤曾藉日本之助谋反，“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² 洪武二十年（1387），明太祖派江夏侯周德兴经营福建海防：

“戊子，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 其原置军卫，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德兴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视要害。可为城守之处，具图以进。凡选丁壮万五千余人，筑城一十六，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分隶诸卫以为防御。”³

洪武二十年共筑十六座城，且增置四十五个巡检司，奠定了福建沿海防御的基础。但是，由于征用过多壮丁，而筑城时间又如此紧迫，使沿海百姓苦不堪言。海口镇人林以采一语道出了这一劳役的艰辛：“洪武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兴经略海滨，要冲设卫，建城于镇东。三月报竣，役之苛，可知已。”⁴ 就闽东地区而言，移置的不是卫所，而是巡检司，遗下的空缺则由新设的卫所取代。可考者，共五例：长乐县的石梁蕉山巡检司让位于梅花守御千户所，迁至县东南十五都；⁵ 连江县的亭角巡检司迁至二二十八都，原址改筑为定海守御千户所；⁶ 福宁县的西白巡检司则从五十二都改迁五都都的清湾，大金守御千户所在原址上扩建；同属福宁县的蒋洋巡检司从九都迁至十一都的大笕笕，而位于十七都的桐山巡检司则改移十二都的水澳。⁷ 周德兴除调整各军寨寨的位置外，更于闽东沿海地区兴筑一卫城、四守御千户所城与七个巡检司城共十二座城，掀起第一波筑城高潮。兹将洪武二十年周德兴所筑城墙整理成表 1-1：

表 1-1 洪武二十年闽东沿海地区军事堡垒列表

	州县	军事堡垒名	区划	今址
1	长乐县	梅花守御千户所城	二十四都	梅花镇梅城村
2	连江县	定海守御千户所城	二十七都	筱埕镇定海村
		北茭巡检司城	二十六都	苔菴镇北茭村
		亭角巡检司城	二十八都	筱埕镇蛤沙村
3	福清县	镇东卫城	方民、新安二里间	海口镇城里村
		万安守御千户所城	平南里	东瀚镇万安村
4	福宁州	大金守御千户所城	五十二都	长春镇大京村
		水澳巡检司城	十二都	沙埕镇水澳村

¹ 关于明太祖与日本南、北二朝的交涉过程，请参阅黄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与游兵》，（台湾）明史研究小组明史研究丛刊 01，2001 年，第 11-19 页。

² 《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列传第二百十，《外国三》。

³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一，“洪武二十年三月戊子”条。

⁴ （清）林以采 纂：康熙《海口特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03 页。

⁵ （明）黄仲昭 修纂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 整理：弘治《八闽通志》卷四十《公署·郡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153 页。

⁶ （民国）曹刚 修 邱景雍 纂：民国《连江县志》卷六《城市志·堡》，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第 56 页。

⁷ （明）殷之格 修 朱梅等 纂：万历《福宁州志》卷五《兵戎志上·古巡检司》，《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影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第 76 页。

(续表)

4	福宁州	大笱筴巡检司城	十一都	店下镇笱筴村
		青湾巡检司城	五都	三沙镇青官司村
		高罗巡检司城	四十三都	长春镇亭下溪村
		延亭巡检司城	五十都	下游镇延亭村

除了以上诸城外，周德兴还在沿海岛屿烽火门建立水寨。¹关于卫所与巡检司的关系，崇祯《闽书》有细致的描述：

“江夏侯周德兴经营海上，建置卫所，又以临海地疏节阔目，非一卫一所能遥制，更设巡司于瑕隙地，司各有寨城，有官，有射手百，间杂以房帐墩台，斥堠相望，登高望之，若繁星之丽天河矣。...不知巡司络绎，分则自卫疆场，合则并力剿捕，悬军插羽，唇齿相依。又附寨村落，去郡城迢递，有警各携老稚，挟衣粮驰入寨避锋镝，此又坚壁清野意也。”²

另一方面，万历《泉州府志》则概括了沿海军事堡垒与海上水寨的联系：

“卫所、巡司以控贼于陆，水寨防之于海，则知巡司衙门虽小，而与水寨同时建设，所以联络声势，保障居民也。”³

沿海的防御以军卫和守御千户所为主，两者有规模上的差别。由于海岸线绵长，单靠卫所驻防难免有疏漏，因而将巡检司安插在各缝隙间。如果遇到军事威胁，沿海百姓还可以到这些军事堡垒避难。另外，海上又设水寨驻军，定时巡视海上，歼灭欲靠岸的敌人。卫所、巡检司守御沿海，水寨防卫海上，水陆互通声势，形成闽东地区“有一定纵深和层次的防御体系。”⁴

“海防能否产生效果往往因官员素质因地方财政状况等因素而异。”⁵《明实录》中就有多次守将互不支援，以致城池失守的记载。永乐八年（1410），“倭寇攻破大金、定海千户所、福州罗源等县杀伤军民、劫掠人口及军器粮储。后（指挥彭震）不遣兵救援，贼遂乘势攻围平海卫城池，指挥王俊、督战百户缪真等战死。”⁶宣德九年（1434），“西洋山等处海洋有寇船二十余艘，至长门洋劫掠连江县民所运粮米等

¹ 学界对于周德兴设置烽火门水寨多无疑问，而连江县的小埕水寨是否由周德兴所建，由于史料稀缺而无从确定，但学界一般认为该水寨始创于景泰年间，笔者亦从此说。关于水寨的研究，请参阅黄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与游兵》，（台湾）明史研究小组明史研究丛刊 01，2001；黄友泉：《明代前期福建的海防体系》，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第 21-24 页。

² （明）何乔远 编撰 厦门大学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古籍整理研究所 校点：崇祯《闽书》卷四十《捍圉志》，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982-983 页。

³ （明）阳思谦 修 黄凤翔 类编：万历《泉州府志》卷十一《武卫志上·弓兵》，泉州志编纂委员会，1985 年影印汇刊本，第七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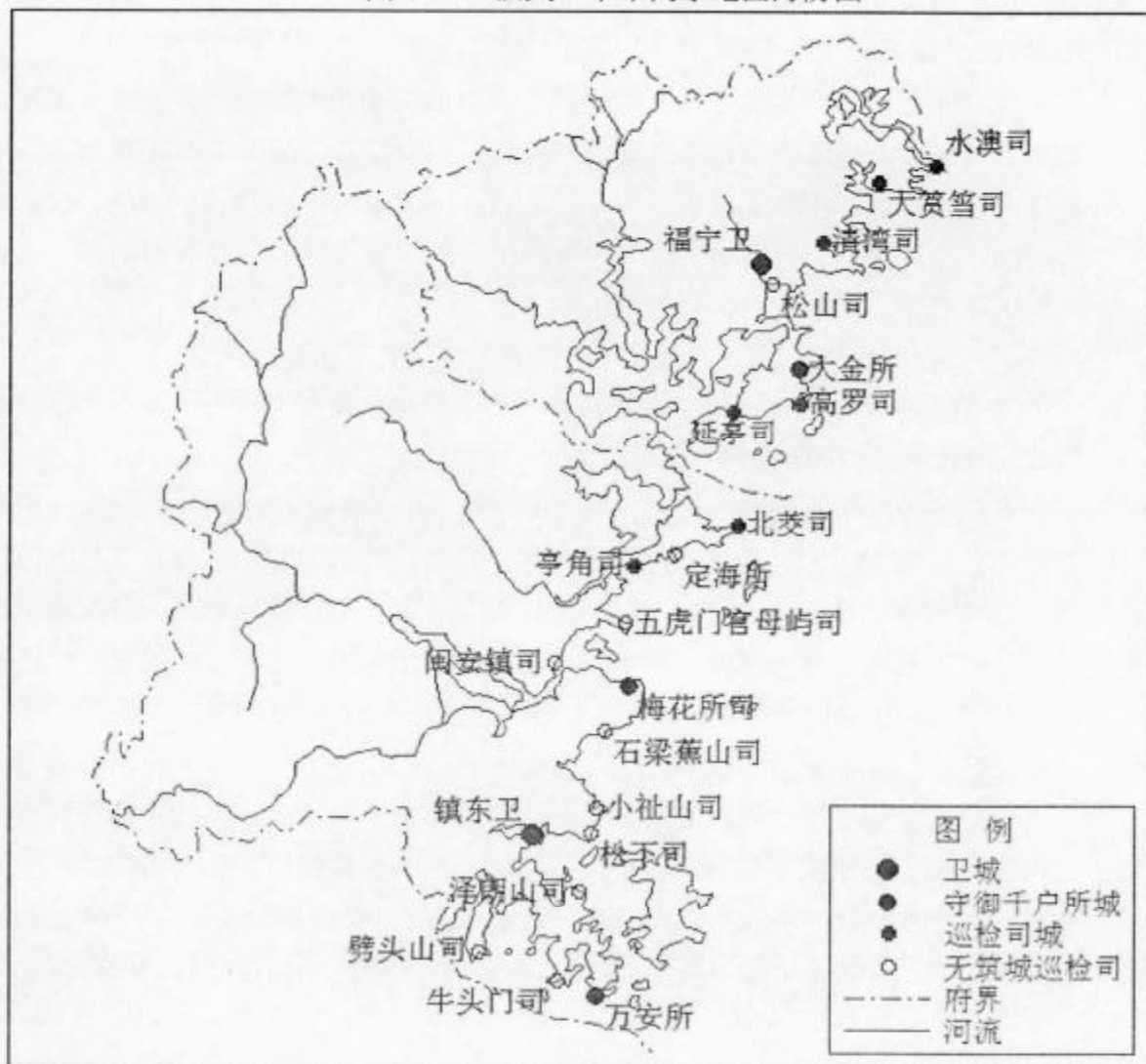
⁴ 范中义先生语。请参阅范中义：《明代海防述略》，《历史研究》，1990 年 3 期，第 46 页。

⁵ 王日根：《明代海防建设与倭寇、海贼的炽盛》，《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第 13-18 页。

⁶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十，“永乐八年十一月癸酉”条。

物。巡海备御指挥朱旺及高罗、松山二巡检司皆不严备，及知寇发又不追捕。”¹ 由于守将的失职，除了几个千户所城被攻破外，倭寇甚至直捣沿海诸县。以往学者多认为自正统朝起，福建的海防体系逐渐废弛。究其原因，主要是军伍空缺、军备破损、水寨内迁以及军无纪律。² 倘若从军事堡垒的运作情况来看，由于人为的疏漏，这一防御体系自创立之初即已破绽百出。

图 1-1 洪武二十年闽东地区海防图



(此图以《福建省历史地图集》中编绘的《明代福建宣承布政使司》为底图绘制)

¹ 《明宣宗实录》卷一百九，“宣德九年三月庚子”条。

² 请参阅黄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与游兵》，《台湾》明史研究小组明史研究丛刊 01，2001 年，第 155-186 页；杨金森、范中义：《中国海防史（上）》，海洋出版社，2005 年，第 135-138 页；朱维干：《福建史稿（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159-166 页；黄友泉：《明代前期福建的海防体系》，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9 年，第 33-46 页。

第二节、内陆筑城时期（正统元年至嘉靖三十七年）

正统元年（1436）至正德十六年（1521），朝贡贸易的顺利进行使得沿海地区风平浪静，¹而此时的内陆山区却因为盗矿、民变而逢多事之秋。根据弘治《八闽通志》“坑冶”部分的记载，明代前中期矿坑、矿场以及矿冶等分布在福州府、福宁州、建宁府、延平府、邵武府以及漳州府六个统县政区。²查当时铁和银的税收情况，福州府、福宁州以及建宁府是铁课钞、铁课以及银课的主要覆盖区域，³这个情况和大部分坑冶的分布重叠，显示闽东和闽北是当时福建的矿产中心。在“土贡”部分的记载中仅有福宁州一州上供折熟铁，⁴这也进一步体现该地区在福建矿业中的重要地位。对比《宋史·地理志》中几乎每一府（兴化军除外）都有矿冶的情况，⁵明代前中期附件的矿产范围明显缩小，且较为集中。当时闽东地区尚有矿产的坑冶有连江县的蒋洋南北山铁坑、古田县的宝兴场、福宁州的黄海梅坑、宁德县的宝丰场、福安县的刘洋坑银场以及上坪坑银场。

正统以降是矿务政策不断更动的时期。矿山时而开启，时而封闭。例如：古田县的宝兴场“宋时发，寻废。国朝宣德间复发，正统初罢。十四年仍发，景泰二年（1451）罢。天顺间又发。”⁶此外，福宁州的黄海梅坑“正统十年（1445）发，十四年（1449）废。”⁷另一方面，在许多山多田少的地区，无以为生的百姓被迫冒险盗矿。这样一来，必然和明廷发生冲突，进而引发民变。闽东邻近浙江南部的处州，当地百姓以挖矿为业，经常盗采福宁州一带银矿。正统三年（1438）五月，“浙江温、处二府青田等县无赖之民潜至福建福安县地方，聚众数千采取银矿，私置兵器出入山林，劫掠民财。”⁸正统九年（1444）七月，“浙江处州贼数百人盗银矿于福建福安之刘洋洋坑，参议竺渊、都指挥金事刘海等率众往捕。渊被杀，海被伤。”⁹不断的冲突最后后演变成由处州人叶宗留领导的大规模民变，波及浙江处州以及福建北部。

这一动乱时期，内陆山区民变有如漫天星斗。正统十年九月，“福建强贼吴子皮啸众肆掠罗源诸处，杀指挥花友。”¹⁰正统十三年（1448）十一月，“福建贼邓茂七密遣人至建宁侦察虚实，寻至福州，为巡哨官军所获，言贼欲以兵攻建宁，又声言于金沙堂聚众夺舟，下福州攻劫。”¹¹同年，“福州、建宁、汀州、兴化、漳州、延平

¹ 杨金森、范中义：《中国海防史（上）》，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137页。

² （明）黄仲昭 修纂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 整理：弘治《八闽通志》卷二十四《食货·坑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6-702页。

³ 同2，卷二十《食货·财赋》，第570-584页；卷二十一《食货·财赋》，第585-598页。

⁴ 同2，卷二十《食货·土贡》，第554-570页。

⁵ 《宋史》卷八十九志第四十二，《地理五》。

⁶ 同2，第697页。

⁷ 同2，第701页。

⁸ 《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一，“正统三年四月壬子”条。

⁹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十八，“正统九年七月己酉”条。

¹⁰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三，“正统十年九月甲戌”条。

¹¹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二，“正统十三年十一月己丑”条。

诸府属县之民，比因盗起，劫掠伤残。”¹ 正统十四年五月，“先是强贼千余徒攻陷福建罗源县及延平巡检司，官军敌死者甚众。”² 同年六月，“福州宁德及罗源、连江等县俱有贼寇为害。”³ 景泰元年（1450），“福州等府、福安等县贼首陈严四等集集徒千余，竖立旗号，伪称大王，劫掠乡村，烧毁房屋。”⁴ 闽东地区除了沿海的闽县、县、长乐以及福清县外，其他地区无不遭遇浩劫。⁵

明廷为了应付内陆山区的民变，将一些沿海巡检司移至强寇潜聚之处。闽东有三例，确定筑城者有二。正统五年（1440）十二月，明廷置竹崎巡检司于侯官县。⁶ 隔年，年，“主簿王纯以其地（柘洋）山寇出没，奏设巡检司于此，以警备之。”⁷ 王纯改筑筑元末袁天禄所筑城堡，新城高一丈五尺，周围二里。成化十年（1474）三月，明廷将福宁县沿海的松山巡检司移至福安县地僻人稀，且经常发生盗矿事件的七都，并将巡检司更名为白石。⁸ 白石巡检司城由参议陈劝创筑，城高一丈二尺，周围两百丈。⁹

从正统至嘉靖年间，风起云涌的民变使各地百姓流离失所。邓茂七领导的民变祸及古田，“民仓促走，庐舍墟，藏蓄抄掠以尽。”¹⁰ 此外，嘉靖年间罗源县曾遭遇两百名盗贼的袭击，“民无所主，率皆挈妻子溃东城去”。¹¹ 在这一动乱时期，百姓自然希望能够筑城。但是，筑城往往需要出资劳力，工事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对于一般人来说是极大的负担。因此，我们从各地筑城议中看到“百姓好佚”的消极抵抗，又或是“民怨如沸”的积极抗议。尽管有论者指出官员可以通过筑城工事中饱私囊，¹² 但是筑城对于大部份县官来说仍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以古田县为例，当地百姓“望城为命，吏以为非我久于处也，置弗闻”。¹³ 县官在一地任职的时间有限，筑城则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因而往往遭到好逸恶劳的他们拒绝。至于城居士绅与商贾，尽管筑城能够保障他们的财产，同时也需要他们大量出资，因而他们以各种理由拒绝。连江县倡议筑城之时，有人就以破坏风水为藉口，认为“连，凤邑也。城则凤不举，其衰矣。”因此，邑人王德溢就批评道：“措大之眼惜经费，荒谬之士泥风水。”¹⁴

¹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二，“正统十三年十一月丙午”条。

²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八，“正统十四年五月壬午”条。

³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九，“正统十四年六月丙子”条。

⁴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七，“景泰元年正月庚辰”条。

⁵ 同上，“景泰元年正月戊子”条。

⁶ 《明英宗实录》卷七十四，“正统五年十二月丙申”条。

⁷ （明）黄仲昭 修纂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 整理：弘治《八闽通志》卷四十三《公署·郡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9页。

⁸ 《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六，“成化十年三月戊申”条。

⁹ 同7，卷十三《地理·城池》，第355页。

¹⁰ （清）辛竟可 修 林咸吉等 纂：乾隆《古田县志》卷二《城池·莆田林俊古田县记》，《中国方志丛书》（据乾隆十六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37页。

¹¹ （清）卢凤琴 修 林春溥 纂：道光《新修罗源县志》卷十六《政绩志·典史》，《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43页。

¹² 请参阅徐泓：《明代福建的筑城运动》，台湾《暨大学报》，1999年1期，第61页。

¹³ 同10。

¹⁴ （民国）曹刚 修 邱景雍 纂：民国《连江县志》卷六《城市·城·明邑人王德溢荒城初议节录》，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第54页。

由上可知，筑城之议的矛盾往往在于人们渴望安定，却又担心吃亏。利益与安全之间的权衡，各地不同势力都有各自的盘算。¹事实上，明廷的决议才是筑城的关键所在。正统五年三月，福宁、镇海二卫城以及大金、定海二所城由于“旧以碎石垒之，时时损坏”，获准“造砖裹其外为经久计”。²显而易见，在爆发大规模民变前，明廷的筑城政策仍以修复沿海卫所为主。明中期民变频仍，致使明廷不得不开始重视沿海城市的防御。景泰元年三月，“命筑福建古田、宁德二县城。宁德因旧基址，古田新筑之。”³自弘治朝起，各地都提及明廷诏令筑城一事。古田故老林堪于弘治年间提到“今天子留意城诸县，古独无举焉”，⁴邑人罗荣亦提及“弘治初政屡诏被兵所在亟修城池”，⁵而长乐县人郑世威也述及“弘治庚戌，上虞潘公府奉例始城之”。⁶

连江县人王德溢于嘉靖年间曾概括这一时期内陆山区的筑城情况：

“连在省治东北，东入海则淼茫无际，西北一带为宁德、罗源、古田、寿宁，接壤万山深穹，直连温、处二州，盖自古田迤北，民盗相半矣，故西北之县皆有城。”⁷

连江县治近海，西北面的福宁州、福安县、宁德县、古田县以及寿宁县地处山区，又是银矿产地，经常被温、处一带的矿寇袭击，宣德朝至弘治朝间就发生了数十起因盗矿而杀伤当地老百姓的事件。有鉴于此，福宁县于成化九年升为州，统辖宁德与福安二县。此二县同时于正德元年筑城。宁德县“累砖为城，周六百三十一丈三尺，高一丈五尺，厚七尺。…为门五。”⁸福安县“累砖为城，周八百九十六丈五尺，高一丈一尺。…开五门。”⁹古田县于弘治十五年方筑城，“城西北跨山，东南濒溪。广袤七里，高一丈七尺，厚一丈，周围一千三百丈有奇，为门四。”¹⁰事实上，靠海的罗源县迟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才筑城，王德溢所述的罗源县城在此前“旧制狭隘卑琐”，并无实际防御功能。¹¹另外，同处内陆的永福县则于嘉靖三年筑城。¹²

¹ 黄敬斌先生对于江南的个案研究有详尽的解释。请参阅黄敬斌：《利益与安全：明代江南的筑城与修城活动》，《史林》，3/2011，第1-11页。

² 《明英宗实录》卷六十五，“正统五年三月己未”条。

³ 《明英宗实录》一百九十，“景泰元年三月乙卯”条。

⁴ （清）辛竟可 修 林咸吉等 纂：乾隆《古田县志》卷二《城池·莆田林俊古田县记》，《中国方志丛书》（据乾隆十六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37页。

⁵ 同上，第36页。

⁶ （民国）李驹等纂 孟昭涵 修：民国《长乐县志》卷六《城市志·县治城池·邑人郑世威前筑城记略》，《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⁷ （民国）曹刚 修 邱景雍 纂：民国《连江县志》卷六《城市·城·明邑人王德溢荒城初议节录》，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第54页。

⁸ （明）殷之格 修 朱梅等 纂：万历《福宁州志》卷三《建置志·城池·宁德县》，《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影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⁹ 同上。

¹⁰ 同4，第35页。

¹¹ （清）卢凤琴 修 林春溥 纂：道光《新修罗源县志》卷八《城池志·城垣·徐必进重修罗城记》，《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40页。

¹² （明）唐学仁 修 谢肇淛等 纂 永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万历《永福县志》卷一《地纪·城池》，万历四十年（1612）抄本，福州：海峡书局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王德溢提及各山区治所筑城之事，是因为连江县也曾遭遇邓茂七之乱。¹另外，同属沿海县份的长乐与福清也不是安平乐土。明人陈仕贤认为福清县“滨海為邑，舟上下广、浙，群不逞凭之出没，固要害之地也。邑虽未始有城，然曲防尽制，守在四境。”²清人刘沂则在回顾长乐县的筑城史时认为迟筑城的原因是“长乐于闽称外邑，初未营城，守在四境”。³在当时人眼中，尽管地方不靖，但由于沿海地区遍布军事堡垒，所以没有筑城的必要。海防体系与城防的互见消长，在沿海地区最为明显。

第三节、沿海筑城时期（嘉靖三十二年至嘉靖四十二年）

如前所述，学界一般将正统以降沿海防御体系废弛的原因归结为军伍空缺、军备破损、水寨内迁以及军无纪律。前已提及，守将的漫无纪律导致沿海各卫所、巡检司自创立之初即孤立无援，不能有效地防御绵长的海岸线。至于水寨内迁，实肇始于正统九年。福宁州的烽火门水寨原设立于三沙海面。后来，“侍郎焦宏以其地风涛汹涌，泊舟不便，命移于今所（州东一都松山）。每岁分福州左、中、福宁三卫官军更番以备倭寇。”⁴《筹海图编》云：“后官井洋虽添设水寨，而沙埕、罗江、古镇、罗浮、九澳等险孤悬无援，势不能复旧矣。”⁵尽管在烽火门水寨内迁后另有官井洋水寨之设，但已无法像明初一样防守海岸线。许多地方势单力薄，无法抵挡大规模的攻击。

水寨内迁的弊端，往往与军伍空缺以及军备破损交织在一起。这一点从嘉靖二十八（1549）年巡抚朱纨对福宁州一带的巡视一目了然：

“查得旧烽火门水寨、原在本州五六都三沙海边。后以风涛不便泊船，徙一都，地名松山，为今烽火门，南跨官井洋一百二十里，北距沙埕澳一百六十里。节因倭夷寇扰，议抽福州左、中卫并福宁卫大金所官军添守，分拨沙埕澳为北哨，官井洋为南哨，本寨实居中兼制之。后以会哨不常，兵船遂废，以致沙埕失守。海寇内侵，流江等都致被兵燹，愁苦莫甚。... 查得大金所军士四百八十名，除老弱并出海等差外，见在二百七十名。原拨烽火门出海余丁二百二十五名，除该寨存留六十名，外更一百六十五名，奉革空闲。... 随该知州孙勋会同指挥张栋，即于本月十三日，由本州沙洽湾乘船，历览官井洋、并宁德县界溪、福安县古镇门、罗源县鉴江湾、濂湾门等处大势。... 地方金谋既同，乃由故道回至东冲郑家。又

¹（民国）曹刚 修 邱景雍 纂：民国《连江县志》卷六《城市·城·明邑人王德溢荒城初议节录》，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第54页。

²（清）饶安鼎 邵应龙 修 林昂 李修卿 纂：乾隆《福清县志》卷十一《艺文志·福清县城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刊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

³（民国）李驹等纂 孟昭涵 修：民国《长乐县志》卷六《城市志·城池·刘沂春后拓城记略》，《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⁴（明）黄仲昭 修纂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 整理：弘治《八闽通志》卷四十三《公署·郡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3页。

⁵（明）郑若曾：《筹海图编》，《中国兵书集成（第15-16册）》卷四《福建事宜·烽火门水寨》（据明嘉靖四十一年胡宗宪刻本影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辽宁：沈阳书社，1990年版，第356页。

访得本处先于嘉靖二十四年，曾被海贼登岸攻劫。彼因众御不下，贼乃潜从东冲前湾进入，放火烧焚。乃又亲行到彼，看得面有海沙空地，尽亦平阔。上有荒枯田地一带，亦甚夷坦，似可建立巡司。遂由此处转历官、赤二崎、长沙、下埔等，阅视外海形势。经延亭旧巡司废城，尽为荆藎所蔓，乃令弓兵砍辟一路，实见基址尚存。但本地多山，民居隔远，止有湾民郑瀚等一二人。告愿置复本司，缘看大逼海滨，势实孤悬，难以独立。乃又乘舟由海洋至罗浮澳，即南畔中哨之地。... 不十里即为閩峡湾，闻各官军往多退即此湾住坐，不在罗浮。以致去年黄禄等家，遂为夷船抵岸，海墙亦被攻破。... 本湾又十里至大金千户所，又二十里踰积石，即为高罗巡检司。原有旧城，视延亭尤颇完固，附近亦有人家。以上二司，近议迁改延亭于北港，高罗于閩峡。各地方置立，俱各见在兴工。然北港则僻在里洋，閩峡则人烟稠密，且习与海贼角敌，人各知兵。官军置此，实为虚冗。延亭似应于东冲前湾设立，以与官井洋水寨互相为依。高罗似当修复旧城，以卫该都百姓。”¹

烽火门水寨自从内迁至岸上的松山以后，由于防御纵深缩小，必须分散兵力以驻守北面一百六十里的沙垵以及南面一百二十里的官井洋。后来因为不常出海巡逻，以致兵船等军备不堪使用，甚至还导致沿海的沙垵、流江等地遭倭寇劫掠。除了由烽火门水寨派遣在外的一百六十五名守兵无所事事外，大金千户所城驻防的士兵仅四百八十名，还不及原额的一半。² 其中，老弱残兵以及外出者就有二百一十名。兵源的短缺让倭寇有机可趁，该地的东冲就曾于嘉靖二十四年遭倭寇潜入，焚烧殆尽。至于巡检司城，也是满目疮痍。延亭巡检司城一片荒凉，待弓兵披荆斩棘之后，见到的只剩基址。由于防御体系的崩溃，该地许多聚落人烟稀少，官军都往稠人广众的閩峡避难。

对于这一现象，嘉靖三十一年（1552）巡视浙江与福建的王忬曾严厉批评：

“查得沿海卫所并守寨军人，多有壮健可用者。但管领官员畏避损军之罪，遇有寇警，不敢轻发一卒，以闭城坐视为保全，以募民代戍得策，姑息各军，无异骄子。已而卖放挟制，情弊日繁，使国家百八十年养军之费，竟成虚名。”³

在《议筑城垣疏》中，他曾提及浙江的抗倭情况：

“臣会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林公莅浙，数议筑城堡。浙中士大夫或为不便，不肯筑。后彼倭患，乃悔之。看得前项县治切海患，城垣之设，本不容已。往时海防严密，列卫所以保内民，修水战以捍陆地，以故邑城不设，居民安堵。迩来兵伍缺耗，战备废弛，沿海卫所，每遇贼至，类皆闭城自守。纵贼长驱，致貽地方之祸。”⁴

¹ 《皇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六，“朱中丞黻余集二·议处海防事添设兵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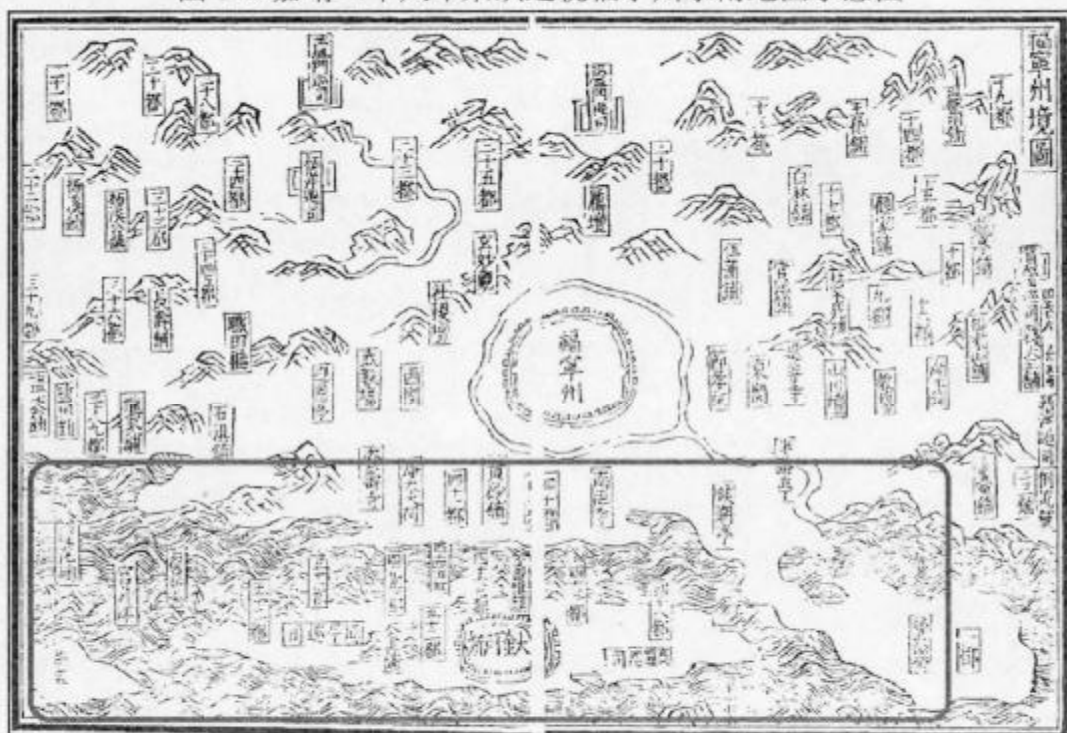
² 大金守御千户所的操、屯、旗军旧额为二千一百二十名。请参阅崇祯《閩书》卷四十，“捍围志”。

³ 《皇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八十三，“王司马奏疏·处条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

⁴ 同上，“王司马奏疏·议筑城垣疏”。

在他看来，国初海防严密，卫所以及水寨皆能有效地守御沿海，所以没有兴筑城墙的必要。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嘉靖年间的卫所至多只能闭门自守，使得倭寇能轻易登陆，四处劫掠。浙江遭遇倭患较福建早，当地士大夫因先前不肯筑城而遭兵燹之厄，后悔不已。对此现象，分巡宁德道金事舒春芳也有类似的想法。在他看来，“国初倭数入寇，民甚苦之，乃建卫设巡司、水寨，倭入辄有创去。历今治久，卫所无驾捕之实，巡司习卖放之敝，水寨不闻邀击之能，是以倭奴始野，略久则窥伺城矣。”¹

图 1-2 嘉靖二十八年朱纨巡视福宁州东南地区示意图



(取自(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四，“福建沿海总图·福宁州图”。)
(注：此图方位为上西下东)

有鉴于此，王忬于福建沿海的罗源、长乐与福清三县筑城。嘉靖三十二年（1553），“巡抚王忬巡按赵孔昭请城长乐，遂发公帑金万二千余，缙知县詹莱董其役，越十月而功成。城高一丈五尺，厚一丈，周千肆十五丈有奇。”² 嘉靖三十三年（1554），“海上有警，巡抚王忬奏请城滨海诸邑，因城福清。高一丈八尺，厚一丈四尺，周九百九十三丈。”³ 四年后，罗源县由于嘉靖初年所修城墙仅以碎石堆叠，

¹ (明)陆以载 总修：万历《福安县志》卷八《文翰志·疏奏略·重筑县城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

² (民国)李昉等纂 孟昭涵 修：民国《长乐县志》卷六《城市志·城池》，《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³ (清)饶安鼎 邵应龙 修 林昂 李修卿 纂：乾隆《福清县志》卷三《建置志·城池》，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刊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页。

“诸生陈公达、郑时则等鸣于官，巡抚王忬檄徐推官必进拓而筑之。延袤三里许，新辟八百余丈。高一丈五尺，厚一丈一尺。”¹此外，连江县则于嘉靖十九年（1540）筑城。城高一丈五尺，广一丈，周围九百丈有奇。²

自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倭寇进犯福宁州城与宁德县城起，闽东的倭患逐渐扩大。直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戚继光两番援闽，取得多处大捷后，闽东的倭患才平息下来。³期间，倭寇总共进攻闽东各治所城市二十五次，连江县、福清县、永福县、宁德县以及福安县纷纷陷落（参见表 1-2）。嘉靖三十八年（1559），福安城陷后百姓四散，世族也因城未修复而不敢复居。半年后，知县卢仲佃单车赴任，见到的是“疮痍满目，蓬蒿没腰，呻吟籲号之声接乎远迩”。⁴至于宁德县，嘉靖四十年（1561）十月城陷后，“男妇被戮及赴水死者无算。贼屯于城，九日乃去。官舍民居及库藏案卷、旧家法物载籍悉为灰烬。”⁵倭患使得当地户口锐减，城乡受到巨大破坏。对于闽东地区的重创，可见一斑。

表 1-2 嘉靖后期闽东地区各治所城市倭患列表

	城名	倭患年份	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1	福州府城	嘉靖三十七年				/								
		嘉靖三十八年							/					
		嘉靖三十九年			/									
2	长乐县城	嘉靖三十七年					/							
		嘉靖三十八年				/								
3	连江县城	嘉靖三十六年									/			
		嘉靖三十七年				X								
4	福清县城	嘉靖三十七年			X	X	X							
		嘉靖三十八年			/	/								
5	古田县城	嘉靖三十八年												
		嘉靖四十二年												
6	永福县城	嘉靖三十八年					X							
		嘉靖四十年												
		嘉靖四十一年												

¹（清）王楠 修 林乔藩 纂：康熙《罗源县志》卷二《建置·城池》，《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51 页。

²（民国）曹刚 修 邱景雍 纂：民国《连江县志》卷六《城市·城》，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第 54 页。

³朱维干先生对福建的倭患过程有细致的叙述与分析。请参阅朱维干：《福建史稿（下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第 133-231 页。

⁴（清）张景祁 修 黄锦灿等 纂：光绪《福安县志》卷五《城池·郭文周军筑福安县城记》，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版，第 477 页。

⁵（清）卢建其 修 张君宾 纂：乾隆《宁德县志》卷十《拾遗志·祥异》，乾隆四十六年（1781）刊本，第八页。

(续表)

7	罗源县城	嘉靖三十七年												
8	福宁州城	嘉靖三十五年			/									
		嘉靖三十八年			/	/								
9	宁德县城	嘉靖三十五年			/									
		嘉靖四十年			/					X	X	X		X
10	福安县城	嘉靖三十八年				X								
		嘉靖三十九年				/								
		嘉靖四十一年												

(注：“/”代表攻城，“X”代表破城。)

笔者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倭寇入侵的时间与闽东地区的雨季吻合。倭患集中在农历三至五月，而八月至十月也有零星的滋扰。明代海防多以“三、四、五月为大汛，九、十月为小汛”，¹因为这段期间正刮东北风，有利于倭寇从日本乘风而至。同时，农历三月至五月也是闽东地区降雨量较高的时段，容易造成洪涝。嘉靖三十八年三月，正当福宁州维修城墙之时，“夏风雨暴霪城，圯者三之一。维时倭逼近郊，人益汹涌，都阃张汉，树木栅与堞並埒。贼知有备，遁去。”²同年四月，福清县“梅雨浸淫，北城倾倒四十余丈。罗公急赏浙、浦二兵，随布木栅完整，虽堞夫有不之知，幸贼不窥城，不知城倾。偶晴可守，此天不更困吾民也。”³倭患与雨季的双重打击，使得闽东城防雪上加霜。

此外，跨北面山体筑城与否，对一地城防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洪武四年，驸马都尉王恭增拓福州城时，即因元故址改筑，北跨越王山。嘉靖三十七年，巡抚王忬遣其子到罗源相度城址，认为“城迤东而北，势尚崑阻，宜循其旧址拆而葺之，使崇且厚”。新城“遵北而西，凭枕冈峦”，将部分西北山丘围入城中。蒋坑至白云坑即为新址，较旧址宽八百余丈。⁴此外，古田县则在筑城之始即跨西北之山。以上三个治所城市曾于嘉靖年间遭遇倭寇的威胁，但都婴城固守，免于兵燹。福州府为福建省会，城高且厚，倭寇尽管几度围城，也只能望城兴叹。⁵嘉靖三十七年，有倭寇万余自宁德进犯罗源，县令武瀛凭新城严守，无机可乘的倭寇不久即撤离。⁶古田县令陈翀曾于

¹ 《明史》卷九十一志第六十七《兵三》。

² (明)殷之格 修 朱梅等 纂：万历《福宁州志》卷十四《艺文志下·修城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影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页。

³ (清)饶安鼎 邵应龙 修 林昂 李修卿 纂：乾隆《福清县志》卷二十《杂事志·倭难纪略》，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刊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10页。

⁴ (清)王楠 修 林乔藩 纂：康熙《罗源县志》卷二《建置·城池》，《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

⁵ (明)林嫌等 纂：万历《福州府志》卷三十四《时事》，《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16-317页。

⁶ 同4。

于嘉靖年间建敌楼于城西北隅，之后县令王所又增高城垣，因而能在倭寇兵临城下之时予以痛击。¹

另一方面，许多治所城市由于将北面山丘置于城外，在嘉靖倭患期间遭遇沉重的打击。嘉靖三十七年，倭寇攻福清县北门，“登山放铳，连毙二人。守者奔溃，城遂陷。”² 福安县于一年后面面对相同的威胁，万历《福安县志》载有当时的城防状况：

“贼据我北城外虎山岗及西城龟肩、东门外鹤山山顶，乘高注矢。鉄鑕铅铳，两下蟄集，生员郭大科捐金募死士，裹粮督战。郭大乾奋身射贼，中炮而死。至午，矢石俱竭，北城垛崩，贼遽入。”³

倭寇占据城外北面山丘，得以俯瞰城中虚实。鸟铳等远距离武器，对于守城方的杀伤力极大。明人林希元曾比较过弓弩与铳炮的射程，认为“夫兵有短长。铳炮视弓弩为长，弓弩视戈戟为长，戈戟视刀剑为长。长以制短，短以卫长。机铳力至五百步，弓弩力至一百二十步。”⁴ 此论或许稍显夸张，但鸟铳射程远胜弓弩确是事实。嘉靖倭患期间，明军行旅配有鸟铳，但一般县城则不多见。倭寇一旦以鸟铳击毙守城者，便能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轻易破城。遭遇类似情况的还有福宁州。嘉靖三十八年进犯的倭寇，曾两度占领城北的金字山，“箭铳入于城中，守垛有伤者”。⁵ 永福县于同一年遭遇倭寇，守方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西、北两面的守军因为追击倭寇而使三铺空虚，倭寇趁虚而入，轻易破城。⁶ 此当与西北面山丘易窥城内有关。

第四节、土堡兴筑时期（嘉靖元年至崇祯十七年）

除了治所城市外，倭寇还四处劫掠沿海地区村镇。当中，又以福宁州本州的情况最为惨烈。万历《福宁州志》当中记载嘉靖三十一年至四十三年该州村镇的倭患，共计十一次：⁷

1. 嘉靖三十一年六月，倭百余掠古县。
2. 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倭万余扎营三沙。是月，倭万余攻秦屿堡。
3. 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倭攻閩峡堡不克。
4. 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倭寇复攻秦屿堡不克。

¹ （清）辛竟可 修 林咸吉等 纂：乾隆《古田县志》卷二《城池》，《中国方志丛书》（据乾隆十六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35页。

² （清）饶安鼎 邵应龙 修 林昂 李修卿 纂：乾隆《福清县志》卷三《建置志·城池》，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刊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³ （明）陆以载 总修：万历《福安县志》卷九《杂纪志·夷》，《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⁴ 《皇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六十五，“林次崕文集四·上巡按二司防倭揭帖防倭”。

⁵ （明）殷之辂 修 朱梅等 纂：万历《福宁州志》卷十六《杂事志下·时事》，《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影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11页。

⁶ （清）陈焱 修 俞荔 纂 永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乾隆《永福县志》卷十《杂事·灾祥》，乾隆十四年（1749）刊本，福州：海峡书局出版社，2011年版。

⁷ 同5，第410-412页。

5.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倭寇破桃坑寨。
6. 嘉靖三十七年八月，连攻柘洋堡不克。
7.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倭寇流劫四、五、六、七都。
8. 嘉靖四十二年五月，倭寇流江、沙埕。
9. 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南贼十余船乘夜劫松山，掳男妇百余人。
10.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倭破棠村堡。
11. 嘉靖四十三年四月，参将李超破倭贼千余于水澳。

以上遭受倭患的村镇可分为三个主要地区（参见图 1-3）：第一区是治所东北端沿海的三沙、秦屿、四都至七都、流江、沙埕、松山以及水澳，第二区则为治所东南端东冲半岛上的古县和閩峡，都是朱纨曾提及容易受敌的两大地区。第三区则是柘洋以及桃坑，位于福宁州山区。在官方防线全面崩溃，倭寇肆虐的威胁下，民间只得组织防卫，守护自己的家园。

秦屿是福宁州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朱纨在巡视自沙埕至松山的海岸线后便认为“秦屿居民颇众，尚能抗御。其余各都人烟既少，势已不敌，足持自家门户，幸矣。”¹在周围罕见人烟的处境下，秦屿势如孤岛。嘉靖十七年，土官陈登倡建秦屿堡，是为闽东始筑较早的土堡。²嘉靖三十五年十月，万余倭寇进攻秦屿堡。邑人程伯简率领堡内居民抵抗倭寇，“编甲伍，选游兵精壮者守前，口弱者次之，妇女裹首运石，传餐立于后。”³在秦屿堡民顽强的抵抗下，倭寇连番挑战七个昼夜，都无法攻入堡内。两年后倭寇曾复攻秦屿堡，同样无法攻破堡民严密的防守。

除了秦屿堡外，閩峡堡在抗倭的过程中亦起到重要的作用。邑人林爱民在《赤岸堡记》中曾指出“閩峡之整也，亦是得人和以雄地利，故能寒贼胆而保金汤也。”⁴朱纨曾提到当时有将巡检司迁至閩峡的建议，在巡视的过程中他也看见正在兴工的城池，足见当地的地理优势。此外，他也注意到当地人擅于和海盗作战的能力以及人烟稠密的特点。閩峡堡于嘉靖三十五年挡住倭寇的攻势，或许与这一点有关。此外，处于福宁州山区的柘洋居民也在嘉靖三十七年中借助柘洋堡防守而幸免于难。柘洋堡筑于元末，当时的中书参政袁天禄筑堡以守卫州境。正统六年，柘洋巡检司置于此堡当中，并于该年重修。⁵

¹ 《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六，“朱中丞翥余集·议处海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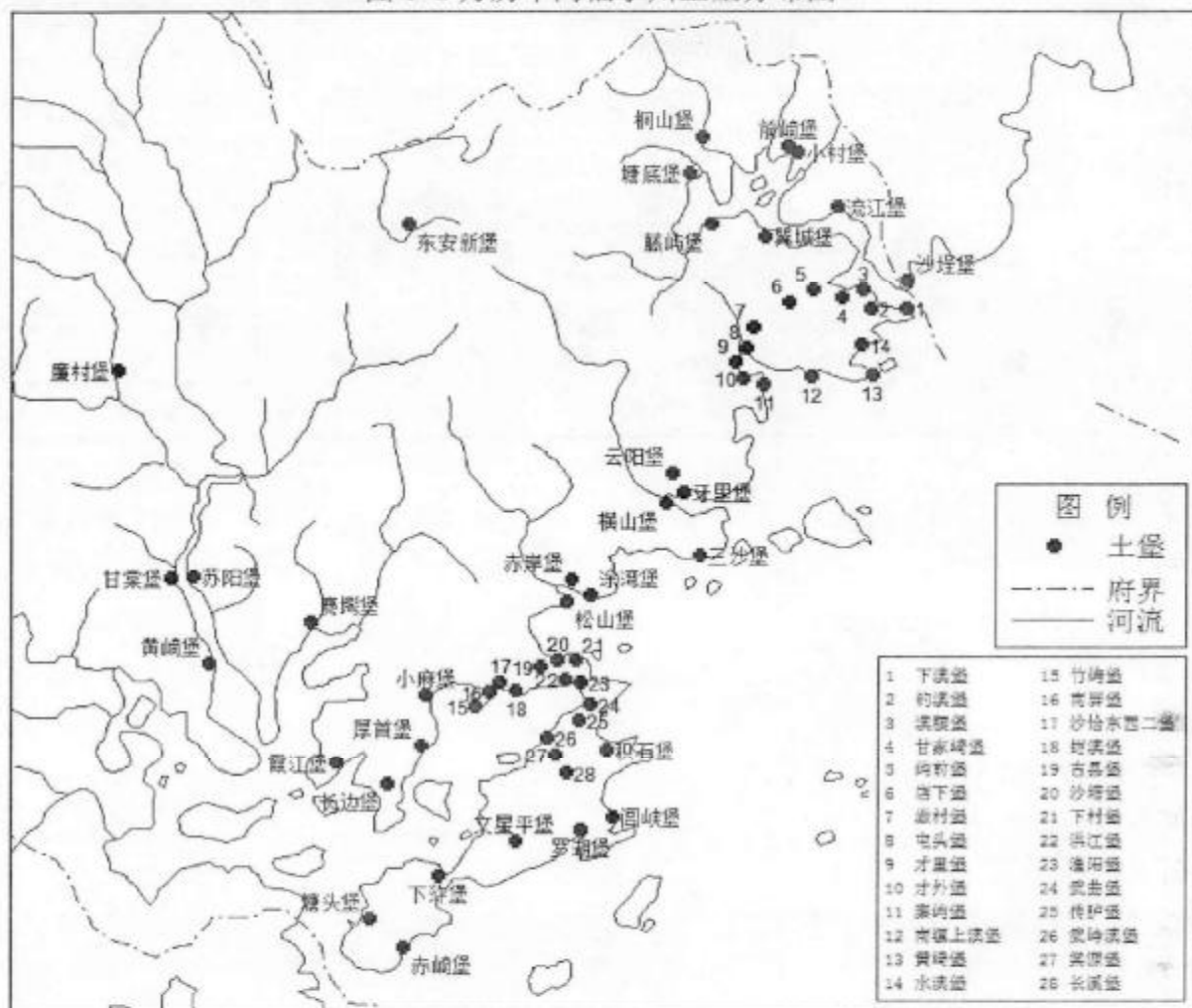
² （清）谭抡 修 王锡龄等 纂：嘉庆《福鼎县志》卷一《城池·附》，《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8 页。

³ （明）殷之铎 修 朱梅等 纂：万历《福宁州志》卷十二《人文志下·武功》，《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影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76-277 页。

⁴ 同上，卷十四《艺文志下·记类·赤岸堡记》，第 348 页。

⁵ （明）何乔远 编撰 厦门大学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古籍整理研究所 校点：崇祯《閩书》卷四十《捍圉志》，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996 页。

图 1-3 万历年间福宁州土堡分布图



(此图以 1998 年版《宁德地区志》中编绘的《宁德地区地形图》为底图绘制)

秦屿堡和閩峡堡挡住了倭寇的攻势后，福宁州沿海一带掀起了筑堡高潮。“嘉靖乙卯（嘉靖三十四年），倭自浙入，蹂躏遍州境。秦屿业有土城，倭攻七晝夜挫，刳去。继则城閩峡。倭亦攻击，失利去。于是南若沙洽、竹屿、南屏，西若厚首、清皓，東若七都、三沙，北若柘洋之西林，诸凡沿海之粤区，竞相倣而兴城堡者，无虑二十处，而迺州松山、赤岸亦议城。”¹柘洋堡对当地的影响同样深远。嘉靖三十七年一战后，“于是乡人始知有城堡之利，而沿海五十七堡次第创筑云。”²由此观之，秦屿堡、閩峡堡和柘洋城实为福宁州众多土堡建筑之滥觞。除了福宁州本州外，閩县、长乐县、连江县、福清县、罗源县以及福安县也有一些村镇筑堡自卫。以下笔者将这些土堡于明代的区划、今址以及可考的始筑时间整理成表 1-3：

¹（明）殷之辂 修 朱梅等 纂：万历《福宁州志》卷十四《艺文志下·记类·赤岸堡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影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48 页。

² 同上，卷十六《杂事志下·时事》，第 411 页。

表 1-3 明代闽东地区土堡列表¹

	州县	堡名	明代区划	今址	始筑时间
1	闽县	塘头堡	合北里	亭江镇塘头村	嘉靖年间
		塘湾堡	合北里	亭江镇长安村	嘉靖年间
		翁崎堡	江右里	亭江镇东岐村	嘉靖年间
2	长乐县	垵下民城	二十都	松下镇垵下村	嘉靖四十年
3	福清县	海口民城	方民里	海口镇旧街江边	嘉靖三十六年
		化南民城	化南里	三山镇前薛村	嘉靖三十九年
		沙塘堡	平北里	三山镇江厝村	隆庆年间
4	连江县	东岱堡	永贵里	东岱镇东岱村	嘉靖四十二年
		幕浦堡	嘉贤下里	敖江镇幕浦村	嘉靖三十八年
		小亭堡	二十七都	筱埕镇小亭村	嘉靖十二年
		黄崎堡	二十六都	黄崎镇黄崎村	崇祯九年
		苔藁堡	二十六都	苔藁镇苔藁村	嘉靖四十四年
		奇达堡	二十六都	安凯乡奇达村	崇祯十七年
		马鼻堡	保安里	马鼻镇马鼻村	嘉靖四十年
		透堡	安德里	透堡镇透堡村	嘉靖四十年
5	罗源县	鉴江堡	招贤里	鉴江镇鉴江村	嘉靖二十四年
6	福宁州	松山堡	一都	松港社区松山村	嘉靖三十四年后
		赤岸堡	二三都	松港社区赤岸村	嘉靖四十二年
		三沙堡	五六都	三沙镇镇区	嘉靖三十四年后
		牙里堡	七都	牙城镇镇区	嘉靖三十四年后
		横山堡	七都	牙城镇洪山村	嘉靖三十四年后
		云阳堡	七都	牙城镇文洋村	嘉靖三十四年后
		澳村堡	十都	太姥山镇冷城村	嘉靖十七年
		才里堡	十都	太姥山镇才堡村	
		才外堡	十都	太姥山镇才堡村	
		秦屿堡	十都	太姥山镇秦屿村	嘉靖十七年

¹ 据嘉庆《福鼎县志》载，大笱堡、小笱堡、黄崎堡、水与堡以及南镇上澳堡筑于洪武二年。此外，该方志还有这样一条记载：“大笱堡，旧蒋洋司，洪武二年徙筑大笱堡。”但是，周德兴是于洪武二十年奉命来福建增置卫所与巡检司。查弘治《八闽通志》，五个巡检司城确实创于洪武二十年，与《明太祖实录》记载吻合。在《八闽通志》所记载的水寨中，恰好有大笱堡、小笱堡、黄崎、水与以及南镇上澳五寨。在嘉庆《福鼎县志》中，此五寨则被列入“古寨”。查万历《福宁州志》和乾隆《福宁府志》，两部地方志都将蒋洋巡检司迁大笱堡之事记载为“洪武二年”，不同于《八闽通志》的“洪武二十年”。由此看来，嘉庆《福鼎县志》作者延续前两部地方志笔误，又错将“水寨”作“土堡”，因此才出现“洪武二年”之说。此说不可信，福宁州大部分土堡实为嘉靖年间所筑。

(续表)

6	福宁州	屯头堡	十一都	太姥山镇屯头村	
		黄岐堡	十一都	沙埕镇黄岐村	
		水屿堡	十二都	沙埕镇水澳村	
		澳腰堡	十二都	沙埕镇澳腰村	
		钓澳堡	十二都	沙埕镇钓澳村	
		南镇上澳堡	十二都	沙埕镇南镇村	
		下澳堡	十二都	沙埕镇南镇村	
		甘家崎堡	十二都	店下镇玉岐村	嘉靖四年
		屿前堡	十二都	店下镇屿前村	
		店下堡	十二都	店下镇店下村	嘉靖年间
		沙埕堡	十二都	沙埕镇镇区	
		巽城堡	十三都	店下镇巽城村	
		小村堡	十四都	前岐镇小澜村	
		流江堡	十四都	沙埕镇流江村	
		南崎堡	十四都		
		前崎堡	十五都	前岐镇前岐村	
		蔡江堡	十五都		
		窝口堡	十五都		
		桐山堡	十七都	桐山镇镇区	嘉靖三十八年
		塘底堡	十九都	桐山镇玉塘村	嘉靖三十九年
		藤屿堡	二十都	白琳镇藤屿村	
		东安新堡	三十一都	柘荣县双城镇镇区	嘉靖三十八年
		南屏堡		沙江镇南屏村	嘉靖三十四年后
		沙洽東西二堡	四十都	沙江镇镇区	嘉靖三十四年后
		古县堡		沙江镇古县村	
		沙塘堡		沙江镇沙塘街村与沙塘里村	
		上洋堡			
		下村堡		沙江镇方厝城村	
		蚶澳堡		沙江镇涵江村	
		洪江堡	四十一都	长春镇洪江村	嘉靖年间
		渔阳堡		长春镇渔洋里村	

(续表)

6	福宁州	武曲堡		长春镇武曲村	
		传胪堡	四十二都	长春镇传胪村	嘉靖三十四年
		小麻堡	四十三都	沙江镇小马村	
		厚首堡	四十三都	沙江镇厚首村	嘉靖三十四年后
		武峙澳堡	四十三都	长春镇武岐村	
		长溪堡	四十三都	长春镇长溪村	
		积石堡	四十三都	长春镇积石村	
		罗湖堡	四十三都	长春镇里城、外城村	
		閩峡堡	四十三都	长春镇閩峡村	嘉靖三十四年
		棠源堡	四十二三都	长春镇镇区	
		竹屿堡	四十四都	沙江镇竹江村	嘉靖三十四年后
		霞江堡		溪南镇霞塘村	
		涂湾堡	四十六七都	沙江镇龙湾村	
		长边堡	四十八都	溪南镇长兴村	
		文星平堡	五十一都	下浒镇文星明村	
		下浒堡	五十三都	下浒镇外浒村	
		塘头堡	五十三都	北壁乡四门桥村	万历以前
		赤崎堡	五十三都	北壁乡上、下岐村	
7	福安县	廉村堡	二十二都	溪潭乡廉村	嘉靖三十九年
		甘棠堡	二十九都	甘棠镇	嘉靖三十八年
		苏阳堡	三十一都	赛岐镇苏洋村	
		黄崎堡	三十四都	下白石镇	
		鹿墘堡	三十六都	溪尾乡	

(本表据崇祯《闽书》、万历《福州府志》、乾隆《长乐县志》、乾隆《连江县志》、乾隆《福清县志》、万历《福宁州志》、嘉庆《福鼎县志》、民国《霞浦县志》、万历《福安县志》、光绪《福安县志》、1999年版《福州市志(第7册)》、1998年版《罗源县志》、1998年版《宁德地区志》以及2002年版《马尾区志》整理)

从图 1-3 以及表 1-3 中清晰可见,土堡的分布和受倭患波及的地区大致重合。地方志作者曾经批评这些土堡:“至于乡堡之设,有司听民自筑,不免多滥。如古县一村而三堡鼎建,沙冷一埠而二堡角立。似宜并而为一,庶便千守。不然力弱勢分,鲜克济矣。”¹乡堡分布不均,确实不利于区域联防,但要将众多土堡合并却非易事。首

¹ (明)殷之辂 修 朱梅等 纂:万历《福宁州志》卷三《建置志·乡堡》,《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影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9页。

先，将土堡并而为一必当耗费巨资。而且土堡的始筑年份多在倭患严重时期，建筑那么大的防御工事必定花上很长的时间，恐怕还没竣工又将遇上新一波的袭击。另一方面，土堡或为一姓所筑，如高家的桐山堡以及甘家的甘家崎堡；¹ 或为多姓共建，如喻朝保同邹、丁、郑、易、宣五姓建筑的店下堡还有叶、杨、王、刘等姓的激村堡，² 无不打上乡族的烙印。正如前人所指出的，土堡是“乡族势力集团的产物”，其特点为“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主，而以地缘关系为辅。”³ 许多土堡的兴筑是为巩固一个家族或一地人群的利益，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土堡的合并必定触及乡族的利益，除非由官方统筹，否则各家势力难以平衡。在官方自顾不暇的时期，这一想法同样不可能实现。

除了民间自筑的土堡外，一些重要的集镇还得到官方的认可，甚至拨款，得以兴筑规模较大的城堡。在福安县，知县卢仲佃于嘉靖三十八年“檄谕三塘百姓筑堡自卫。民感其德，因更其名曰：甘棠。”⁴ 此外，福宁州的赤岸堡也有类似的情况：

“嘉靖癸亥正月，赤岸民项祚、王德浩领檄于州，董城役。太守夏公戒之曰：‘兹汝之子孫千百年全安計也，功务巩固，毋苟速成。’乃裒堡内及江边民金九百五十兩有奇，伐石营垣，周围三百二十丈，高二丈，址厚视高加二尺。... 落成于四月，盖岿然一雄障矣。秋雨，圯。夏公复督以亟修，毋缓。”⁵

在收到官府的檄文后，当地人集资筑堡。土堡因雨而倾倒后，知州夏汝砺让当地人尽快修复。可见在海防体系崩溃以及不少治所城市陷落以后，民间筑堡自卫已是当务之急。另外，福清县东部的海口也是人烟辐凑的集镇。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入犯，当地死伤惨重。由于邻近的镇东卫紧闭城门，甚至还欺凌入城避难的百姓，因此海口百姓要求以御史吉澄发来赈恤的帑金筑城。海口民城始筑于嘉靖三十六年，历经三年方竣工，周八百四十四丈，比许多县城都大得多。⁶

嘉靖倭患导致沿海军事堡垒凋零，倭寇劫掠村镇更导致居民离散，唯有势力较大的宗族凭着坚实的土堡得以保全。在此消彼长之下，这些土堡于倭患之后成为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另一方面，由于各巡检司城“旧址荒榛，僦居州城，”⁷ 福宁州于倭患后将原来的巡检司迁至各大土堡，以进行有效的控制。其中，青湾巡检司移至牙里，大箕筭巡检司移至秦屿，延亭巡检司移至下浒，高罗巡检司移至閩峡，而嘉靖十一年年从水澳移至庐门的巡检司则于这一时期改迁桐山以镇压来自浙江泰顺的盗贼。

¹ （明）殷之辂 修 朱梅等 纂：万历《福宁州志》卷三《建置志·乡堡》，《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影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² （清）谭抡 修 王锡龄等 纂：嘉庆《福鼎县志》卷一《城池·附》，《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³ 陈支平、杨国桢：《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中国社会经济史》，1985年第2期，第51页。

⁴ （清）张景祁 修 黄锦灿等 纂：光绪《福安县志》卷五《城池·土堡附》，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80页。

⁵ 同1，卷十四《艺文志下·记类·赤岸堡记》，第348页。

⁶ （清）饶安鼎 邵应龙 修 林昂 李修卿 纂：乾隆《福清县志》卷三《建置志·城池·附》，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刊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⁷ 同1。

除了土堡的兴起外，嘉靖倭患之后闽东地区另一重要事件即各治所城市的改筑。兹将嘉靖倭患后各地城墙改筑状况整理成表 1-4：

表 1-4 明代后期闽东地区治所城市改筑列表

	城名	改筑年份	改筑内容				
			拓城至山体部分	在山体上增筑防御设施	加筑城墙防御设施	增修、改建城门	甃濠、浚濠
1	福州府城	嘉靖三十八年			/		/
2	长乐县城	嘉靖三十七年			/		
		嘉靖四十年					/
		崇祯十四年	/		/		/
3	连江县城	嘉靖四十一年			/		
		万历九年				/	
4	福清县城	嘉靖三十七年			/		/
		万历二十二年	/		/	/	
		天启四年			/		
5	古田县城	嘉靖中			/		
		万历中			/	/	
6	永福县城	嘉靖三十八年			/		
		隆庆六年					
		万历十七年	/			/	
		万历三十七年				/	
7	罗源县城	万历七年			/	/	/
8	福宁州城	嘉靖四十一年			/		
		隆庆二年			/		
		万历十三年			/		
		万历十九年			/		/
		万历二十九年		/			
9	宁德县城	嘉靖四十二年			/	/	/
10	福安县城	嘉靖三十八年	/		/	/	/
		万历九年	/			/	
		万历二十一年	/				

（本表据万历《福州府志》、民国《长乐县志》、民国《连江县志》、乾隆《福清县志》、乾隆《古田县志》、乾隆《永福县志》、康熙《罗源县志》、万历《福宁州志》、乾隆《宁德县志》以及万历《福安县志》整理）

大部份治所城市于倭患后堑濠或浚濠，目的是以人工河作为城池的屏障。许多地方亦在原有的城墙基础上增加防御设施，包括修建敌台、增高城垣以及修筑月城等。敌台一般设于城墙之上，目的在于增加城墙特定位置的高度，弥补地形上的劣势。月城即瓮城，是建于城门外的附属半月形或方形小城。当敌人攻入瓮城后，守方可关闭瓮城城门与主城城门，形成“瓮中捉鳖”的优势。连江县与福清县即分别于万历九年与万历二十二年修建月城。在山体上增筑防御设施的只有福宁州一例，即万历二十九年“筑金城寨于金字山顶，以为贼至屯兵而守。”¹

另一类改筑工事最值得注意，那就是移城址跨山巅或将山体包围入城内。凿山筑城耗费甚巨，且技术复杂，不易将新城筑牢。此外，将山体围入城中，必将影响城内交通。没有城墙的阻挡，城内近山的地区更容易受到山洪的威胁。尽管如此，闽东地区仍有四座县城于倭患之后进行这类工事，而这些工事往往涉及西、北以及西北一隅。嘉靖三十八年，福安县县令卢仲佃“移城址北跨巖山之巔，西据龟峤之胜，蹙东迤南，基于近地以避鹤山之逼。”²万历十七年，永福县知县陈思谟“以东北城垣环在山坳外，山高倍于城，可覘虚实，请移跨山顶，周七百十丈，城墉易土以甃”。³万历二十二年，福清县令丁永祚“拓北城于山巔”。⁴崇祯十四年，长乐县知县夏允彝“扩城二百百八十丈有奇，北踞山巔”。⁵

增修或改建城门也是倭患以后各地城墙改筑的重要工事。古田县知县劉曰暘深谙风水之道，从万历年间多处城门和城楼改名来看，该县修建城门当是为了改善风水。⁶宁德县在城毁后重建，新修城门自在情理之中。另外，罗源与连江新修城门皆为加固固城墙防御。值得注意的是，福安县和福清县增修城门，是为改善北城跨山而建后城北交通不便的问题。万历二十二年知县丁永祚在跨山为城后“就西偏为北门，缩东北隅三之一为小北门，以便行者”。⁷福安县令卢仲佃在北跨巖山之巔后增筑小北门，⁸

¹（明）殷之辂 修 朱梅等 纂：万历《福宁州志》卷三《建置志·城池》，《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影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

²（明）陆以载 总修：万历《福安县志》卷八《文翰·改筑东城西墙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³（清）陈焱 修 俞荔 纂 永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乾隆《永福县志》卷二《建置·城池》，乾隆十四年（1749）刊本，福州：海峡书局出版社，2011年版。

⁴（清）饶安鼎 邵应龙 修 林昂 李修卿 纂：乾隆《福清县志》卷三《建置志·城池》，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刊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⁵（民国）李驹等纂 孟昭涵 修：民国《长乐县志》卷六《城市志·县治城池》，《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⁶（清）辛竟可 修 林咸吉等 纂：乾隆《古田县志》卷二《城池》，《中国方志丛书》（据乾隆十六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35页。

⁷同4。

⁸同2，第129页。

应该也是出于相同的考虑。另外，永福县在万历十七年将城墙北跨山顶后，曾一度将北门关闭。万历三十七年，知县袁世用重开北门以便居民往来。¹

有论者在关于山西的研究中注意到当地多有缺少北门的现象，并将原因归为衙署偏北、不使王气后泄以及避免将城市曝露在北方民族的威胁之下三个原因。²此外，也有学者在探讨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城市形态的时候提及当时人以风水为由关闭北门的现 象。³从闽东地区的情况来看，由于许多城市北面靠山，交通受阻，因而另设城门以 以利交通。有的城市则因为于倭患期间遭遇重创，因而消极地关闭北门，但是交通和 商业的需求最终还是使得北门重新开启。

第五节、小结

综合以上四节的叙述，可以明显看出时代背景造成不同类型城市的兴起，而各类 城市的分布特点也不尽相同。洪武初期，闽东沿海地区面对倭寇的威胁，明廷因而构 建由水寨、卫所城以及巡检司城组成的防御体系。自正统朝起，内陆山区发生诸多民 变。由于沿海防御体系对内陆山区鞭长莫及，受波及的治所逐一倡议筑城。嘉靖年间， 由于海防体系的崩溃，沿海县份在巡抚王忬的推动下筑城。在嘉靖倭患的冲击下，民 筑土堡纷纷于沿海的重灾区兴起。

从闽东的例子，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筑城运动是军事冲突的产物。无论是明初的 卫所城、巡检司城，或是之后涌现的治所城市以及民筑土堡，都是为了防御盗贼或倭 寇而兴筑。近年来，有学者在实证的基础上对修筑城墙的原因提出见解：

“几乎所有都城及大部份重要城市的城墙，都是在‘国泰民安’、安全局势并未 受到明显或重大威胁的王朝前期或其强盛时期兴建的。很难论证历代王朝在其初 期或强盛期内大规模营建都城是为了抵御某种直接、间接的军事威胁。当汉高祖 下令天下县邑均要筑城、明太祖洪武时期各府州治所均普遍修筑城垣以及清初要 求各级官员着意修复州县城池之时，并不存在将要发生大动乱和外来入侵的迹 象。... 在帝制时代的政治意象中，城墙更主要的乃是国家、官府威权的象征，是 一种权力符号。雄壮的城楼，高大的城墙，宽阔的城壕，共同组成了一幅象征着 王朝威权和力量的图画，发挥着震慑黔首、‘宵小’乃至叛乱者的作用，使乡民们 匍匐在城墙脚下，更深切地领略到官府的威严和‘肃杀’。”⁴

¹ （清）陈焱 修 俞荔 纂 永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乾隆《永福县志》卷九《艺文·明邑令袁世用重开北门 记》，乾隆十四年（1749）刊本，福州：海峡书局出版社，2011 年版。

² 张利坤：《明蒙军事冲突下的筑城运动与地方社会——以山西治所城市为中心的考察》，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年，第 49 页。

³ 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 年，第 358 页。

⁴ 同 3，第 443-444 页。

从本章的讨论来看，以上见解至少不适于解释闽东地区的情况。另一方面，论者形容的雄壮城楼、高大城墙以及宽阔城壕，往往很难并存。许多城市在始筑城墙之时往往因为缺少经费而未筑城楼，修筑城楼之后，城墙却因为日晒雨打而逐渐倾塌。并非所有城墙都伴有城壕，即使开凿，也需要时常疏浚。一般城市的城墙，仅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大约 5 米至 6.5 米。这样的高度是否足以威慑敌人，或者让百姓感受到官府的威严？地方志中也有记载一些城墙因为年久失修，仅剩几尺高，小童、牛羊均可翻越。如果城墙的核心功能是显示威权，倒塌的城垣是否真的具有威慑力？

此外，明代筑城运动亦反映政府社会控制能力逐渐下降的过程。洪武年间，江夏侯周德兴得以调动沿海地区一万五千壮丁于极短的时间内兴筑沿海十二城。直到正统年间，明廷仍不时修筑这些军事堡垒。但是，自正统朝起不断发生的民变开始冲击明代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政府在无法保护内陆城市的窘境下，只得下令这些地区筑城自卫。嘉靖年间，政府所筑各卫所以及巡检司城已破败不堪，沿海地区治所被迫筑城。在各地筑城过程中，民间除了参与劳役外，更得承担筑城的经费。古田县筑城耗费一万两有余，其中有不少出自民间。¹此外，罗源县筑城工费则以官四民六的方式筹集。²由于海防体系已无法保障各地安全，而县城往往遭到倭寇攻陷，各地官员只好鼓励乡镇居民筑城自卫。就在这一时段，许多偏远地区的乡族私自筑堡。倭患以后，政府的许多巡检司由于城墙残破，只得移驻邻近的土堡。这些民筑土堡，如桐山堡与柘洋堡，分别于清代与民国时期升为福鼎县与柘荣县的治所。由民间的防御性建筑演变成往后政府的驻地，这样的变化值得深思。郑振满先生曾论及明代中期以后明代政府所面对的财政问题，而这一困境导致政府将公共设施如道路与桥梁等的建设权利下放至民间。³事实上，各地民筑城堡的修筑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这一观点。当民间可以模仿官城兴筑城墙以后，城墙逐渐从隔绝敌人的藩篱变成乡族割据的堡垒。福建沿海地区于明代后期以及清代发生的诸多乡族械斗，⁴即是明代筑城运动中权利逐步下放的产物。

再者，筑城运动呈现的不仅仅是各地城墙从无到有的演变，更是一处人造景观逐步适应周围地势的过程。闽东地区许多城市于筑城之始仅以保卫聚落为主。在嘉靖倭患这一事件的冲击下，各处城市或增筑敌台，或于高山上设寨驻军，又或是将城墙周围高大的山体围入城中，让城墙能更好地利用周围地形以增强一地防御。包山入城后，近山的城区由于交通不便而人烟稀少，当地人便于正门之外增设小门，以方便行人进出。另外，在承平之时，人们也凭借传统的风水思想于适当的位置添加门楼或台阁，丰富一地的景色。

¹（清）辛竟可 修 林咸吉等 纂：乾隆《古田县志》卷二《城池·明邑人罗荣筑城记》，《中国方志丛书》（据乾隆十六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版，第 36 页。

²（清）卢凤琴 修 林春溥 纂：道光《新修罗源县志》卷八《城池·徐必进重修罗城记》，《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版，第 440 页。

³郑振满：《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兼论明中叶的财政改革》，《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

⁴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30-133 页。

最后，从运作情况来考察筑城运动，往往能获得理解一段历史的全新视角。以往学界均从军事堡垒的设置与毁坏，兵额的多寡来理解卫所制度的兴衰。笔者于第一节中尝试引用几条史料，大部份都属于正统以前的情况。尽管当时政府时常修复这些堡垒，逃兵现象也并未显著，但是由于守将各自为政，且漫无纪律，坚固的堡垒形同虚设。此外，论者经常引用嘉靖年间各治所城市的陷落以论证倭患的严重性。事实上，许多城市陷落的原因和不合理地运用周围地形有关。如果聚焦到城池周围，观察倭患期间的攻守与城防，或许得以反思，城池的陷落与倭患的猖獗是否有如此紧密的关系？如果当时人能成功守住城外制高点，历史是否会改写？

第二章：明代闽东地区治所城市形态

前章探讨了闽东地区不同时段筑城特点，厘清了闽东地区的筑城脉络。本章则以十个治所城市为中心，通过宏观择址、县衙择址、轮廓形态以及城市规划四个主题分析这些府、州、县城的城市形态。另外，笔者尝试在对闽东地区的观察基础上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藉以在比较的视角下认识中国古代城市。

第一节、宏观择址

正如前章所述，闽东地区的筑城运动是明代军事冲突的产物。那么，在这之前各治所驻地的聚落如何形成？这一宏观择址又有什么样的特征？笔者拟于本节概述闽东地区在元代以前的开发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一地区的宏观择址特征，以理解明代各治所筑城的地理基础。兹从唐、宋地理总志以及宋、明方志整理出闽东地区各地设县的时间：

表 2-1 闽东地区各县始设年份

	县名	置县年份	公元纪年	备注
1	闽县	汉代	前 202 年 -220 年	本汉冶县地，属会稽郡。后汉改为东侯官。吴改属建安郡。晋以侯官为晋安郡。隋开皇九年改为元丰县，十二年又改为闽县。皇朝因之。 (《元和郡县志》)
2	侯官县	武德六年	623	武德六年于今州西北三十一里置，八年废。长安二年重置，贞元五年观察使郑叔则奏移于州郭。 (《元和郡县志》)
3	怀安县	太平兴国七年	982	皇朝太平兴国七年割闽县敦业等九乡置怀安县。 (《太平寰宇记》)
4	长乐县	武德六年	623	本隋闽县地，武德六年分置长乐县，以长安乐为名。(《元和郡县志》)
5	连江县	武德六年	623	本汉冶县地，晋分立温麻县。武德六年移于连江之北，改为连江县。(《元和郡县志》)
6	福清县	圣历二年	699	圣历二年析长乐县东南界置万安县，天宝元年改名福唐。(《元和郡县志》)
7	古田县	开元二十九年	740	开元二十九年开山洞置。(《元和郡县志》)

(续表)

8	永泰县	永泰二年	766	永泰二年观察使李承昭开山洞置。县东水路沿流至侯官，县西泝流至南安县，南北俱抵大山，并无行路。（《元和郡县志》）
9	闽清县	乾化元年	911	唐贞观元年（627）割侯官一十里为梅溪场。至梁乾化元年改为县。（《太平寰宇记》）
10	罗源县	龙启元年	933	唐大中元年（847）割连江县一乡置罗源场。至长兴四年改为永贞县。（《太平寰宇记》） 闽龙启元年升为县。（淳熙《三山志》）
11	长溪县	长安二年	702	长安二年割晋温麻县旧县北四乡置长溪县。（《元和郡县志》）
12	宁德县	龙启元年	933	唐开成年中（836-840）割长溪、古田两乡置盛德场，续改为县。（《太平寰宇记》） 闽龙启元年升为县。（淳熙《三山志》）
13	福安县	淳祐中	1241-1252	淳祐中，领县十三。析长溪西乡，增置福安县。（弘治《八闽通志》）

根据以往研究，福建地区的闽江流域下游较早开发，实得益于早期作为航海活动中转站的优势。在航海活动与海路移民的影响下，闽江出海口一带逐步得到开发。¹正如论者所指出的，福建地区的开发“不是军事胜利的历史，而是中原移民逐步深入的历史。”²这些移民从闽江下游开始，逐步往上游推进，属于“基地扩展型”模式的典范。³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闽东沿海地区以闽县为起点，朝着南北两个方向设县。闽县于唐武德六年析南面地区设长乐县，再于八十多年后析长乐县东南部份为福清县。与长乐县始设同时，侯官县设于闽县西面不远处，而连江县则置于闽县北面的敖江下游。就在福清县初设不久，闽东北始设长溪县，为明代福宁州治所在地。

另一厢，内陆地区的古田与永泰二县于较后的八世纪中期“开山洞置”。据乾隆《古田县志》记载，古田县地本为土豪所据，后来“唐峒豪刘疆率林溢、林希等向化，都督李亚邱遣参军杨楚畹招致谢能等为刘氏开垦，始立邑于环峰复嶂间，平陆二十五里。”⁴宋太平兴国初，转运使杨克让迁县治于闽江边的水口以方便运输，端拱初转运

¹ 周振鹤：《从历史地理角度看古代的航海活动》，《周振鹤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87-193页。

² 汉斯·比伦斯泰因：《唐末以前福建的开发》，周振鹤译，《历史地理》第五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9页。

³ 林拓：《福建县级政区建置的地域分异及其整合过程——兼论自然区与行政区的关系》，《地域研究与开发》，2001年9月，第35页。

⁴ （清）辛竟可 修 林咸吉等 纂：乾隆《古田县志》卷一《建置志》，《中国方志丛书》（据乾隆十六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4页。

使崔策将县治迁回迁回原址。当时人认为将县治迁回原址是因为那里交通不便，作奸犯科容易掩人耳目。当时的县令李堪对这些看法不以为然，他认为：

“县治广袤抵各县界极远，中间如杉洋诸处，溪山杂沓，林菁茂密，倘官司去山峒、栖水滨，狡俗悍民所在负嵎此。当时县治内徙，良有深意。弹压控辖，容轻喙耶？”¹

李堪认为，古田辖区广阔，如果将县治设在水口，则离山区各地太远。原址位于古田县的中心，尽管交通不如水口便利，但却能有效地控制地方。结合土豪刘疆向化，都督李亚邱招人助其开垦来看，与沿海地区因开发完成而设县不同，古田县的设县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山区。有论者提及明代于福建山区设县是统治深入的结果，²笔者认为唐代的古田县之设已具备这一特征。

此外，闽东地区设县过程中许多地方都从原有的场或镇升为县。闽清县于唐贞观元年设梅溪场，后来“以税场为县”。³由此观之，闽清原来应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活动，才有设立税场的必要。此外，宁德县于唐开成年中置盛德场，闽龙启元年升为县。淳熙《三山志》载，宁德“县本盐场”，可见设县以前宁德是产盐的重要地区。⁴梅溪场位于古田县水口通往闽江下游的路上，盛德场与罗源场则处长溪县与连江县之间，因属各县之间的重要聚落。由于拥有一定的经济规模，且交通便利，这些地方后来都升为县，疏解了原县辖区过大的问题，奠定了闽东近一千年来的政区格局。

毫无例外，这些聚落都位于闽东地区的低地。福建地区以多山靠海著称，为数不多的低地更凸显了这些城市的宏观择址特征。以沿海地区为例，福州府城所在的福州平原是福建四大平原之一，也是闽东地区最大的平原，面积达 490 平方公里。⁵县城方面，长乐县有 50 公里的冲积平原，包括了现今的吴航、航城、营前、首占以及玉田五镇。其中，吴航镇即长期为古代治所所在地。这些冲积平原由于历代淤积，相当深厚，具有很高的保蓄与供肥能力。⁶连江县的河谷平原与冲积平原则占全县陆地面积的 10%，10%，而县治驻所位于海拔高度十米以下的冲海积平原，与海积平原共占全县陆地面积的 15%。⁷另外，福清县的平原狭小且零散，平原与谷地总和为全县陆地的 26%。县治所在的城关平原面积约 110 平方公里，仅次于龙田平原的 200 多平方公里。山丘将城关平原切割为三个小平原，分别位于县城的东、西、北方向。⁸罗源县尽管也是沿海

¹（清）辛竟可 修 林咸吉等 纂：乾隆《古田县志》卷一《建置志》，《中国方志丛书》（据乾隆十六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版，第 24 页。

² 林汀水：《福建政区建置的过程及其特点》，《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226 页。

³（宋）梁克家 著 陈叔侗 校注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整理：淳熙《三山志》卷九《公廨类三》，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年版。

⁴ 同上。

⁵ 福建省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第 1 册）》第二篇，“自然地理”，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年。

⁶ 长乐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乐市志》卷二，“自然地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

⁷ 连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连江县志》第二篇，“自然地理”，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 年。

⁸ 福清市编纂委员会编：《福清市志》卷二，“自然地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海县份，但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河成平原与海积平原仅占陆地面积约 5%。其中，县城所在的城关平原面积仅次于起步平原，海拔约在 5-20 米之间。¹

内陆县份方面，古田县地貌以山地为主，河谷平地仅占全县陆地面积的 1.4%。这类地貌主要分布在河溪边缘或河流入湖处，即古代古田县治长期驻所。²永福县地貌同样以中低山地为主，大樟溪将县中部切成谷地。县城所在的城关丘陵寢室盆地、嵩口山间盆地、梧桐丘陵盆地、葛岭山前冲洪积盆地面积俱在 20 至 30 平方公里之间。³与上两县相似，福宁州地貌以中低山以及丘陵为主，盆谷与平原仅 91 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 6%。⁴至于宁德县，山地、山间盆谷以及丘陵就占了全县陆地面积的九成，海基平原与洪积平原合计共占 5%。其中，县治所在地地势平坦，海拔介于 10 至 15 米之间。⁵福安县的山地与丘陵所占比例也很大，共为陆地面积的五分之四，24 个山间盆谷占总面积的 3%，而平原地区则占大约 9%。其中，冲击平原以县治所在的福安盆地平原最大。⁶

无论是沿海还是内陆地区，这些治所所在地都非常稳定。古田县尽管曾经迁至水口，但仅仅八年后就迁回故址。长乐县治原在敦素里平川（今长乐市古槐镇井南村）。约五十年后，唐御史董瑜“以其地卑湿移于吴航头”。⁷罗源县县治原在水陆寺西双溪溪之间，宋庆历八年（1048）土民陈智津等“以其地卑潦多水患，奏请迁之，知县陈偁乃迁治旧县东北之戴坑。”⁸连江县治原在伏沙（今敖江镇白沙村），天宝元年移至至今址。⁹尽管这些治所在设县之初仍有变动，但迁至今址后就一直延续至今。除了古田县旧城区因为建水坝而淹没外，¹⁰其他县的古代治所都成为今日各县市的城关所在地。

综上所述，闽东地区自汉代开始得到缓慢的开发，中原王朝迟至唐代才开始于该地区大规模设县。无论是为了收税抑或加强控制，闽东地区各治所都设在人烟辐凑的聚落。由于闽东地区在明代以前都不是军事冲突的前线，而是由闽江下游逐步深入开发的产物，因而宜居与生产自然成为各聚落择址的重要考量。闽东地区各治所的城址无一不处在适于发展的低地，因为这些地区土地平坦，容易形成较大规模的聚落。低地位于河流沿岸，水势较为缓慢，供水方便，也能通过水陆交通与外界联系。而沿岸肥沃的土壤，更是发展农业必不可少的条件。¹¹

¹ 福建省罗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罗源县志》第二篇，“自然地理”，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年。

² 古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古田县志》第二篇，“自然地理”，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

³ 永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泰县志》卷四，“自然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年。

⁴ 霞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霞浦县志》第二篇，“自然环境”，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年。

⁵ 宁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德市志》卷二，“自然地理”，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

⁶ 福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安市志》卷二，“自然环境”，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年。

⁷ （明）黄仲昭 修纂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 整理：弘治《八闽通志》卷一《地理·建置沿革》，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8 页。

⁸ 同上，第 9 页。

⁹ （民国）邱景雍 纂：民国《连江县志》卷一《疆域沿革表》，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第 11 页。

¹⁰ 古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古田县志》第一篇，“建置”，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

¹¹ 马正林：《中国城市的选址与河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 12 月，第 83-87 页。

第二节、官衙择址

上一节探讨了闽东地区治所的开发过程以及宏观择址特征。尽管各地的宏观择址都在低地，但是城墙包围的范围却很有限。治所筑城是为了保护官衙等官方机构的安全，因而官衙的择址决定了城墙的大致范围。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低地是各府、州、县的宏观择址特点，那么作为一地中心的官衙，在具体选址上又有什么特点？

以往学界在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中一般认为官衙等军政建筑位于城内偏北的位置。近年来，鲁西奇先生对汉水流域进行细致的研究后认为，尽管军政建筑偏北是普遍现象，但真正决定这些建筑位置的根本性因素是地形条件，即：所在位置必定地势高昂。¹就笔者所见，闽东地区的一些方志中提到官衙与北面山体的关系。万历《福宁州志》认为“州治负宸龙首山”²，而万历《福安县志》则更进一步指出“县治，宋淳祐五年县令郑黻创于宸山凤顶下。”³由此可见，这些治所城市都尽量选在靠近北面山体的地方。万历九年，福安县曾经历水患。“大水，全城漂没。县坏，尉厅、余堂署以址高，俱不坏。”⁴由于官衙位于最高的位置，因而免于破坏。此外，尽管福清县与古田县的官衙都位于城区东南隅，但方志也提及官衙地势较高的特点。乾隆《福清县志》就提到“其官府处高临下，巍然雄视；而养士之宫，亦号为雄丽，非他邑比。”⁵可见，尽管福清官衙不处于城内偏北的位置，但地势偏高确是事实。

既然官衙择址偏北、偏高是古代中国城市的普遍现象，那么是否一些原则决定了官衙的具体择址呢？福清县的案例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些线索。乾隆《福清县志》在篇首的县治图中曾叙述官衙的择址特点：

“县北山嵒麓落干，蜿蜒里许，突结一阜，县治高踞其脊。…自唐嗣圣来屡经修建而基址仍旧。”⁶

当地在官衙择址的过程中，首先观察北面的山势走向，在山势曲折延伸后的土山上建造官衙。尽管官衙屡经修建，但千百年来都继承同样的基址。《阳宅会心集》指出：

“城市之地，其正穴多为衙署诸基用，余者不论东南西北四向，总以高地吉…”⁷这样的择址方法，实际上是传统风水理论的体现。

¹ 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年，第409页。

² （明）殷之辂 修 朱梅等 纂：万历《福宁州志》卷三《建置志·公署》，《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影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³ （明）陆以载 总修：万历《福安县志》卷二《营缮志·署宇》，《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⁴ 同上。

⁵ （清）饶安鼎 邵应龙 修 林昂 李修卿 纂：乾隆《福清县志》卷十一《艺文志·福清改作学门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刊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页。

⁶ 同上，卷首《县治图考》。

⁷ 《阳宅会心集》卷上，“城市说”。转引自陈宏、刘沛林：《风水的空间模式对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影响》，《城市规划》，1995.4，第21页。

图 2-1 理想的城市风水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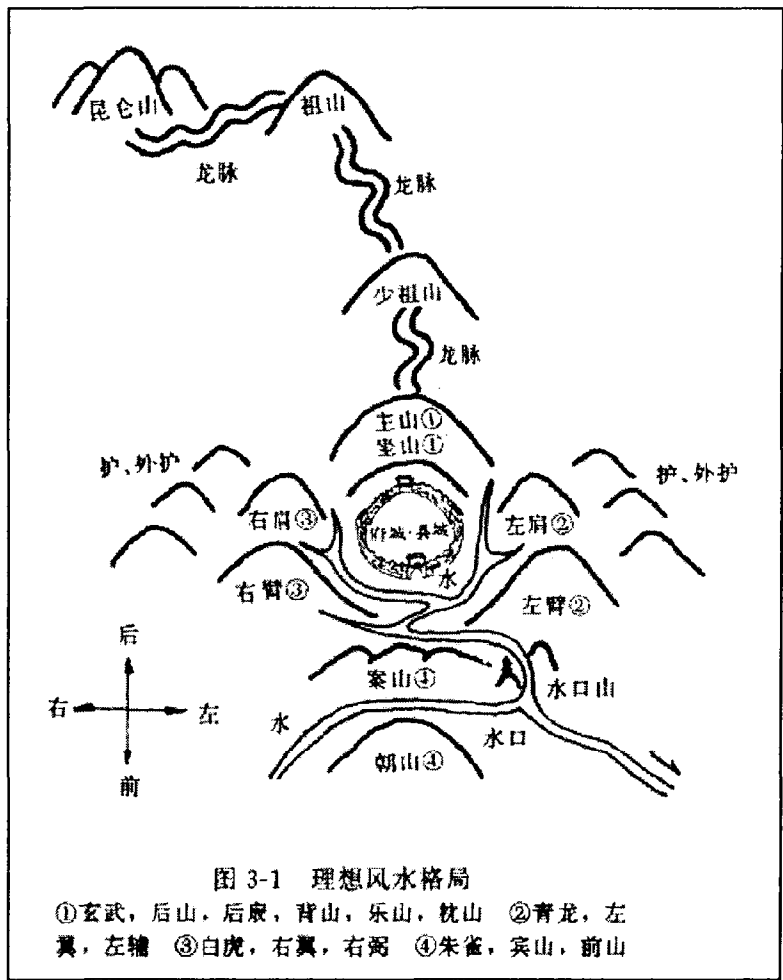


图 3-1 理想风水格局
①玄武，后山，后屏，背山，乐山，枕山 ②青龙，左翼，左辅 ③白虎，右翼，右弼 ④朱雀，宾山，前山
(取自一丁、雨露、洪涌：《中国古代风水与建筑选址》，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第 102 页。)

风水是福建盛行的思想，各方志中多以风水理论形容一地形胜，足见风水对当时人思想的影响。风水是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背山面水，也作负阴抱阳，是风水观念中城市基址选择最基本的原则。风水原理中最为盛行的是“形势宗”，形势宗的理论核心为“地理五诀”，即观察地理的五个要素：龙、砂、水、穴、向。“龙”主要指的是山脉走向，主山是基址之后的主峰，主山之后还有少祖山，而少祖山之后就是祖山，祖山即基址背后山脉的起始山，而这一起始山必源于三大干龙，而三大干龙的起始山则是西方的昆仑山。山脉绵延悠远为佳，山脉短促福亦不长。

“砂”为环绕风水穴所有山体的总称，主要有“四神砂”：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以及后玄武。砂与龙之间属主从关系，东边的青龙与西边的白虎一定要较北方的玄武，也就是一地的主山低矮，不能喧兵夺主。“水”有助于生气在风水穴中聚止，而风水穴即自主山传递下来的生气聚结处。水道以流速平缓，蜿蜒曲折为佳。水来处为天门，水去处为地户。城市选址，以河曲近岸一侧，即水环三面的岸上为佳。“穴”为风水

中的吉祥地，地势宽平，局面阔大，前不破碎，坐得方正，枕山襟水。“向”主要指的是轴线方向，一般是坐北朝南，易于采光。¹

风水所说的龙是能把生气传送至风水穴的生物活体，风水穴通常位于支龙尾部。福清县的县衙就选在龙脉尾部突出之处，也就是风水中的穴位。另外，福建沿海地区的地势主要是西北枕山，东南临溪。龙脉自西北而来，聚结处为城市依傍之山，也作“主山”，多耸兀城市北部或西北部。罗源县人徐珪也曾批评“县治之设，古人泥于风水。开建于东北荒僻之地，东近城隍庙，西比奶娘祠，南望儒学，北坐穷山。”² 这正好说明为何福建沿海地区较高的山体都位于城市的北部或西北部。考察风水穴的特征，环绕四周的群山极其重要，因而方志在形胜的描述中遵循“地理五诀”的原则，列出城市周围的主山、护山以及案山，并谈及南面的溪流。

从以上讨论我们得以明白，官衙的择址大多位于城内偏北、偏高的位置。而左右官衙具体位置择址的是风水思想。由于风水思想着重考察山势走向，以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格局，官衙一般会处在东、西以及北面山体之间，而决定其具体位置的是穴位的考察。

第三节、轮廓形态

上一节述及官衙择址靠北山以及择高处的倾向。城墙的功能在于保护城内居民，当中又以捍卫官衙等军政建筑最为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各治所城市在修建城墙之时，必然面对如何处理北山的问题。张驭寰先生曾论及城市与山的关系：

“建城时有意识地将山包在城中，可以随时随地瞭望城外，侦查敌情。当敌人攻城时，城内有山，可以随时在制高点上还击敌人，加强防御。一座城池里有山，可以登高望远，观览城乡风光。城里城外民居、寺观等一旦遇到火警，可随时得知。... 山，它使得城池的规划、布局、建筑安排都出现很深刻的变化，而避免呆板。古代城市一般都建在山的附近，将山与城池密切连接在一起。... 有时还将山的一部分包在城池中，以便据守山头，保护城池。... 古代甚至常将城池建在山顶上，成为‘山城’或‘山上城’。... 除此之外，还有在山麓建城，用山作为城池的依靠与背景的。... 要靠山建城，也就是城外有山，山与城墙接近，这叫靠山城。城池内部的建筑建在山顶或山巅，如望楼、炮台或者是寺院、庙宇。”³

综上所述，闽东地区由于官衙靠近北山，属于“靠山城”。靠山城一般都会将邻近的高山围入城中，易于观察城外情况，占据制高点，增加防守上的优势。那么，闽东地区各治所在筑城之时，是如何处理城墙与北山的关系？

¹ 丁、雨露、洪涌：《中国古代风水与建筑选址》，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² （清）卢凤琴 修 林春溥 纂：道光《新修罗源县志》卷八《城池·徐珪檄文》，《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39页。

³ 张驭寰：《中国城池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412-415页。

筑城的第一步是“相度”，即观察地势，估量基址。方志中有许多官员在筑城前相度的例子。古田县筑城前，“御史四明陆君偁按闽，厘恤民隐，亲莅相度。”¹长乐县令詹莱在获得筑城批准后变“议财用，峙木石，相基址，量工命。”²福清县也在左方伯刘案等“载临规划”，县簿吴璠“承命经度”后方筑城。³罗源县也有类似的记载，巡按王忬曾派其子到罗源相度。其子认为“城迤东而北，势尚崑阻，宜循其旧址拆而葺之，使崇且厚。”⁴另外，长乐县人在倭患后曾提及嘉靖年间筑城时当地人“城北不依图制，舍崇即卑，凭阿可瞰，大非形胜所宜。”⁵可见，相度的官员们在观察周围地势后绘制城图，在根据图制筑城。至于将地势较高的山体围入城中，似乎是各地的共识。尽管如此，第二章中述及许多治所城市在倭患前都没有将北山围入城中，那么这些地方在施工之时面对了什么样的难题，以致无法将城图付诸实践？

首先，城墙的修建触及民地，拆却不少建筑物，导致百姓反弹。闽东地区设县多始于唐宋时期，到了明代，县志周围必然是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古田县治东隅靠近大溪之处有不少巨家右姓的层楼，“开户迎溪，临流眺远”，“习居重废，不能相从”。⁶由于临溪处为宜居之地，再加上当地大姓习居已久，负责主持筑城的永福知县姚桢面对很大的阻力。最后，姚桢在执行工程的时候率吏兵“循溪督视”，才终于完成修筑。

第二，经费不足也是未将北面山体围入城中的一大因素。长乐县知县詹莱筑城尽管用帑金万余，耗时十个月，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据邑人郑世威《长乐县筑城记》所载，在得知“事事资费悉出自公帑”后，四方之人皆为利益而来。詹莱相基址后，工程仍有诸多问题。当时负责各坊、里的人都只顾自己的辖区，不易协调。或许正因如此，筑城事倍功半。邑人刘沂春后来追述道：“最病者在昔城北，不依图制，舍崇即卑，凭阿可瞰，大非形胜所宜。詹父叹曰：‘用力而苦，继怀隐忧，用财而吝，久将后耗。肩背不振而众安苟成。后有识者，当忆吾言，廓大之。’”⁷由此看来，詹莱在筑城之时曾计划将首石山围入城中，但最终因为财政问题而将山置于城外。在具体的筑城过程中，也可能因为匠吏的偷工减料而使得城墙建设大打折扣。巡按刘廷篴就曾将宁德县的砖城“易以小石”，而乘役者“苟就卑狭”，导致城墙“大雨辄溃”。⁸

¹（清）辛竟可 修 林咸吉等 纂：乾隆《古田县志》卷二《城池·明邑人罗荣筑城记》，《中国方志丛书》（据乾隆十六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版，第 36 页。

²（清）徐景熹 主修 福州市旧志 点校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整理：乾隆《福州府志》卷四《城池·明郑世威长乐县筑城记》，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 年版。

³（清）饶安鼎 邵应龙 修 林昂 李修卿 纂：乾隆《福清县志》卷十一《艺文志·福清县城记》，《中国方志丛书》（据乾隆十六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版，第 254 页。

⁴（清）卢凤琴 修 林春溥 纂：道光《新修罗源县志》卷八《城池·徐必进重修罗城记》，《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版，第 44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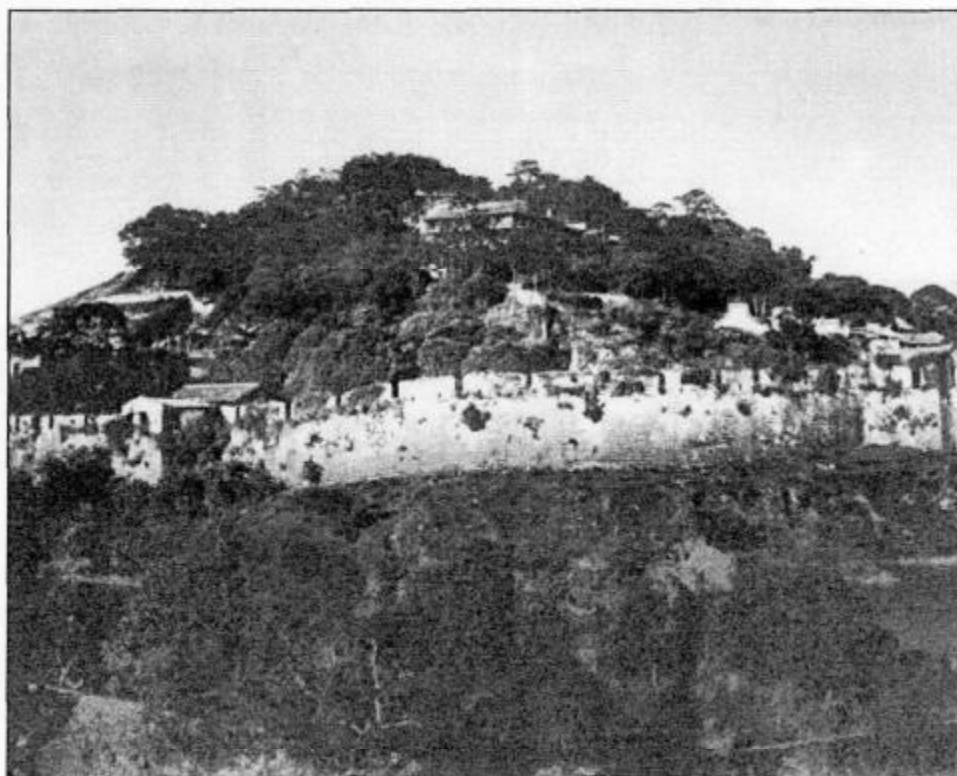
⁵（民国）李驹等纂 孟昭涵 修：民国《长乐县志》卷六《城市志·城池·刘沂春后拓城记略》，《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版，第 74 页。

⁶同 1，卷二《城池·明邑人罗荣筑城记》。

⁷同 5，卷六《城市志·刘沂春后拓城记》。

⁸（清）卢建其 修 张君宾 纂：乾隆《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志·城池·州人林爱民记》，乾隆四十六年（1781）刊本，第 656 页。

图 2-2 从福州城外仰视将山体围入城内的城墙



（传教士莫里逊摄于 1870 年。取自 Digital Archive of Toyo Bunko Rare Books:
<http://dsr.nij.ac.jp/toyobunko/Lb-69/V-1/page/0104.html.en>）

第三，由于许多县迟至嘉靖倭患时期方始筑城，急促的时间使得当地人被迫将山体弃于城外，以致功败垂成。福安县在嘉靖三十七年才因为倭患频传而急忙改筑城墙，由于工程未毕就遭遇倭寇的袭击，城池于嘉靖三十八年四月沦陷。几个月后，由于大雨不止，城墙随即崩塌。福清县城直到嘉靖三十三年才开始筑城。在城墙建筑过程中，由于“师环其疆，仓皇毕事，北傅高，西跨冈峦，而东迫陵阜”。¹福清县是福建沿海较富裕的地区，嘉靖三十四年首先遭遇倭寇袭击，因而城池在极为仓促的情况下完工。由于东、西、北三面城墙都曝露在高大的山体之下，福清城轻易被攻破。根据当地人后来的追述，福清县令钮纬“急于成功，相度未审，外傅崇岡，弃险于外。西据山巔，虚实易见。”²福清县的失守，似乎和县令钮纬的疏忽有很大的关系。

综上所述，各县不同的社会背景，决定了各城与北山的关系，而围山入城与否，对城池的防御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各城在遭遇嘉靖倭患后，纷纷改筑以修补原有城墙的不足。其中，最显著的改变即是把北山包入城中。接下来，笔者拟根据复原的城图来探讨倭患以后闽东地区城市轮廓形态的若干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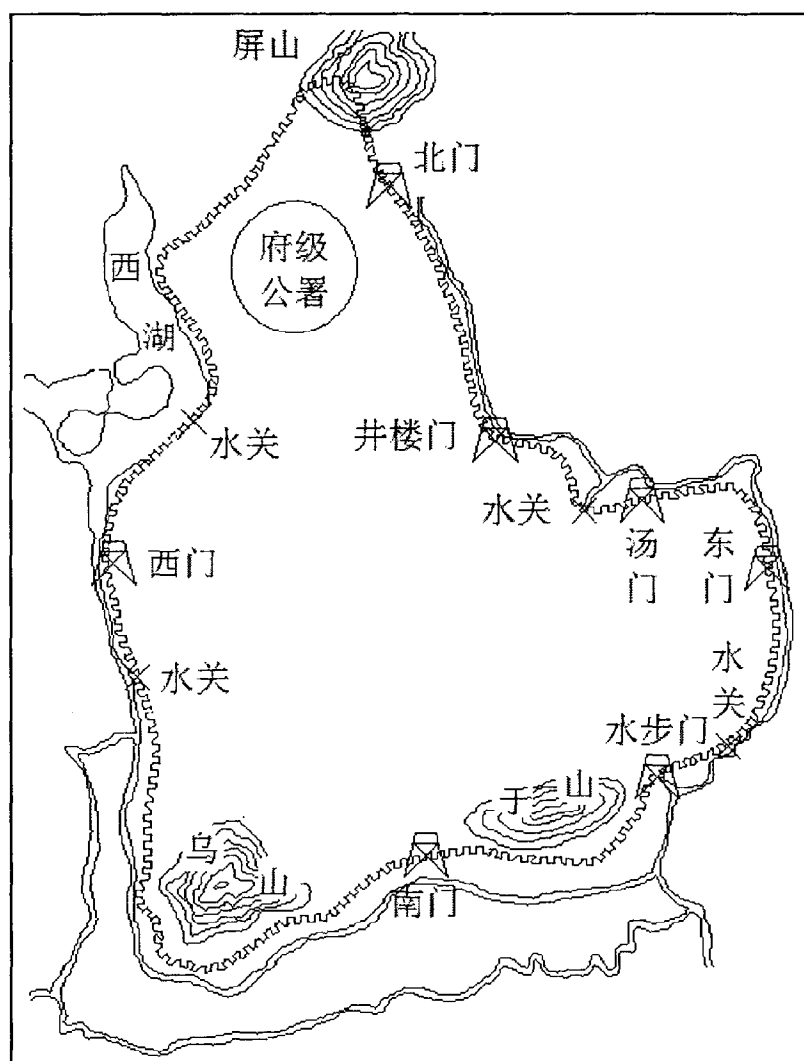
¹（清）饶安鼎 邵应龙 修 林昂 李修卿 纂：乾隆《福清县志》卷十一《艺文志·福清县辟城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刊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55 页。

² 同上，卷三《建置志·城池》，第 89 页。

（一）福州府城

福州城的筑城历史可上溯至汉代，城址选在广袤的福州平原北面，而明清时期的城址则是从晋代子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从晋子城起，福州城经历唐罗城、梁夹城、宋外城等几个时期，往南北两个方向发展。梁夹城时期，福州城将南面的于山与乌山以及北面的屏山围入城中，故有“三山”之名。洪武四年，王恭奉明太祖之命改筑福州城，将北面越王山围入城中，¹使“凸”字形轮廓北面多了个尖角。嘉靖倭患时期，福州城未经重创，除了于该时期增置外敌台以及堞壕外，²城址没有更动。

图 2-3 洪武六年（1373）福州府城复原图



（此图以 1998 年版《福州市志》中编绘的《福州古代城市变迁示意图》为底图绘制）

¹ （明）黄仲昭 修纂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 整理：弘治《八闽通志》卷十三《地理·城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36 页。

² （明）林嫌等 纂：万历《福州府志》卷三十四《时事》，《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16-31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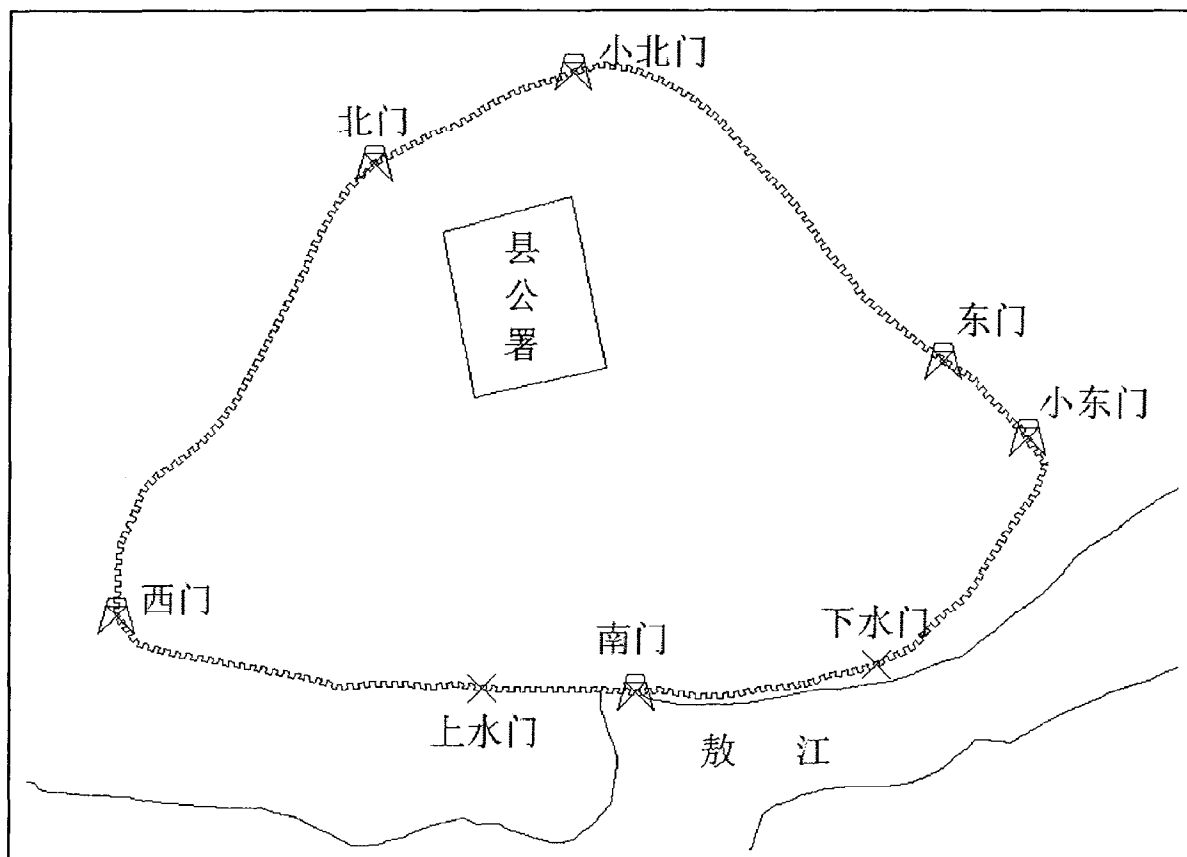
（二）长乐县城

长乐县城始筑于嘉靖三十二年，曾于倭患期间两度遭受攻击。当时负责筑城的县令詹莱曾经指出筑城者不依照图制筑城，将山丘置于城外，为长乐县城的一大疏漏。崇祯十四年，知县夏允彝听从当地人的建议，将西北面蟹山、龙台山以及葫芦山山巅围入城中，¹使矩形的轮廓往东北面突出。

（三）连江县城

连江县城位于县内冲海积平原南面近敖江一带，于嘉靖十九年遭山寇袭击后修筑城墙。县城轮廓南宽北狭，像一只展翅的凤凰，因而被称为“凤城”。嘉靖三十六年，倭寇进攻县城东门未遂，“焚龙兴观及保固祠，掠附郭，伏沙诸村去。”隔年，连江县城惨遭破城。²四年后，知县熊尹臣“建警铺、敌楼，规制大备。”³尽管历经整修，但城址仍旧。

图 2-4 嘉靖二十年（1541）连江县城复原



（此图以民国《连江县志》中编绘的《连江县城附近图》为底图绘制）

¹ （民国）李驹等纂 孟昭涵 修：民国《长乐县志》卷六《城市志·县治城池》，《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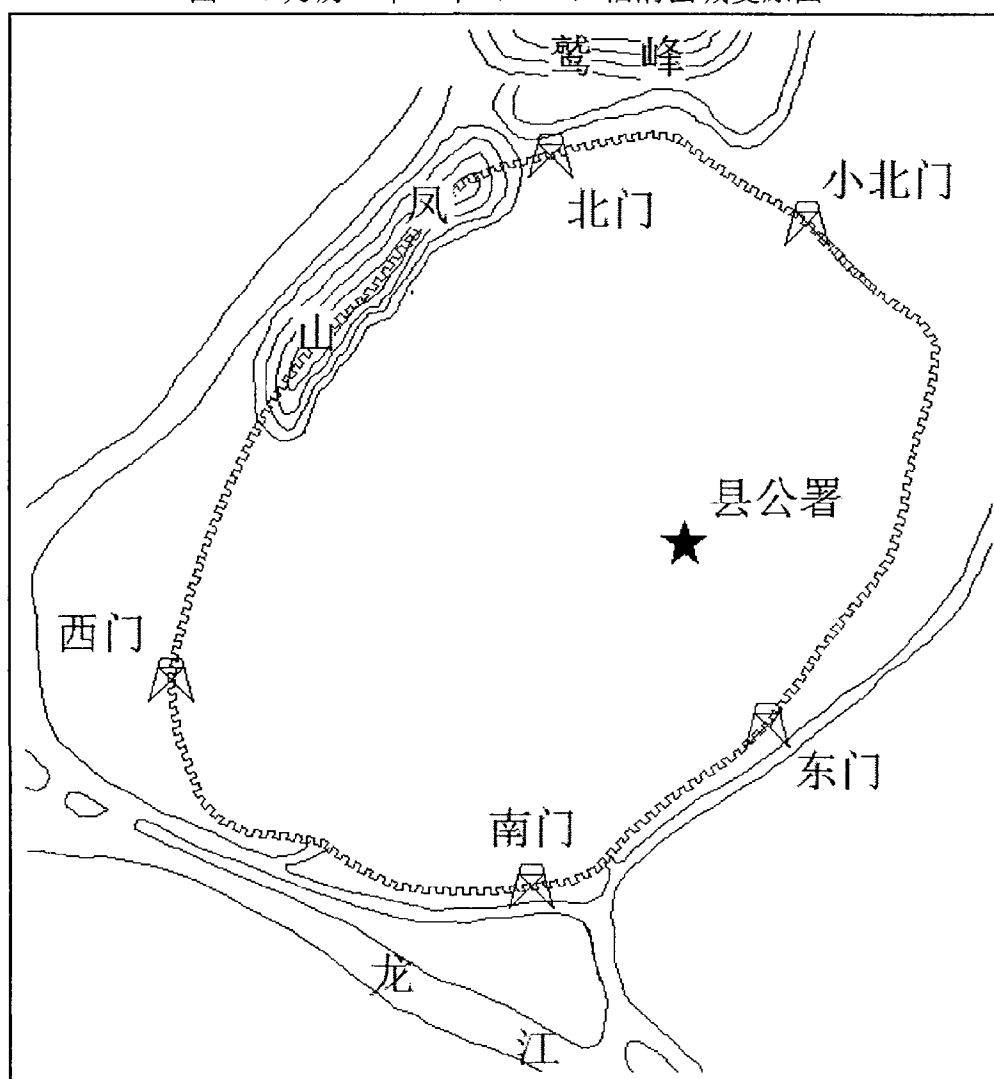
² （民国）曹刚 修 邱景维 纂：民国《连江县志》卷三《大事记》，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第21-22页。

³ 同上，卷六《城市》，第55页。

（四）福清县城

福清县城位于福清县第二大的城关平原西面，北依凤山，南临龙江。嘉靖三十三年，福清县于沿海地区的筑城高潮中筑城。当时负责修城的县令钮纬急于求成，没有仔细考察城墙的选址，将山丘置于城墙之外。四年后，倭寇在进攻北门的时候占据西面高耸的凤山，凭借高度优势，轻易攻破福清县城。有鉴于此，县令丁永祚于万历二十二年采纳当地老百姓的意见，新筑城墙围入北面的玉屏山以及西面凤山的一部份，¹以避免让敌人占据城市周围的制高点。由于将西面和北面山体围入城中，城北交通受阻，丁永祚便将东北隅城墙内缩，开辟小北门以便交通。²

图 2-5 万历二十二年（1594）福清县城复原图



（此图以 1994 年版《福清市志》中编绘的《福清（清乾隆十二年）县城图》为底图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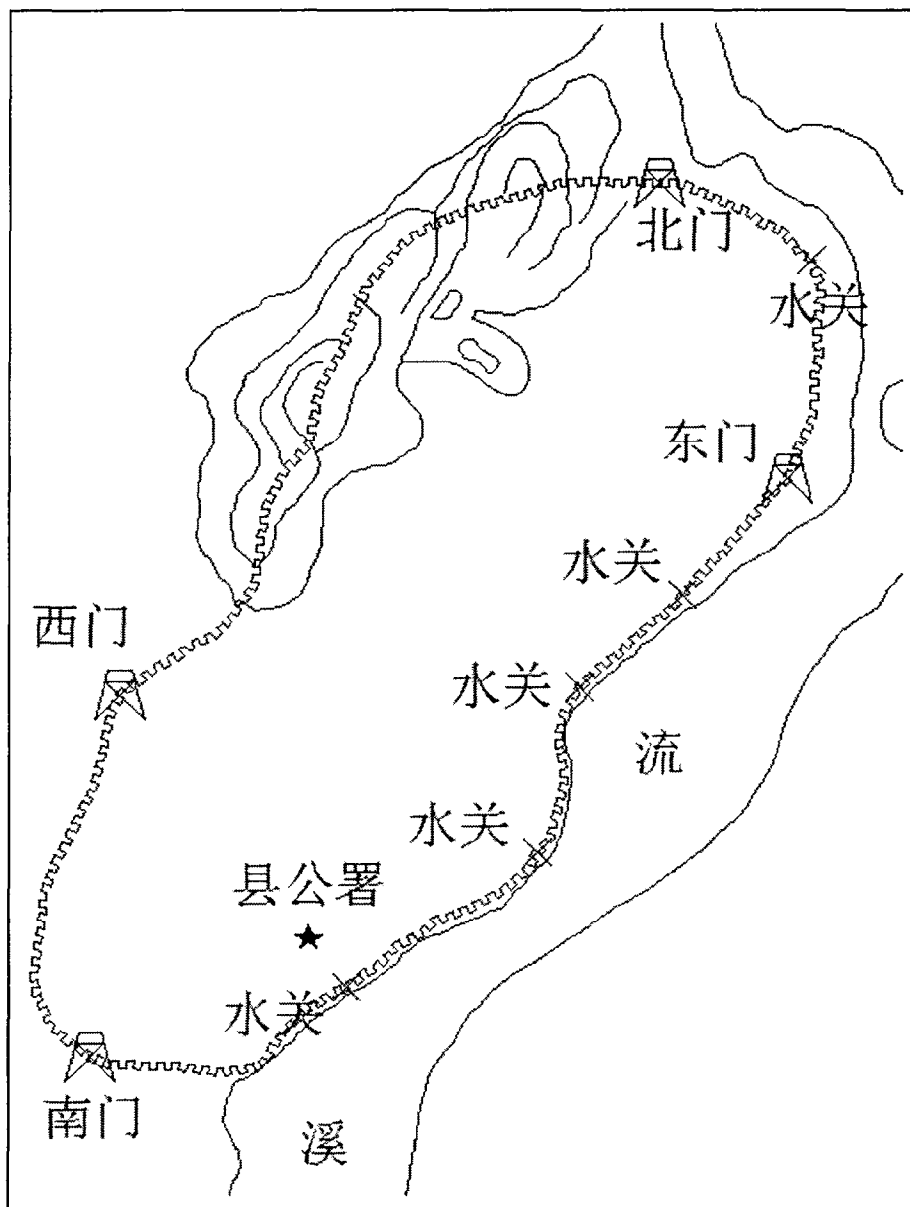
¹ （清）饶安鼎 邵应龙 修 林昂 李修卿 纂：乾隆《福清县志》卷三《建置志·城池》，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刊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版，第 89 页。

² 同上。

（五）古田县城

古田县城地处河谷平地，在正统至弘治期间的民变后，于弘治十五年始筑城。县城南北长，东西窄，城墙西北面自筑城之始即包入城中。嘉靖四十年以及四十二年，倭寇曾两度攻城，但都无法攻陷古田县城。¹万历年间，县令刘曰旸曾“修城门九，城北跨山”，但城址依然如旧。²

图 2-6 弘治十五年（1502）古田县城复原图



（此图以 1997 年版《古田县志》中编绘的
《民国 32 年（1943 年）古田县城区平面图》为底图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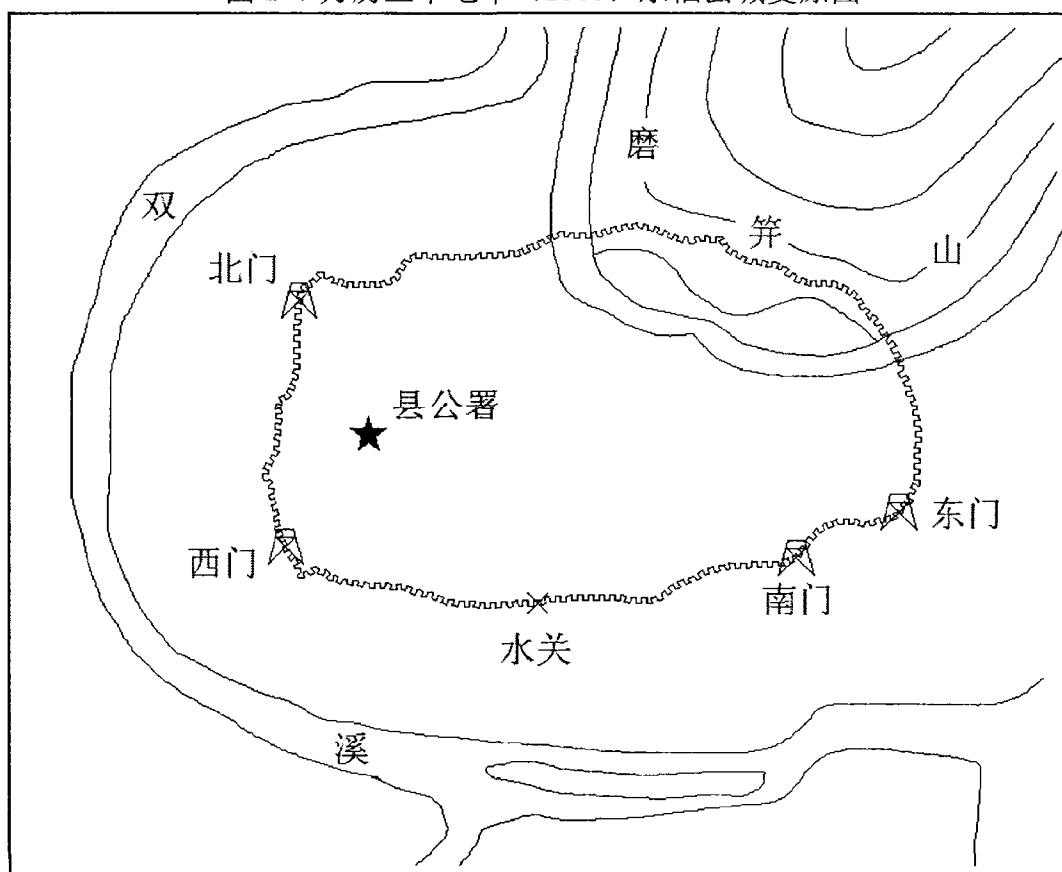
¹ （清）辛竟可 修 林咸吉等 纂：乾隆《古田县志》卷二《城池》，《中国方志丛书》（据乾隆十六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版，第 35 页。

² 同上。

（六）永福县城

永福县城位于城关丘陵寢室盆地，西、南、北三面临溪，东北面靠山，城墙于嘉靖三年修筑。嘉靖三十八年，倭寇曾经攻陷城池。万历十七年，由于面对山寇的威胁，知县陈思谟“以东北城垣，环在山外山高倍于城，可觐虚实，请移跨山顶。”¹改筑之后，城墙呈不规则矩形。北门因为先前曾遭遇倭祸而关闭，万历三十七年知县袁世用复开北门。²

图 2-7 万历三十七年（1609）永福县城复原图



（此图以民国《永泰县志》中编绘的《永泰城内外图》为底图绘制）

（七）罗源县城

罗源县于弘治年间始筑土城。嘉靖三十七年，巡按王忬命令推官徐必进将城西北的大部分山体围入城中，“延袤三里许，新辟八百余丈”，使得方形的城池往东北面突出。³

¹ （清）陈焱 修 俞荔 纂 永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乾隆《永福县志》卷二《建置·城池》，乾隆十四年（1749）刊本，福州：海峡书局出版社，2011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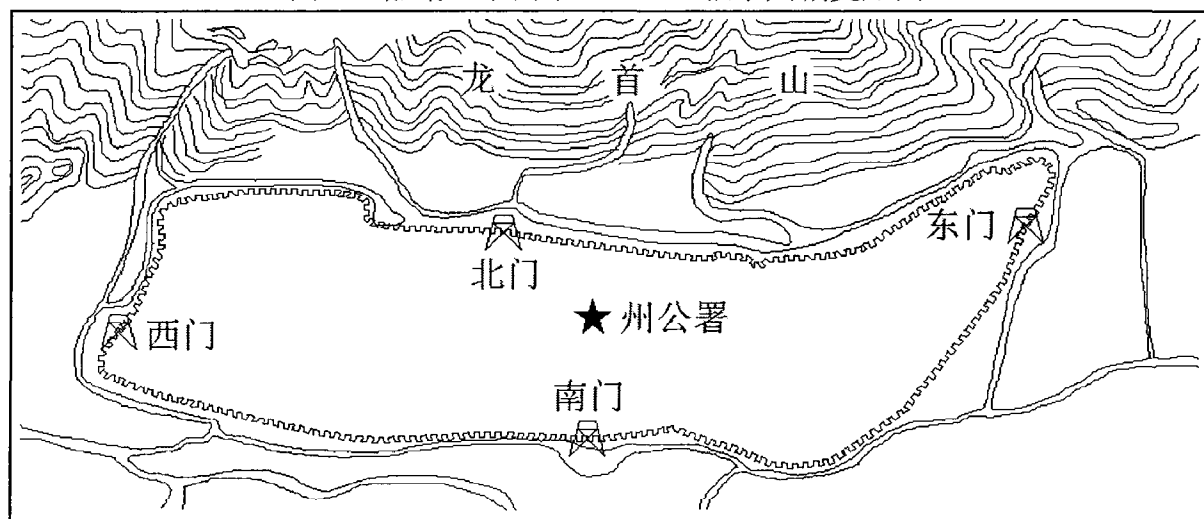
² 同上，卷九《艺文·明邑令袁世用重开北门记》。

³ （清）王楠 修 林乔藩 纂：康熙《罗源县志》卷二《建置·城池》，《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

（八）福宁州城

福宁州城始筑于洪武四年，分别于洪武二十年与嘉靖三十四年增拓东、西两面。¹ 州城亦作“靴城”，由于北面山群与南面长溪之间距离较近，自明代起城区就往东西两个方向发展。洪武年间筑城之初，该城已将西北部龙首山包入城中。

图 2-8 嘉靖三十四年（1555）福宁州城复原图



（此图以民国《霞浦县志》中编绘的《霞浦县城市全图》为底图绘制）

（九）宁德县城

宁德县城于正德元年累砖为城，知县李尧卿曾于嘉靖三十六年尝试累石护城。嘉靖四十年八月，倭寇攻破县城东门。嘉靖四十二年上任的知县林时芳立志筑城，“塞登瀛门，周五百九十二丈，高二丈一尺，广一丈六尺，游廊六百九十有九，敌台四十，内外马道环以深濠，上通山涧，下接海潮，势屹然矣。”² 宁德县轮廓呈圆形，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的东湖直通东面大海。

（十）福安县城

福安县城始筑于正德元年。三十八年四月，城墙尚未筑完，倭寇已兵临城下，占据城北的宸山以及城西的龟岬山。在地理位置极其不利的情况下，福安城在两天内迅速被倭寇攻陷。福安县城于倭患后西据龟岬，北跨宸山，东南则避开高耸的鹤山。

以往对于城市外部形态的研究主要将形态归类为正方形、矩形、圆形以及不规则形。对于不规则形轮廓，论者多将原因归为地势限制。根据笔者对闽东地区治所城市的观察，在地势当中，河流对城市形态的影响大于山丘。

¹（明）殷之辂 修 朱梅等 纂：万历《福宁州志》卷三《建置志·城池》，《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影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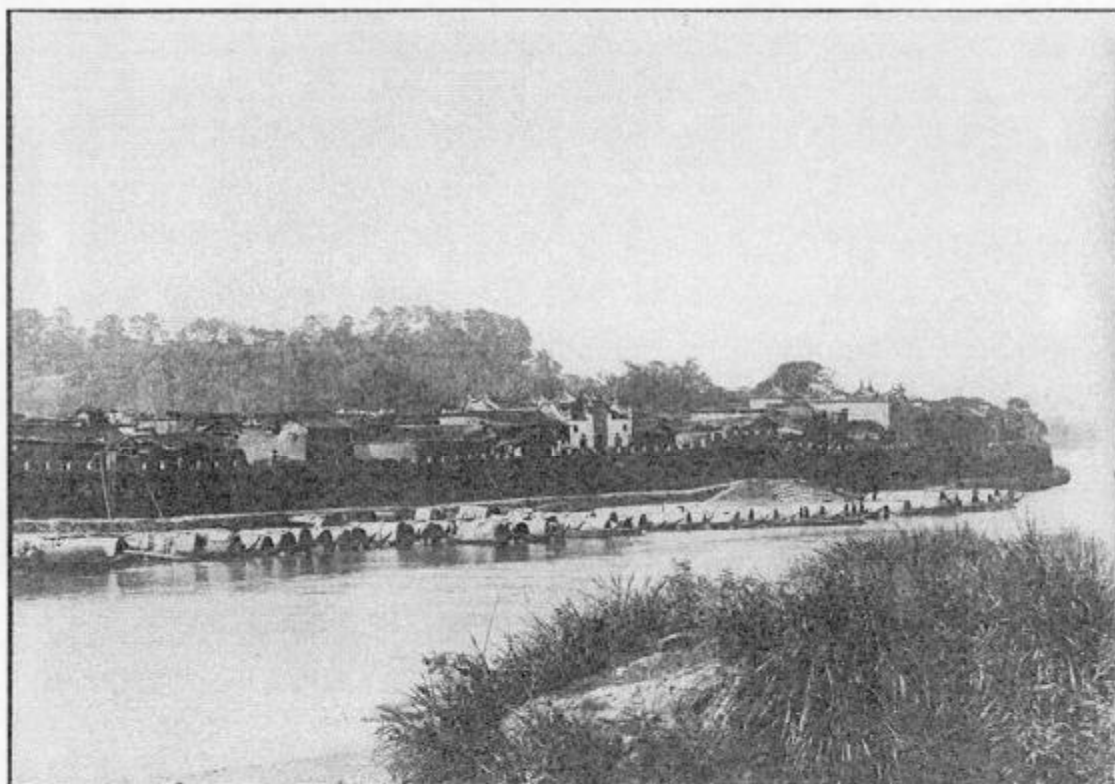
²（清）卢建其 修 张君宾 纂：乾隆《宁德县志》卷二《建置志·城池》，乾隆四十六年（1781）刊本，第一二页。

在闽东地区众多城市中，河流的流向决定了沿岸城墙的轮廓。福州城自唐罗城起，由于受到西北面西湖以及东北面河流的影响，城市形态开始往南宽北狭的方向发展。直到明代，“凸”字形轮廓越来越明显。此外，连江县城南面宽阔的轮廓受到敖江影响。福清县城东西短、南北长，同样受东、西、南三面河流所限。大樟溪经过永福县城西、南两面，决定了该城两面的轮廓。古田县城与福宁州城为闽东地区较狭长的城池，两城的轮廓均是山群与河流限制的结果。

另一方面，山丘对城市形态的影响较小。许多治所城市原本颇具特点的形状，都因为围入山丘而变形。长乐县城与罗源县城原来分别呈矩形与方形，在围入西北面山丘后，城市形态往东北面突出。福宁州城颇具特点的靴形，也因为围入西北面龙首山而变形。显而易见，城市形态通常根据河流沿岸发展。唯有战乱时期，在重视军事控守的情况下，山丘对城市形态的影响才逐渐明显。

此外，明代闽东地区治所城市最显著的外部形态特征是围北山入城中。超过半数的治所城市具备这一特征，其中多数都在倭寇冲击之后经历改筑，足见这一军事冲突对闽东地区城市形态的深刻影响。

图 2-9 临敖江而建的连江县城墙



(摄于民国初。取自 USC Digital Library:

<http://digitalibrary.usc.edu/cdm/singleitem/collection/pl15799coll1123/id/49371/rec/1>)

第四节、城市规划

以往学者均将治所城市等级与城市规划联系起来，认为府、州城的规模普遍较县城大。¹近年来，研究者或通过整体研究，²或通过区域研究，³发现治所城市等级与规划关联不大。笔者将闽东地区治所城市的规划整理成表 2-2，以探讨这一问题。

表 2-2 闽东地区治所城市规划列表

	城名	建材	建造年代	城周	城高	城厚		城门数 (水关)	城壕		
						顶	底		周	宽	深
1	福州府城	石	洪武四年	3,349 丈	二丈一尺	一丈七尺		七			
			洪武六年								
			嘉靖三十八年								
2	长乐县城		弘治三年	1,045 丈	一丈五尺	一丈		四	530 丈		七尺五寸
			嘉靖三十二年								
			崇祯十四年								
3	连江县城		嘉靖三年	900 丈有奇	一丈五尺	一丈		四			
			嘉靖十九年								
			嘉靖三十六年								
4	福清县城		正德八年	993 丈	一丈八尺	一丈四尺		四			
			嘉靖三十三年								
			万历二十二年								
5	古田县城		弘治十五年	1,300 丈有奇	一丈七尺	一丈		四 (五)			
			嘉靖四十一年								
			万历中								
6	永福县城	石基土墙	嘉靖三年	720 丈有奇	一丈五尺	一丈		四			
		砖墙	万历十八年								
		土	弘治年间								
7	罗源县城	土	弘治年间	200 余丈	一丈五尺	八尺		六			
			嘉靖三十七年								
			万历年间								
8	福宁州城	石	洪武四年	三里	一丈九尺	一丈		四		二丈	六尺
			洪武二十年								
			永乐五年								
9	宁德县城	砖	嘉靖三十四年	六里	二丈五尺	一丈三尺		五			
			嘉靖三十八年								
			万历十三年								
		上石下砖	万历十九年	1,058 丈	二丈三尺	一丈三尺		四	1,800 丈	三丈	一丈五尺
			正德元年								
			嘉靖四十二年								

¹ 陈正祥先生认为“地方行政的等级，显然左右城的规模”与“城门的多少，视城的规模形制、行政等级以及商业和交通的情况而定。普通的城，特别是县城，只有四个城门，也就是城的每边开一个，开在城墙的正中。”请参阅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 年，第 59-100 页。

² 成一农先生利用《四库全书》收录的各省通志，统计 1390 座城市的规模，发现行政级别较低的城市规模大于行政级别较高城市的情况比比皆是。尽管省城的平均规模是 10973.61 米，分别大于府城的 5195.7 米和县城的 2850.7 米，城市行政等级与城市规模之间的相关性，就全国而言却只有 0.48，在统计学中并不显著。成先生进而认为，行政等级影响城市规模这一旧说并不全面。请参阅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126-129 页。

³ 鲁西奇先生通过对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各城市的个案研究，认为“一个治所城郭的规模、形制，除了受行政等级的影响外，还受到历史、微观地形地貌、交通、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商业发展乃至风水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请参阅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 年，279-448 页。

(续表)

10	福安县城	砖石	正德元年	896 丈 5 尺	一丈一尺	一尺	五			
			嘉靖六年				五			
			嘉靖三十八年	800 丈有奇	一丈五尺		二丈五尺	296 丈	三丈	一丈
			万历九年	850 丈有奇	一丈四尺					

从各城的筑城历史可以看出，府、州城的修筑次数远较一般县城多。福州城经历汉冶城、晋子城、唐罗城、梁夹城、宋外城以及明府城六个时期不断地增拓，周长达三千余丈，为闽东地区规模之最。此外，福宁州城始筑时间较各县为早，且为闽东地区北部的军事中心，史书记载的修筑次数就达七次。相比之下，其他县城的修筑次数仅介于二至四次之间。从这一现象来看，府、州城为一地军政中心，受到官方重视，修筑次数高于一般县城。

尽管如此，福宁州城的周长仅一千余丈，不如长乐、福清、古田三县。究其原因，地貌对一地的限制相当明显。福宁州城地处沿海丘陵地带，城墙无法跨越北面丘陵，南面又为长溪所阻。尽管多番修筑，规模却无法扩大。另一厢，长乐县与福清县拥有较宽阔的平原，而古田县所处盆地面积亦不小。古田县于筑城之始即将北面山体围入城中，长乐县与福清县则于倭患后围山入城以加强防御。由此得知，尽管以上三县周长超越一千丈，但增筑的好几百丈城墙实为人烟罕至的高地，城区仍然集中在南面。

此外，笔者发现府、州城的设施远较一般县城完整。福州府城于明初城高即超过二丈。至于福宁州城，经过多次修筑后，高度一直维持在二丈二尺或以上。城墙设施方面，福州府城与福宁州城皆凿有城壕。尽管长乐县与福安县也设有城壕，但规模不大。长乐县城壕长 530 丈，而福安县城壕仅 296 丈，远较福州府城的 3346 丈与福宁州城的 1800 丈小。

总而言之，福州府城与福宁州城为闽东的两大城市中心，择址分别以开发程度与军事控守为考量。至于微观地貌，由于福州府城位于广袤的福州平原，而福宁州城处在沿海丘陵地带，尽管两者都经过多次修筑，但福宁州却因为地貌的限制而无法扩展。另一方面，大部份县城的修筑次数较少，周长也在一千丈以下。即使周长超过一千丈，新增的城墙依山而建，主要城区依然维持原有的格局。因此，城市等级影响筑城次数，而城市规模则受制于周围地貌。城市等级与城市规模之间，没有太多的关联。

第五节、小结

笔者于本章前三节中从时间和空间范围上逐步缩小，探讨闽东地区各治所的择址特点，决定官衙位置的文化因素以及影响城墙择址的社会背景。现在，笔者对于开篇所提出的问题，即城市与山的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

首先，多山临海的地理环境使得早期移民集中在闽东较易开发的低地，进而于宋代形成稳定的政区格局。闽东地区由于福建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自唐代以前与中央王朝保持一定的距离。自汉代起，海路移民陆续进入闽江出海口，溯游而上，逐步往闽江的南、北两面开发。这样一来，沿海地区较大的平原地区形成一定规模的聚落。唐代开始于这些地方设县，形成闽东地区的政区雏形。不久之后，中央王朝逐步进入内陆地区，设置政区以维护山区治安。五代十国以及宋代时期，一些位于交通线上的聚落，或是手工业专区，因为经济上日趋重要而升格为县，奠定了闽东地区的政区格局。之后，传统的文化思想指导了各治所官衙靠北山、处高地的择址取向。官衙的主要功能为控制一地治安以及征收赋税，周围必定为人口稠密地区。发展至明代，由于倭患的威胁，各地开始筑城。官衙靠北山，周围人口密集，而官方兴建城墙最重要的目的正是要保护政府军政机关以及尽可能围入缴纳税粮的居民。这样一来，各治所城市都要面对如何处理北面山体的问题。由于各地贫富的悬殊、筑城时间的差异以及城墙择址的取舍，不同的城市做出不同的选择，结局也大不相同。从闽东地区的例子可以发现，地理因素从长时段左右着聚落的择址与发展，文化因素影响了一地政治中心的位置，而社会背景则决定了一地社会对一件事情做出的判断，进而出现不同的结果。

其次，笔者认为广义的城市形态能拓宽人们对于古代中国城市的理解。通过前章对于筑城脉络的把握以及对于城市轮廓的观察，笔者发现尽管河流影响了各治所城市的轮廓。但是，在军事危机之时，人们仍会突破地势的限制，将山体围入城中，使城市的轮廓形态发生变化。最重要的是，倭患的冲击使得闽东地区许多治所城市将北山围入城中，形成明代这一地区城市的显著特点。倘若无法把握一地的筑城过程与社会背景，关于各种形状所占百分比的讨论必将流于空泛。另外，关于城市等级决定城市规模的探讨也有类似的情况。从筑城过程以及地貌形势来理解这一问题，就会发现等级较高的城市一般都选在特定区域的中心，微观地貌的考量则在其次。事实上，等级高的城市由于驻有众多军政官员，受到政府的重视，修筑次数较等级低的城市多。尽管屡经修筑，但等级较高的城市也会因为受制于周围地貌而无法进一步扩展。等级较低的城市碍于工费的限制，筑城次数较少，规制也不完备。即使一些县城在军事冲突下增拓城墙，但新筑部份实为人烟罕至的山丘，并无改变城市发展的态势。

第三章：明代闽东地区军事堡垒与民筑城堡外部形态

前章探讨了闽东地区各治所城市的宏观择址、官衙择址、轮廓形态以及城市规制，本章则将研究聚焦到军事堡垒以及民筑城堡另两类城市。军事堡垒分为卫所城和巡检司城，民筑城堡自成一节，而复式城市这一特殊形态则另辟一节专门讨论。

第一节、卫所城

闽东地区一共设置二卫以及四守御千户所。由于福宁卫驻在福宁州城，而镇东卫则与海口民城作为复式城市于第四节中讨论，本节仅涉及梅花守御千户所城、定海守御千户所城、万安守御千户所城以及大金守御千户所城。

（一）梅花守御千户所城

梅花守御千户所城地处滨海丘陵地带，位于今长乐市东北角的梅花镇梅城村，明代时属长乐县二十四都。该县扼守闽江出海口南面，为省城陆上的第一道防线。关于该县的建置，弘治《八闽通志》记载道：“在长乐县东北，洪武二十年创筑。高一丈八尺，阔六尺，周围六百四十八丈。... 东、西、南三面各辟门一，外环以壕。”¹ 另外，清代《长乐梅花志》对于该城形势亦有详细记载：

“（梅花城）三面跨海，南建沙冈。据碁山过脉，环龟山于内。延袤三里，高一丈八尺，周六百八十四丈。... 东、西、南三面辟三门。东门至海，南门面山，西则水门，潮至舟既抵城下。内则梯岩架屋，栉比鳞次，皆兵民之居，最称雄峙。城外巖患飞沙，渐积夺地，每以所军挑之。”²

梅花城南倚碁山，三面环海，围龟山入城中。弘治《长乐县志》称此地“潮至则舟航抵城下，潮退则平沙弥望”，³ 邑人王元麟诗云“渔村一带全临水，雉堞三方半掩沙”。⁴ 由于沙害严重，康熙五十八年，“知县卫良佐领帑重修，详改为寨。东门仍旧址，西曰朝宗门，计长二百二十四丈。第复回后，东门外人烟辐辏。”⁵ 梅花城内较为拥挤，且缺乏田地，而邻近大海有鱼盐之利，当地人多以捕鱼为生。⁶ 由于始筑之后城东仍有

¹ （明）黄仲昭 修纂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 整理：弘治《八闽通志》卷十三《地理·城池》，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38 页。

² （清）佚名 纂：道光《长乐梅花志》卷二《建置·城》，《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55 页。

³ （明）王涣 修 刘则和 潘援 纂：弘治《长乐县志》卷一《地理·城池》，明弘治十六年（1503）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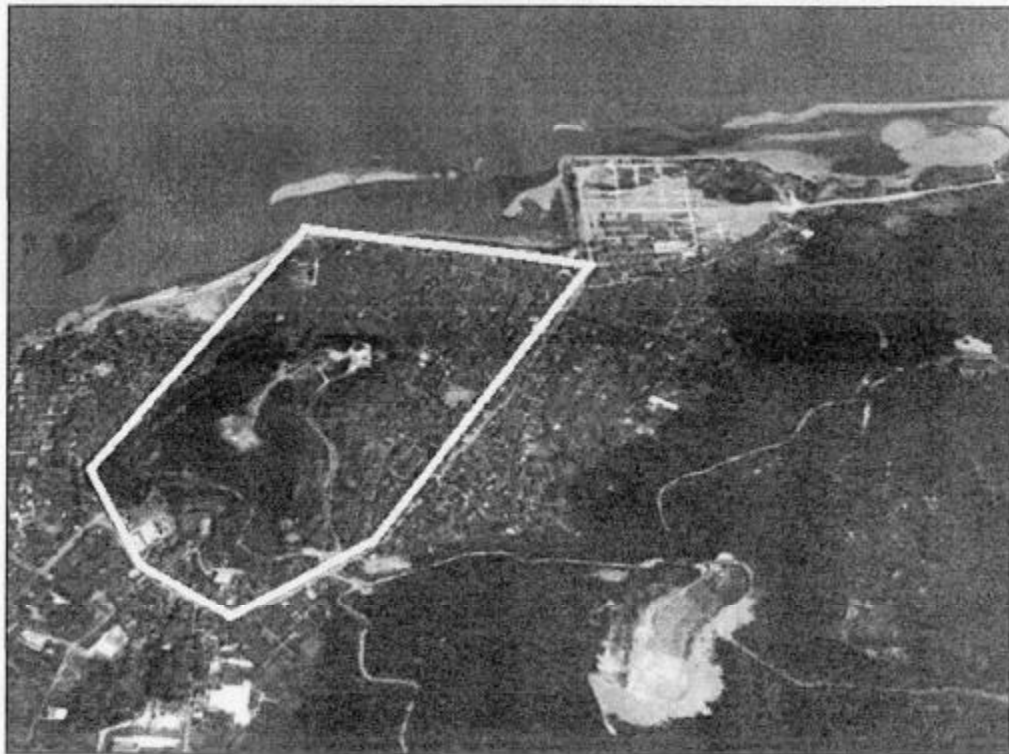
⁴ （清）佚名 纂：道光《长乐梅花志》卷五《艺文·咏梅花城诗》，《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72 页。

⁵ 同 2。

⁶ 同 2，第 371 页。

平地，城区主要往东面发展。该城由花岗石建成，非常坚固。明万历年间，倭寇于长乐各处掠境，唯有梅城得以保全。¹

图 3-1 洪武二十年梅花守御千户所城大致范围图



(本图据 Google Earth 绘制)

(二) 万安守御千户所城

万安守御千户所城处在福清市龙高半岛东南端的东瀚镇万安村，明代时属福清县东南的平南里，守御军事重地海坛海峡南口。据弘治《八闽通志》载，万安所城于洪武二十年由江夏侯周德兴创筑。城周围二百二十五丈八尺，高一丈八尺，阔一丈二尺，东、西、南三面各为门，皆建楼其上。²宣德五年正月，万安所城因“城池切临大海，近增延平卫官军五百人同守。”³首辅叶向高曾提及“镇东险而实，万安小而坚，故难破也。”⁴此外，由于周围地势东北宽阔、西南狭窄的关系，万安城呈葫芦形。该城依山傍海，城内的石板街道则依山势逶迤南北。⁵

¹ (清)佚名纂：道光《长乐梅花志》卷二《建置·城》，《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355页。

² (明)黄仲昭修纂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整理：弘治《八闽通志》卷十三《地理·城池》，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页。

³ 《明宣宗实录》卷六十二，“宣德五年正月丙寅”条。

⁴ (清)饶安鼎 邵应龙 修 林昂 李修卿纂：乾隆《福清县志》卷三《建置·志城池》，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刊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⁵ 福清市编纂委员会编：《福清市志》卷三十二，“文物名胜·古遗址·古城遗址·万安所城”。

图 3-2 洪武二十年万安守御千户所城大致范围图



(本图据 Google Earth 绘制)

(三) 定海守御千户所城

定海守御千户所城位于连江县黄崎半岛西南部的筱埕镇定海村，明代时属于县东北的二十七都。该城驻守闽江出海口东北部，是福州城的一大屏障。洪武二十年由江夏侯周德兴创建，城高一丈五尺，周围六百丈，西、南各辟一门，城外壕阔六尺，深二尺。¹ 永乐八年，“福建都指挥童俊不谨边防，遣幼弱指挥彭震巡海防倭，军无纪律”，² 遭倭寇占据邻近的双髻山，千户汤俊、百户金旺、任简、丁铭与朱文力战身亡，城也随之陷落。³ 正统五年，定海所城因“旧以碎石垒之，时时损坏”，获准“造砖裹其外为经久计”，⁴ 自此有了较为坚固的砖墙。嘉靖三十七年正月，倭犯定海所城，“戕杀男女，备极惨毒。…沿海庐舍，焚燎一空。”⁵ 三年后，以倭警增筑二百二十丈。⁶ 定海所城三面环山，南朝大海。南门有三重城门，门宽 4.8 米，高 5 米，层层防护，为军事堡垒的一大特色。⁷

¹ (明) 黄仲昭 修纂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 整理：弘治《八闽通志》卷十三《地理·城池》，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38 页。

²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十，“永乐八年十一月癸酉”条。

³ (民国) 曹刚 修 邱景雍 纂：民国《连江县志》卷三《大事志·明》，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第 20 页。

⁴ 《明英宗实录》卷六十五，“正统五年三月己未”条。

⁵ (明) 喻政 主修 福州市旧志 点校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整理：万历《福州府志》卷七十五《杂事志四·时事》，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 年版。

⁶ (民国) 曹刚 修 邱景雍 纂：民国《连江县志》卷六《城市·堡》，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第 56 页。

⁷ 阮道明：《“会城重镇”——定海》，《福州乡土》，2004.04，第 5 页。

图 3-3 嘉靖四十年定海守御千户所城大致范围图



(本图据 Google Earth 绘制)

(四) 大金守御千户所城

大金守御千户所城位于今霞浦县东冲半岛东部长春镇大京村，明代时属福宁州东南海滨五十二都。该地旧为西白巡检司，洪武二十年改立千户所，江夏侯周德兴始筑城。城高二丈二尺，阔一丈，周围五百八十二丈，东、西、南三面各辟一门。¹ 永乐八年，与定海所城同遭倭寇攻破。² 七年后，御史韩瑜、都指挥谷祥令增高三尺，复砌三门月城，沿城壕堑，阔一丈，深六尺。³ 正统五年，和定海所城一并改筑砖墙。⁴ 嘉靖靖倭患时期，过于狭窄的所城只容得下军兵，许多居民只好在城外筑堡自卫。由于担心百姓自筑的土堡不够牢固，反为敌人所占，该城于隆庆元年往西、南两个方向增拓共二百四十丈，新辟二门。⁵ 拓城后不久，大金所城便遭倭寇夜袭，焚掠而去。⁶

根据张驭寰先生的考察，大金所城处在两山对峙之间，东西长，东北城角向外突出，形成不规整的矩形。东城墙外筑有一个半圆形的瓮城，门洞三米，并有两个石垛，

¹ (明) 黄仲昭 修纂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 整理：弘治《八闽通志》卷十三《地理·城池》，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56 页。

²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十，“永乐八年十一月癸酉”条。

³ 同 1。

⁴ 《明英宗实录》卷六十五，“正统五年三月己未”条。

⁵ (民国) 罗汝泽等 修 徐友梧等 纂：民国《霞浦县志》卷六《城市·城池·续大金所拓西南城碑记》，《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版，第 65 页。

⁶ 《明穆宗实录》卷二十七，“隆庆二年十二月辛卯”条。

筑得异常坚固。此外，东门内还有一座山，建城之初即已围入城中。从东门进入，有一条大道直达西城墙边部，另有一条大道自南门而来，形成丁字街。¹

图 3-4 隆庆元年大金守御千户所城大致范围图



(本图据 Google Earth 绘制)

(五) 小结

综上所述，所城的选址以军事控守为第一考量。梅花所城位于闽江出海口，万安城与定海城位于福清县与连江县半岛的突出部，而大金所城则耸立于福宁州东南端的东冲半岛东北部，都是沿海各处的重要门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军事堡垒的朝向都没有遵循治所城市坐北朝南的惯例。除了定海所城面向西南大海外，梅花所城与万安所城皆朝东北，而大金所城则东向大海。因为以防御为先，各城必须面向所辖海域以便能迅速歼敌。此外，这些千户所城都选在较宽阔的沿海丘陵地区。由于驻军多，规制也较大。除了万安所城周长仅二百二十五丈外，其他三城在始筑阶段的城周均达五、六百丈。因为城址宽阔，梅花所城与大金所城甚至于筑城之后渐渐形成城外热闹的居民区，两城也分别拓宽城址以适应这一趋势。高度方面，梅花所城与万安所城高一丈八尺，大金所城二丈二尺，定海所城今一丈五尺，和城周一样，没有统一的标准。至于城门数量，除了定海所城仅开西、南二门外，其余三城均辟东、西、南三城。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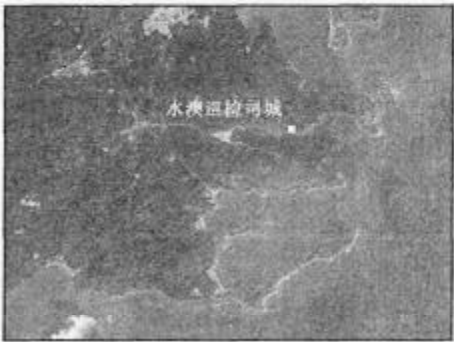



¹ 张驭寰：《中国城池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521页。

于梅花所城与万安所城北面皆朝向大海，因此面山不辟门的说法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或许，传统风水思想多少左右了军事堡垒城门的方位。从笔者勾勒的卫所城轮廓来看，这类军事堡垒能较好地适应周围地势。梅花所城于筑城之初便将西南面的龟山围入城中，大金所城东门内也围有一座山丘。由于所城均由官方统一规划设置，并没有不同势力周旋的痕迹，因而能依据图制兴筑，达到较好的防御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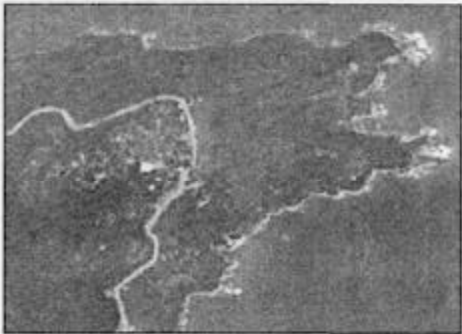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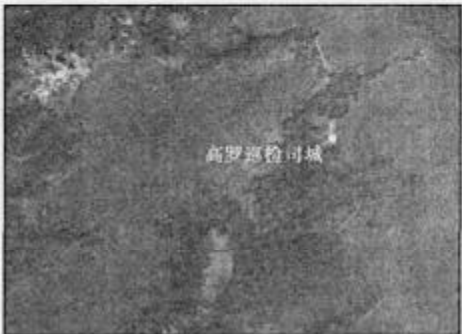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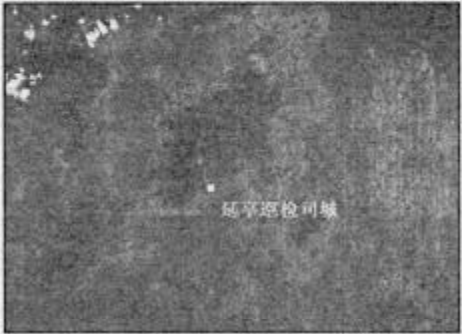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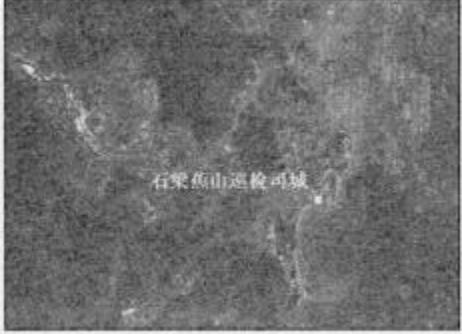

第二节、巡检司城

闽东的内陆与沿海各地均设有巡检司，然而沿海地区的巡检司除了守御要冲和拘捕盗贼外，还得协助海防，因而筑有城墙。闽东于明代筑城的巡检司共计十二个，其中福宁州六个，长乐县三个，连江县、福安县与宁德县各一个。笔者拟将柘洋巡检司城置于复式城市一节叙述，因此本节所讨论的巡检司城仅十一个。由于关于巡检司城的记载稀少，且多未留下城墙遗迹，本节不着重叙述，也无法勾勒轮廓，而是将择址与规制两大主题分别制表以进行简略的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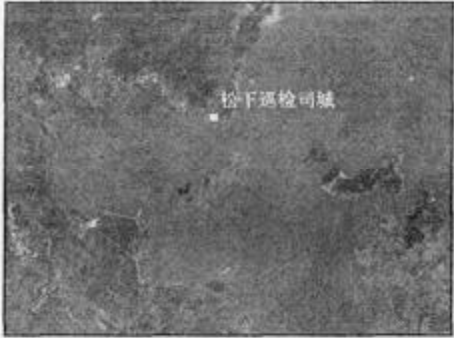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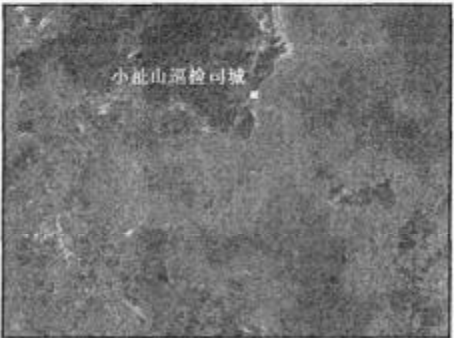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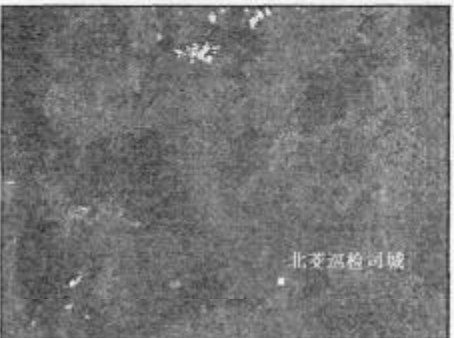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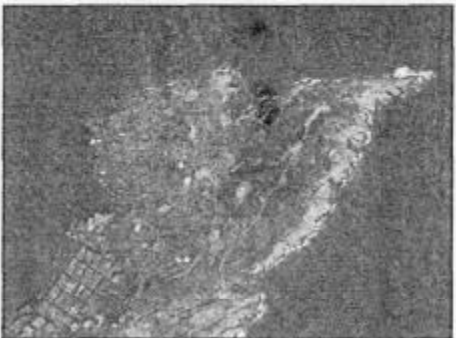


表 3-1 巡检司城的宏观择址与微观地形组图

	州 县	城 名	宏观择址	微观地形
1	福宁州	水澳巡检司城		
2	福宁州	大箕筭巡检司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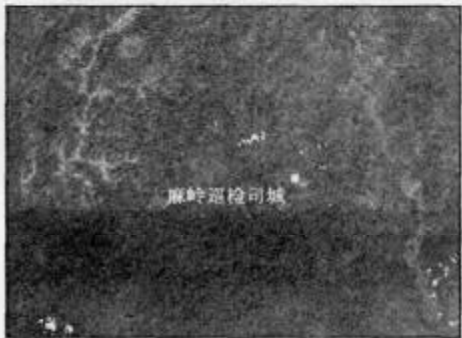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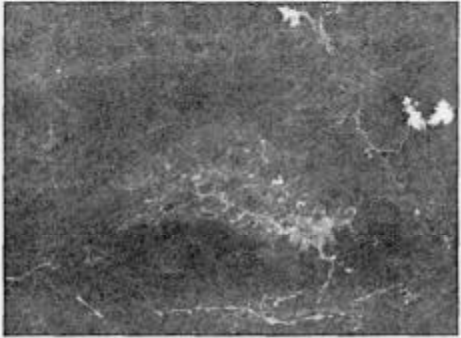
(续表)

3	福宁州	青湾巡检司城		
4	福宁州	高罗巡检司城		
5	福宁州	延亨巡检司城		
6	长乐县	石梁蕉山巡检司城		

(续表)

7	长乐县	松下巡检司城		
8	长乐县	小祉山巡检司城		
9	连江县	北茭巡检司城		
10	福安县	白石巡检司城		

(续表)

11	宁德县	麻岭巡检司城		
----	-----	--------	---	--

巡检司城的宏观择址有几种类型。第一，扼守各个重要港湾。福宁州东北端的水澳、大笪筓、青湾三个巡检司分别守御晴川湾内的十二都与十都以及牙城湾里的七都，都是福宁州沿海较为繁荣的地区。第二，形成区域联防以拱卫州县重要门户。由于长乐县没有突出的半岛，石梁蕉山、小祉山以及松下三个巡检司城由北至南驻守长乐的海岸线。另一厢，福宁州的高罗与延亭两个巡检司城则联同大金千户所城共同守御东冲半岛沿海。另外，这两个巡检司城也和连江县的北茭巡检司城联合守御福宁州东南部以及连江县东北的官井洋。一旦倭寇突破这道防线，即可进入官井洋，东北进攻福宁州，溯水北上偷袭福安县城，抑或往西劫掠宁德县村郊。第三，设于内陆地区以弭盗安民。福安县的白石巡检司城设于地僻人稀且盗矿频仍的七都，而宁德县的麻岭巡检司城则设于宁德深山当中的东洋。至于微观地形，福宁州沿海各巡检司城位于低山丘陵区，城址较为狭小。长乐县三个巡检司城以及福安县的白石巡检司城则地处滨海平原，可开拓空间较福宁州六城大。内陆巡检司城方面，麻岭巡检司城位于山间小盆地，是宁德县北部面积较大的平地。

表 3-2 明代闽东地区巡检司城规制表

	州县	城名	始筑年份	城周	城高
1	福宁州	水澳巡检司城	洪武二十年	一百六十丈	一丈五尺
2		大笪筓巡检司城	洪武二十年	一百六十丈	一丈五尺
3		青湾巡检司城	洪武二十年	一百六十丈	一丈五尺
4		高罗巡检司城	洪武二十年	一百六十丈	一丈五尺
5		延亭巡检司城	洪武二十年	一百六十丈	一丈五尺
6	长乐县	石梁蕉山巡检司城	嘉靖三十八年	三百六十余丈	一丈
7		小祉山巡检司城	嘉靖四十一年		

(续表)

8		松下巡检司城	嘉靖三十九年	三百一十余丈	
9	连江县	北茭巡检司城	洪武二十年	一百五十丈	
			嘉靖四十年	二百八十九丈	
10	福安县	白石巡检司城	成化八年	两百丈	一丈二尺
11	宁德县	麻岭巡检司城	宣德年间	一百六十丈	一丈五尺
			嘉靖三十五年	四百八十五丈	一丈五尺

(本表据弘治《八闽通志》、万历《福州府志》、乾隆《连江县志》、民国《长乐县志》以及1993年版《周宁县志》整理)

从表 3-2 来看,洪武年间的巡检司城由于集体兴筑,无论城周或城高都有统一的规划。如果加上宣德年间创立的麻岭巡检司城以及稍后讨论的柘洋巡检司城,可以看出自明初至正统年间,巡检司城的规制似乎都有严格的规定。嘉靖年间,麻岭巡检司城与北茭巡检司城突破了原来的城周,拓宽了城墙。长乐县三个巡检司城则于这个时期筑城,城周大约三百余丈。结合前段关于微观地貌的叙述,可以看出嘉靖倭患期间许多巡检司城由于周围平地较多,能够筑城或拓城以抵御倭寇。至于福宁州几个巡检司城,在嘉靖二十八年之时已经荒芜。各官兵都躲至邻近人烟稠密之处避难,再加上周围低地有限,未见增拓当在情理之中。

第三节、土堡

明代后期闽东地区涌现不少民筑城堡。这些城堡规模小者仅守御僻远的村落,大者保卫热闹的集镇,规模甚至超越一些县城。由于资料稀少,许多土堡湮灭于历史当中。所幸的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土堡仍然留下城墙,或是记录筑城始末的文献。有鉴于此,笔者将详细叙述这类城堡。至于其他的城堡,笔者或通过方志钩沉,或从今人的发掘中窥斑见豹,尝试概括民筑土堡的形态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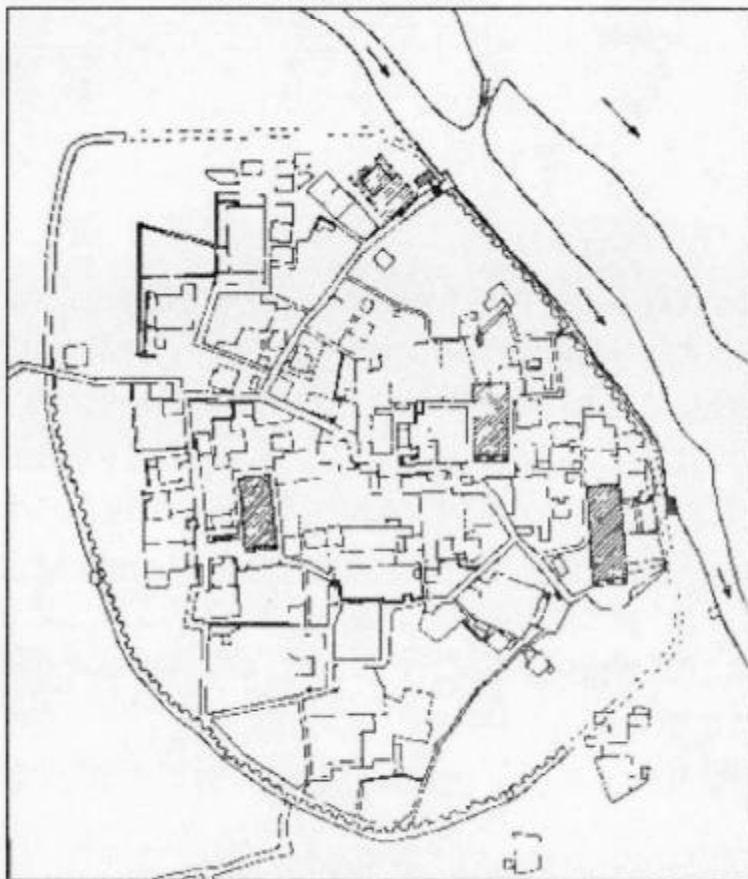
(一) 廉村堡

廉村堡位于福安县穆阳溪中游,今属福安市西潭村廉村村,明时则属福安县三十六都,在万历《福安县志》的记载中仅有“廉溪西浒”寥寥四字。¹福建省文物局曾到过廉村村考察,根据他们所绘的地势示意图来看,廉村堡位于穆阳溪西岸,西面、北

¹ (明)陆以载 总修:万历《福安县志》卷二《营缮志·乡堡》,《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面以及东南面均有海拔两百米以下的山丘。该地由于黄崎港的发展，逐渐成为闽东北与浙南的物资集散地。陈姓为当地的世家大族，自唐末起就定居廉村。¹建置方面，廉村堡的周长为 1,200 米（约四百丈）、高 4.4 米（约一丈五尺）、厚 3.6 米（约一丈一尺），共辟六门。从遗留下来的城墙看来，这一土堡呈椭圆形。

图 3-5 廉村堡轮廓图



（取自福建省文物局主编：《福建北部古村落调查报告》，2006，科学出版社，第 166 页。）

（二）甘棠堡

甘棠堡东临赛江，位于今福安市甘棠镇的东门村、南门村、西门村以及北门村，明时属福安县七都。该地于宋庆历年间（1041-1048）与宋元丰三年（1080）分别围海造田以及围筑塘堤。之后，当地人沿岸形成聚落，官塘、南塘与外塘合称三塘。²据光绪《福安县志》记载，嘉靖三十八年，倭寇的入侵导致乡民离散，知县卢仲甸曾檄当地百姓筑堡自卫。³民国《甘棠堡琐志》中曾提及这一筑城始末：

¹ 福建省文物局主编：《福建北部古村落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65-16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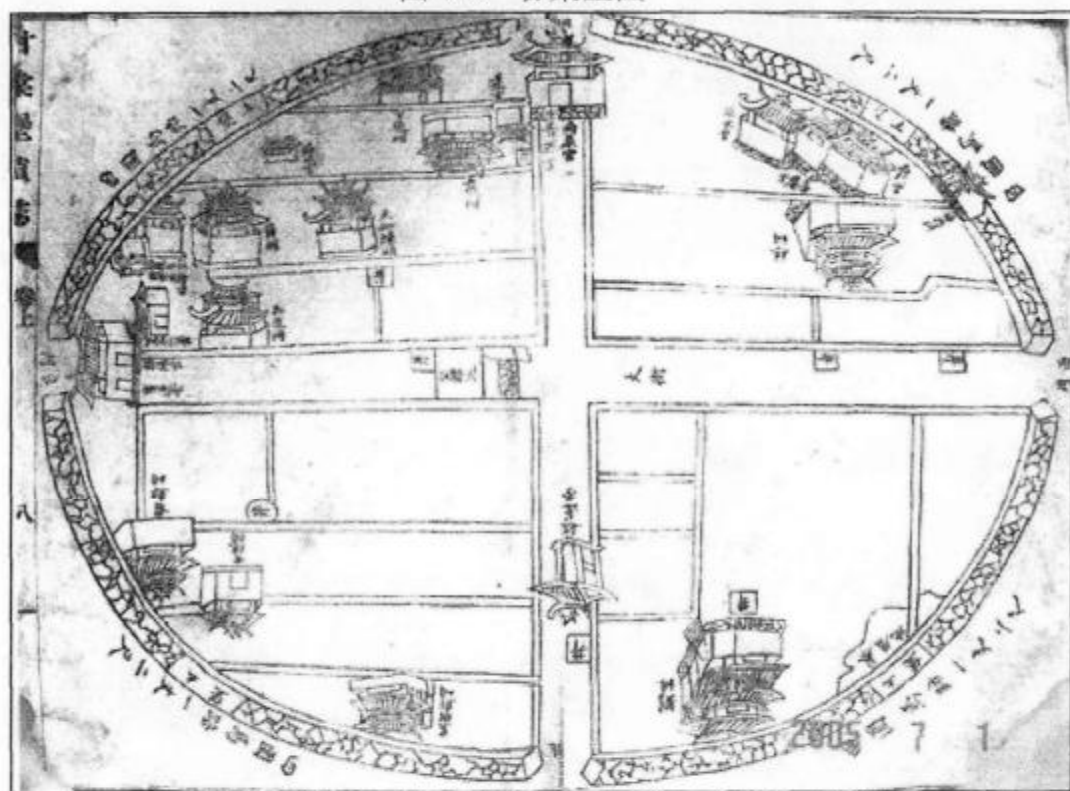
² 福建省福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安市志》，方志出版社，1999 年。

³ （清）张景祁 修 黄锦灿等 纂：光绪《福安县志》卷五《城池·土堡附》，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第 480 页。

“(卢仲甸)手书火牌谕招三塘百姓并避祸在县老民而谓之曰：‘尔等皆豪杰有志之士，久离乡土，何不相其地利，围筑土堡，助你一半城工。’”¹

百姓避祸于县城，拥挤不堪，且容易散播疾病，让他们各自筑堡自卫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有了知县的檄文，当地百姓于嘉靖四十二年筑城，竣工于隆庆元年。

图 3-6 甘棠堡图



(《甘棠堡琐志》，民国十六年(1927)刊本。转引自：陈进国：

《仪式、信仰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542页。)

甘棠堡周长四百七十五丈，经当时福清县有名的风水师方少山规划而建。该城东、西、北三面不远处皆有山环绕，赛江流过城东南，形成良好的山水格局。此外，甘棠堡轮廓呈椭圆形，城内形成整齐的十字街。城门的命名同样颇为考究，方少山有如下说法：

“后以三台天然拱秀，六印焕乎文章，又其名曰：南辰门。林嵩居长溪赤岸中，唐乾符二年进士。衣锦还乡，僖宗皇帝钦赐其乡曰：劝儒。里曰：擢秀。后分居南塘，今迁堡内。地分西门，门外有茵峰耸秀。转而西，又有莲岫分香，乃上马大贵人，而名曰：擢秀门，默符擢秀里桂枝亭是也。城之坐亥向巳，主三台小、三、合之秀。堂堂南面，群山辅弼有情，环而抱之。而群山环抱，北辰之尊也。

¹ 《甘棠堡琐记》，“官塘国筑土堡先后事由”。转引自：陈支平、杨国桢：《明清福建土堡补论》，《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页。

门开挹之，故名曰：拱辰门。东门立于寅申之地，门外有双鳌峭拔，夹拱中央之平土。有幕下贵人之秀，乃寅宾出入之地。门开朝之，欲符丹凤朝阳之瑞也，故名曰：朝阳门。四门名义，古有所示矣。”¹

关于甘棠堡的择址，当时人曾指出“三塘之地虽雄，各临潮汐，可战而不可守，惟以七星墩田地留馐味之，官塘之地围筑土堡，不恃寇乱之时防守无虞，庶可以收四方山水之形胜矣。”²三塘地区相当大，筑堡不可能围入当地所有聚落。因此，当时人选取中心的七星墩田地，联同邻近村落，共筑土堡自卫。由于涉及的家族达二十四姓之多，土堡的内部管理相当复杂。杨国桢先生与陈支平先生曾撰文详论，³本文兹不赘述。

（三）湫村堡

湫村堡又名冷城堡，位于今福鼎县太姥山麓的冷城村，明时属福宁州十都。据嘉庆《福鼎县志》载，冷城堡始筑于嘉靖年间，由“叶、杨、王、刘等姓分段兴筑”。⁴土堡周长1,127米（约三百四十丈），高5.6米（约一丈七尺），厚4.67米（约一丈四尺），辟东、西、南三面城门。⁵该堡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轮廓呈圆形。

（四）古县三堡

笔者于第二章第四节中曾提及福宁州方志作者批评乡堡泛滥的情况。“至于乡堡之设，有司听民自筑，不免多滥。如古县一村而三堡鼎建，沙冷一埠而二堡角立。似宜并而为一，庶便千守。不然力弱勢分，鲜克济矣。”⁶经过笔者的求证，方志作者所批评的“古县一村而三堡”当指古县堡、下村堡以及沙塘堡。从地形来看，沙塘堡位于低地，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下村堡位于山丘上，而古县堡则位于更高的位置。从宜居的程度来说，沙塘堡优于下村堡，而下村堡又优于古县堡。从聚落的大小以及聚落的高度来看，这样的分布情况似乎是三方势力角逐的结果。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土堡拥有很强的排他性，且这些土堡的海拔高度相差甚大，要合并几乎不可能。从古县三堡的例子，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这类民筑城堡的特点。

¹ 《甘棠堡琐记》，“地师方少山问答遗言记”。

² 《甘棠堡琐记》，“官塘围筑土堡先后事由”。转引自：陈支平、杨国桢：《明清福建土堡补论》，《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³ 请参阅陈支平、杨国桢：《明清福建土堡补论》，《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29页。

⁴ （清）谭抡修 王锡龄等纂：嘉庆《福鼎县志》卷一《城池·附》，《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⁵ 福建省宁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德地区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

⁶ （明）殷之辂 修 朱梅等纂：万历《福宁州志》卷三《建置志·乡堡》，《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影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9页。

图 3-7 古县三堡组图



(本图据 Google Earth 绘制)

(五) 小结

由于土堡资料较为零散，笔者就所掌握的资料制成表 3-3，以加深对不同地区土堡的理解。

表 3-3 明代闽东地区土堡形态与规制表

	土堡	城周	城高	筑城姓氏/申请人	形态/规制
1	塘湾民城	约五十丈			山头上，一字形，南北走向。
2	翁崎民城	约两百丈			山巅，一字形，南北走向。
3	垓下民城	一百八十七丈	一丈二尺		背山面海。
4	海口民城	八百四十四丈			
5	化南民城	约四百五十丈	一丈六尺	本村人、时任广西布政使司的薛曾请旨建城	辟东、西、南、北四城门，另于西门和北门间辟一矮门以通向码头。南门名曰“南薰”。
6	东岱堡	五百三十丈	一丈二尺		位于敖江出海口。
7	幕浦堡	三百四十丈	一丈二尺	余氏	四城门。
8	小亭堡	二百四十丈	一丈	居民集资自建	西、南二城门。连中巨镇。
9	黄崎堡	四百四十一丈			居民集资自建。
10	奇达堡	四百二十丈			三城门。
11	苔基堡	四百二十丈		居民集资自建	南、北二城门。
12	透堡	三百一十丈			地坦，居稠齿繁。四城门。

(续表)

13	马鼻堡	四百二十丈			跨山面海，三城门。
14	鉴江堡	三百余丈		乡耆尤圣养、林猷等集资三百余两倡修。	辟东、西、南、北四门。北门形制较差。
15	赤岸堡	三百二十丈	二丈		四城门。
16	甘家崎堡	一里	一丈五尺		东、西、北三城门。环山而筑，南面平坦。
17	店下堡			喻、邹、丁、郑、易、宣六姓	开南、北、西三城门。
18	屿前堡			郑姓、钱姓	东、西各一城门。
19	黄岐堡				黄岐山顶，依山势坐北朝南而建。开东、西、南三城门。
20	桐山堡			高姓	
21	玉塘堡	约两百六十五丈	一丈一尺		北顺山势，南沿海边，环山一周，砌石而成。
22	下村堡			方姓、谢姓	
23	传胪堡	约两百丈	一丈二尺		西、南、北三城门。城呈正方形

首先，周围地貌左右了土堡的周长。闽县的塘湾民城与翁崎民城皆位于山巅，规模都不大。传胪堡与玉塘堡则地处福宁州沿海丘陵地带，周长略胜于上述两个民城。连江县的东岱、幕浦、小亭、黄崎、奇达、苔藓、马鼻与透堡八堡地处沿海平原地区，聚落较大，周长介于二百四十至五百三十丈之间。民主城堡中最大的属海口民城，该城位于福清县龙江下游出海口的冲击平原，平地面积最宽，规模也最大。至于高度，大部份土堡所筑城墙从一丈至一丈五尺不等，较官城低矮。至于筑城姓氏，就笔者所见就有一姓、二姓与六姓。城门方面，各堡所辟城门介于两个至四个之间，整体而言同样少于官城。

第四节、复式城市

两个相近的地区筑城，是古代中国城市中罕见的现象。闽东地区与明代陆续出现两个复式城市，即：福清县的镇东卫城与海口民城以及福宁州的柘洋堡与东安新堡。兹分述之。

(一) 镇东卫城与海口民城

镇东卫城位于今福清市海口镇城里村，明时属方民、新安二里间。《八闽通志》对镇东卫城的规制有细致的记载：

“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兴创筑。周围八百八十三丈三尺，高连女墙二丈三尺，阔一丈。为女墙凡一千三百四十有九，为窝铺凡四十有三。城四隅各辟一门，皆建楼其上。永乐十六年，增建战楼凡三十有一，并筑四门月城，俱高二丈。”¹ 由于镇东卫城扼守福清龙江出海口，且属于军事堡垒中级别最高的卫城，驻军达八千六百八十七名，² 因而规制也是卫所城之冠。除了规模甚大的城周与城高外，镇东卫城的四门皆设月城，防御功能显而易见。由于城池过大，军民难免混杂，因而军民分属新安与方民二里，便于管辖。从方志的风景图看来，镇东卫城呈不规则圆形，坐北朝南，且于筑城之初即将北面龙山围入城中。

图 3-8 嘉靖四十年年镇东卫城与海口民城大致范围图



(本图据 Google Earth 绘制)

邻近的海口民城则位于今福清市海口镇旧街江边，明时属方民里。城筑于嘉靖三十六年，清人林以采所纂《海口特志》载：

“(海口)城周围九百六十丈，女墙一千三百有六，警铺二十四，敌楼七，辟门五。北镇安，扁曰：乔岳钟灵。南擢桂，扁曰：浴日天香。西起龙，扁曰：风

¹ (明)黄仲昭 修纂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 整理：弘治《八闽通志》卷十三《地理·城池》，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37 页。

² (明)何乔远 编撰 厦门大学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古籍整理研究所 校点：崇祯《闽书》卷四十《捍圉志》，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000 页。

云会和。东通江，扁曰：澄江如练。西北嘉谿，扁曰：势壮辅车。起龙、镇安二门有月城。”¹

海口民城周长比镇东卫城更大，事实上海口镇在宋时已是闽中大镇。淳熙《三山志》在记载各县镇务的时候就提及“治平二年，海口镇始以钟门巡检兼监。其后，或复用县官，或别差官，然税额如故。”²可见当时海口镇商业发达，所交赋税相当可观。该城西面与北面近山，因而设月城以增加防卫。除了坐北朝南以及圆形的轮廓形态外，海口民城与镇东卫一样，将北面的东岳山与岩山围入城中。至于城中的大姓，民国《续海口志》云：

“方民聚族，明季甚繁。迄今三百余年，流离迁徙，屋宇尽为禾黍，墟矣。然就所存者而言，项姓一族，谢姓一族，务厚林姓、李姓两族。其余各姓所剩者，仅如硕果。”³

由此看来，明代海口城筑城之时，当地大族就至少有项、谢、林、李四姓。其他各姓不详，但都无法维持势力至民国时期。

尽管镇东卫城与海口民城近在咫尺，但海口城的筑城过程却甚为曲折。《海口特志》载：

“海口在卫右仅数武，居民恃以无恐。嘉靖三十四年，倭始寇闽，犯海口，屠杀焚掠。逃入镇东城内，受其侮辱。非一虽怨望，而计无复之。适巡按吉公澄请发帑金七千七百两赈恤，委福宁府钟公号侍山来，堪海口甚于别地，允畀赈金。镇庠林公立、周德安、耆民韩宗仁、林惠时金呈于巡抚阮公鹗并道府，不愿赈而愿城。不足酉，画丁居，并呈准海口船税每年五六百金禄饷，缘以助之，咸可其事。未几，代换者王公询代、巡者樊公猷科复重其役，委本府节推徐公必进覆堪。以海口城匪独为一方民，寔镇东犄角，县之咽喉保障。当道更喜甚，檄邑侯蔡公宗文董之。公转委一尹协守陈公永定，县城乱，遂檄参军苏公友时。分任者难其人少，参项公志德举里中殷寔有才者五十二人密揭之。官使之领班建造，县符猝下，人不能卸也。内里八人寔难独刀，遂以两人朋一班，共四十八班。时又有以塔山一带坟堆阻隔，当道诸公力排其说：舍数万之生灵，树数区之枯骨？不通之论也！此项公祠记中有也。苏公语项公，项公语其故。苏公曰：无患也。明日驰匹马，系灰袋马后，听马所之有灰痕处便立基，挠者治以法。于是拈阄画地，每班二十丈。依山者土寔而基易立，附海者地淤而功难就。有倍蓰其程者，造未一载，淫雨匝月。筑而圯，圯而筑。耗工两倍。”⁴

¹（清）林以采 纂：康熙《海口特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0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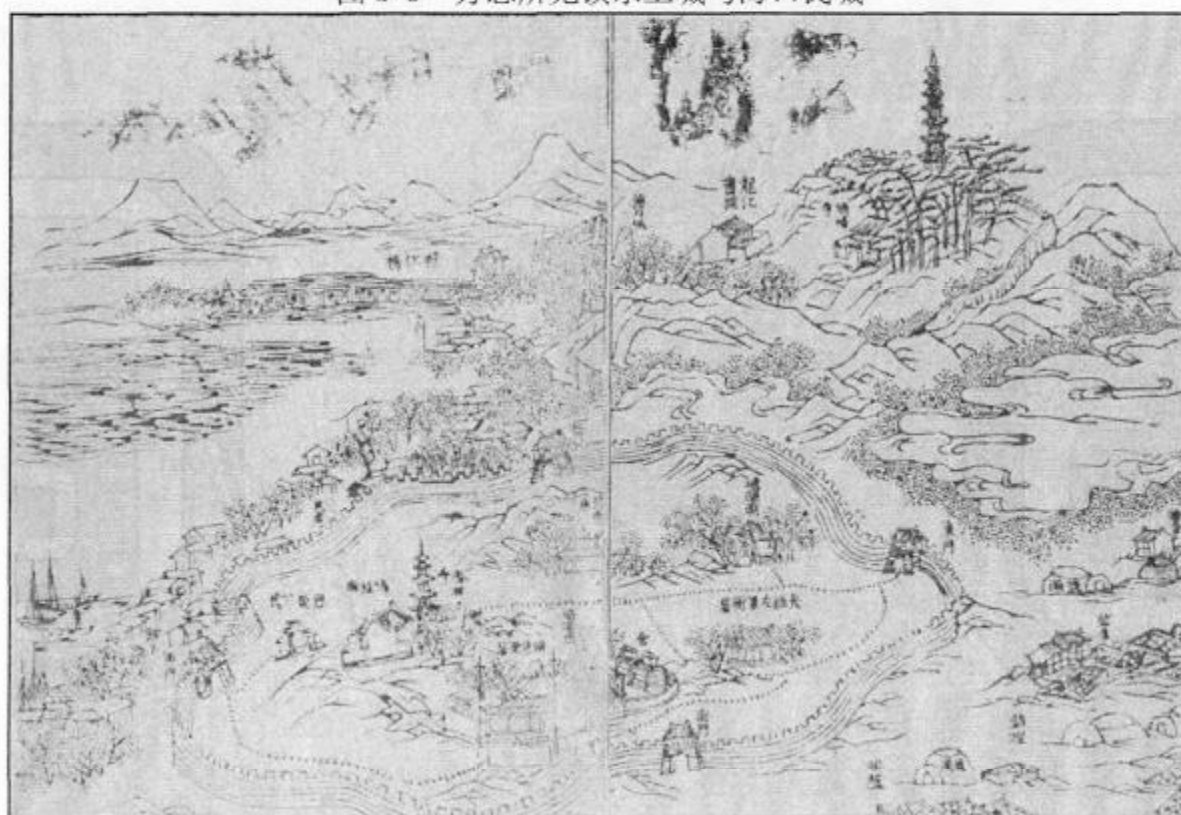
²（宋）梁克家 著 陈叔侗 校注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整理：淳熙《三山志》卷九《公廨类三·诸县镇务》，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年版。

³（民国）林宜恒 纂：民国《续海口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41 342 页。

⁴同 1。

据乾隆《福清县志》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倭陷海口，且阅月，兵数千无敢以一矢相加。”¹倭寇猖狂，官兵又极为懦弱，进镇东卫城内避难的百姓甚至遭遇侮辱。坚实的堡垒形同虚设，于是海口居民决定用赈金筑城。但是，申请筑城并不容易。官员徐必进考察后报告说海口城可与镇东卫城互为犄角，巩固县城门户的安全，才获允筑城。获得官方允许后，负责的官员却以当地能胜任城工的匠人有限为由从中阻挠。在当地人项志德暗中上交五十二人的名单后，才得到县衙的允许。正要动工之时，当地人又以附近的塔山有不少坟墓而却步。为了使众人信服，参军苏友时命人将灰带系于马上，以马奔跑中留下的灰迹作为城址，才得以筑城。

图 3-9 方志所见镇东卫城与海口民城



（取自光绪《福清县志》“总盐场图”。注：此图为上西下东）

（二）柘洋堡与东安新堡

柘洋堡又称“龙城”或“下城”，位于今柘荣县双城镇龙溪西岸，明时属福宁州三十三都。该堡筑于元末，当时的中书参政袁天禄筑堡以守卫州境。正统六年，柘洋

¹（清）饶安鼎 邵应龙 修 林昂 李修卿 纂：乾隆《福清县志》卷二十《附遗篇·与戚将军言指挥使童乾震死事书》，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刊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08页。

巡检司置于此堡当中，并于该年重修。¹由于筑城时曾挖塚，当地“民怨有谣”。²柘洋堡周长八百四十丈，高一丈五尺，辟有四门，分别为东门“宣寅”，南门“纳福”，西门“拱仙”，北门“迎龙”。其中，南门筑有月城。嘉靖三十七年挡柘洋堡住了倭寇的攻击后，龙溪东岸又筑东安新堡，或称“龙城”、“上城”。东安新堡同样有四个城门，东为“迎日门”，西为“登龙门”，南为“仁寿门”，北为“衣锦门”。³

图 3-10 嘉靖三十七年柘洋堡与东安新堡图



(本图据 Google Earth 绘制)

(三) 小结

章生道先生是最早对中国古代城市中的复式城市进行分类的学者，他将复式城市定义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筑有城墙的独立部分组成的城市”。根据章先生的研究，复式城市共有五种类型，分别为：（一）行使国家权力的集团为达到种族隔离从而有利于控制的目的而筹建，如清代的满城；（二）在河流或运河两岸的沿河集合城市，带有分别筑城的两个组成部份，如汉水上的樊城；（三）等级高的官府不设在兼作等级低的地方首府之中，而分属不同的城市，如广东的惠州府与归善县；（四）由一个

¹（明）何乔远 编撰 厦门大学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古籍整理研究所 校点：崇祯《闽书》卷四十《捍圉志》，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996 页。

²（清）徐景熹 主修 福州市旧志 点校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整理：乾隆《福州府志》卷六《建置志·土堡》，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 年版。

³刘康华：《姐妹城考》，《福建史志》，1987 年第 2 期。

行政城市其其商埠组成，如湖北的汉口与汉阳；（五）治所迁移后仍保留旧有聚落，如直隶顺天府的密云。¹近年来，鲁西奇先生则从形成过程与历史成因的角度将复式城市归类为两种类型，即：汇合型与拓展型。汇合型城市指的是“本来相对独立的的城市，随着经济交往的不断增加、交通条件的改善或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彼此间的联系逐步加强，最后形成拥有两个或多个中心，具有区域功能分化的统一城市”，而拓展型城市则是“由一个城郭逐渐形成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城郭。无论是由于政治或行政管理的需要，还是由于商业的发展在原城郭之外形成了商埠，它均是由一个城郭逐步拓展而形成的，即现有一个城郭，然后在其附近营建另一个城郭，甚至是第三、四个城郭，从而形成复式城市。”²

从复式城市的形成过程来看，闽东地区的两个复式城市似乎无法归入上述两种分类。海口民城的兴起是因为邻近的镇东卫城没有发挥守卫地方的职能，而新安东堡是由于龙溪对岸的柘洋堡屡受倭寇侵扰，成功退敌后而兴筑。在嘉靖倭患这一背景下，城墙的兴起受经济、交通的因素的影响甚小。事实上，在那一政府无力抵抗外敌的时期，各地都自发修筑城墙自卫。复式城市的形成，反而说明了当地的军政与民政各自为政，缺乏整合。

第五节、小结

和治所城市复杂的社会关系不同，军事堡垒与民筑城堡皆根据共同的目标与利益筑城。卫所城与巡检司城于始筑之初即由政府统一规划，城墙能依图而筑，确保有效地利用周围地形，达到最好的防御效果。另一方面，民筑城堡是各地乡族在协调利益之后的产物。尽管规模小且分散，但各土堡或于山巅筑山城，或依山而建，又或是与邻近土堡互为犄角，构成中国古代城市独特的风景线。

值得一提的是，倭患的冲击使得闽东地区出现了两种与众不同的城市形态。第一种是“理想的的城市”，福安县的甘棠堡即是典型的例子。甘棠堡是三塘一带各姓相互妥协的产物，由于没有官方力量的支配，该堡能够根据风水师的规划兴建，规整的城墙，笔直的十字街，与治所城市曲折的轮廓与凌乱的街道形成强烈的对比。此外，各自为政的复式城市也是中国古代城市中的异态。镇东卫城守军的欺凌使得邻近的海口镇被迫筑城自保，两座城市近在咫尺却互不相助，与一般通过经济交往逐步形成的复式城市截然不同。

¹ 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见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第100-103页。

² 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年，第434-435页。

结论

无论是整体研究或区域研究，学界均认为明代是普遍筑城时期。学者一般将明代筑城分为几个阶段，尽管略有分歧，但都认为筑城是军事冲突的反应。从闽东地区的例子来看，筑城运动不仅是“军事威胁-筑城”的简单过程，更反应了明廷筑城政策不断妥协的变化。明代初期，明廷尝试于沿海地区构建以水寨、卫所以及巡检司为主的防御体系，通过“守在四境”的方式防御各治所城市。自正统朝起，内陆山区的民变迫使明廷允许当地治所筑城。尽管如此，沿海治所仍然奉行“守在四境”的筑城政策，直到嘉靖三十四年的嘉靖倭患前才由巡按王忬统一筑城。由于嘉靖倭患对各治所城市造成巨大破坏，官方只得允许民间筑城自卫，各土堡和民城应时兴起。军事堡垒、治所城市以及民筑城堡三类城市兴起的时空差异，正好说明了明代筑城运动的实质。

至于城市形态，三类城市也体现了完全不同的特点。闽东地区各治所地处适于农业发展的低地，是唐代以前移民开发的结果。各治所驻地邻近闽东地区重要河流，由于该地区西北-东南的山势特征而形成“西北傍山，东南濒水”的特点。治所城市的城墙主要沿着南面的河流兴建，但也会因为防守的考量将北面的山体围入城中。另一方面，卫所城以及巡检司城的择址则以军事控守为第一考量。这些军事堡垒由于防守区域不同而朝向不一，但于筑城之初即有效地利用周围地形。至于土堡和民城，由于各聚落的贫富悬殊，择址特征与城墙轮廓大相径庭。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闽东地区的城市形态受地形影响颇深，未如北方城市那样普遍呈正方形或长方形，体现城市规划制度向传统礼制复归的现象，但是一些土堡如甘棠堡却因为在战乱这一特殊背景下不受官方约束，通过风水师的规划体现传统风水思想。

除此之外，闽东的案例也显示治所城市的等级与规模之间没有太多的关联。事实上，城市等级影响筑城次数，而城市规模则受制于周围地貌。另一方面，卫所城与巡检司城却因为隶属关系而呈现规模上的差异。嘉靖倭患期间，狭小的巡检司城已容纳不下增长的人口，一些巡检司城因而突破明初的规模限制，拓宽城墙。至于民城，有甚者如海口民城，其规模甚至超越一般治所。而福宁都北部于嘉靖年间兴筑的桐山堡，从高家一姓所筑的土堡变为巡检司驻地，更逐渐发展成清乾隆四年的福鼎县城，体现了一个城市规模的逐渐扩大以及性质的变化。

最后，闽东地区于嘉靖年间出现了特殊的复式城市。与其他地区的复式城市不同，镇东卫城与海口民城以及柘洋堡与东安新堡体现的不是经济交流日趋紧密的结果，而是分别是军事防御上孤立与合作的产物。

附录一：明代闽东各城营建历史

一、福州府城（福建省城）

城址：今福州市鼓楼区

筑城史：

	年号纪年	公元纪年	营建类型	营建活动
1	晋太康三年	282	新建	太守严高筑城于越王山之南为子城。《淳熙三山志》
2	唐中和间	九世纪末	增建	观察使郑镒修拓子城东南隅，开城南河。《淳熙三山志》
3	唐文德元年	888	增建	观察使陈岩复修子城，甃之以砖石。《淳熙三山志》
4	唐乾宁四年	897	增建	王潮筑子城，为永平城。《淳熙三山志》
5	唐天复元年	901	新建	王审知创筑罗城十二里，设大门及便门十六，水门三。《淳熙三山志》
6	后梁开平元年	907	新建	王审知初筑南、北夹城，谓之南月城、北月城。南城便门六，水门二。北城大门二，便门五。《淳熙三山志》
7	后梁乾化二年	912	增建	王审知筑子城，为内城。《淳熙三山志》
8	宋开宝七年	974	整修	钱昱重修东、南夹城，即外城。《淳熙三山志》
9	宋太平兴国	978	毁弃	宋廷诏堕福州城不用。《淳熙三山志》
10	宋皇祐四年	1052	整修	曹颖叔渐次修复外城。《淳熙三山志》
11	宋熙宁二年	1069	增建	增拓子城西南隅，表里累以甃石。上设女墙，其下覆以椽瓦为台。《淳熙三山志》
			毁弃	罗城西门缺不复作。《淳熙三山志》
12	宋熙宁八年	1075	整修	元郎中积中甃子城以重甃，密置候楼。《淳熙三山志》
13	宋政和五年	1115	毁弃	罗城南门复废不治。《淳熙三山志》
14	宋绍兴元年	1131	整修	程迈以巷石累四瓮门。《淳熙三山志》

(续表)

15	淳熙间	十二世纪末		子城尚如旧，而罗城则存通津、海晏、延远、永安、安善、清远六门，夹城则存美化、水部、井楼、严胜、遗爱、迎仙六门，外城则存合沙、通仙、行春、汤井、船场、怡山六门。《弘治八闽通志》
16	宋咸淳九年	1273	增建	增筑外城。《弘治八闽通志》
17	元至正十四年	1354	整修	元代城壁复渐堕废，平章陈友定又加缮葺。《弘治八闽通志》
18	明洪武四年	1371	增建	驸马都尉王恭因元故址筑焉，修砌以石，北跨越王山，南则因故外城绕九仙、鸟石之麓。《弘治八闽通志》
19	明洪武六年	1373	整修	福州中卫指挥李惠重加修治，并建楼櫓，周而覆之。《弘治八闽通志》
				今有门七，南门即故南夹城宁越门也。北门故北夹城严胜门也。东门旧外城行春门也。西门旧北夹城迎仙门也。东南仍曰水部门。东曰汤门，即汤井门也。东北曰井楼门，即故船场门也。《读史方輿纪要》
20	明成化十九年	1483	整修	闽大风雨，敌楼、战屋并守宿之铺摧毁殆尽。镇守太监陈道，会巡按监察御史汪奎，及方岳重臣渐次缮理，悉复其旧。《弘治八闽通志》
21	嘉靖三十八年	1559	增建	增置外敌台，堞壕。《万历福州府志》

二、长乐县城

城址：今长乐市吴航镇

筑城史：

	年号纪年	公元纪年	营建类型	营建活动
1	弘治三年	1490	新建	长乐旧无城池。知县潘府奉例造筑，建立四

(续表)

1	弘治三年	1490	新建	门。《弘治长乐县志》
				知县潘府乃拓地而城之，广袤仅里许。《乾隆长乐县志》
2	嘉靖三十二年	1553	新建	知县詹莱筑城，城门五，水门五。《乾隆长乐县志》
3	嘉靖四十年	1561	增建	知县戴时望西引江潮，东接溪水，环城一带，藉以为固。《乾隆长乐县志》
4	隆庆三年	1569	整修	知县蒋以忠改水关之木栅为石梁柱。《乾隆长乐县志》
5	崇祯十四年	1641	增建	知县夏允彝复扩城二百八十丈有奇，北据山巅。造水关一。开河五百三十丈。《乾隆长乐县志》
			整修	修复旧城楼、敌台、窝铺、城垛。《乾隆长乐县志》

三、连江县城

城址：今连江县凤城镇

筑城史：

	年号纪年	公元纪年	营建类型	营建活动
1	嘉靖三年	1524	新建	连江旧无城。参政蔡潮始建四门、敌楼。《民国连江县志》
2	嘉靖十九年	1540	新建	通判徐访筑城。役起是年冬，次年夏告成。《民国连江县志》
3	嘉靖二十一年	1452	整修	洪水冲颓其半，徐访监修复完。《民国连江县志》
4	嘉靖三十六年	1467	增建	分巡金事盛唐增高三尺。《民国连江县志》
			整修	洪水，城东圯。知县史元功昼夜督修。《民国连江县志》
5	嘉靖四十一年	1472	增建	知县熊尹臣建警铺、敌楼，规制大备。《民

(续表)

5	嘉靖四十一年	1472	增建	《国连江县志》
6	万历九年	1581	增建	城圯于水。知县刘挺修之。寻以淫雨复圯，知县朱应奎修之，并添造小东门瓮城一座。 《民国连江县志》

四、福清县城

城址：今福清市融城镇

筑城史：

	年号纪年	公元纪年	营建类型	营建活动
1	宋宝庆三年	1227	新建	无城，仅有五门。《乾隆福清县志》
2	正德八年	1513	新建	邑令朱袞复新四门。《乾隆福清县志》
3	嘉靖三十三年	1464	新建	巡抚王忬筑福清城。《乾隆福清县志》
4	嘉靖三十七年	1468	增建	县令罗向辰于北阜之逼城者增垣高四尺，造二敌台。《乾隆福清县志》
5	万历二十二年	1594	增建	县令丁永祚拓北城于山巅，就西偏为北门，缩东北隅三之一为小北门，移西城于山椒，四门各益以月城。《乾隆福清县志》
6	天启四年	1624	增建	县令康承祖于西北城增高四尺。《乾隆福清县志》
7	崇祯七年	1634	整修	署令郑尚友复举而修之。《乾隆福清县志》

五、古田县城

城址：今古田县玉屏镇

筑城史：

	年号纪年	公元纪年	营建类型	营建活动
--	------	------	------	------

(续表)

1	弘治十五年	1502	新建	永福县令姚楨与古田县令相继完成筑城。 《乾隆古田县志》
2	嘉靖四十年	1561	增建	县令陈冲建敌楼西北隅。《乾隆古田县志》
3	嘉靖四十一年	1562	增建	县令王所增高城垣三尺。《乾隆古田县志》
4	万历中	十六世纪末	增建	县令刘曰旸修城门九，城北跨山，县龙入脉系焉。《乾隆古田县志》
5	天启中	十七世纪初	整修	城崩塌不堪，十已去其八九。县令吴柔与邑绅余文龙议捐大修，至今赖之。《乾隆古田县志》

六、永福县城

城址：今永泰县樟城镇

筑城史：

	年号纪年	公元纪年	营建类型	营建活动
1	嘉靖三年	1524	新建	推官张浚筑城，石基土墉，为门四。《万历永福县志》
2	嘉靖三十二年	1463	整修	知县文惠缮修四门。《万历永福县志》
3	嘉靖三十八年	1469	增建	署县事知事武瀛稍为修葺，增建敌楼者十。《万历永福县志》
4	隆庆六年	1572	整修	知县陈克侯重修倾圯。《万历永福县志》
5	万历十八年	1590	增建	知县陈思谟自东门二台以至北门八台改移内山之顶。凡拆旧城三百三十三丈，更筑新城二百七十九丈，狭其旧址五十一丈。旧墉以土，今墉以砖。《万历永福县志》
6	万历三十七年	1609	增建	自嘉靖三十八年，倭奴内讧，因闭北门不启，至是遂塞之。知县袁世用复累石而辟之，建敌楼其上。《万历永福县志》

七、罗源县城

城址：今罗源县凤山镇

筑城史：

	年号纪年	公元纪年	营建类型	营建活动
1	弘治年间	十五世纪末	新建	知县李南始筑土墙，辟门十一处。《康熙罗源县志》
2	弘治年间	十五世纪末	新建	知县徐珪始请筑土堡二百丈，毁旧门，见新门六。《康熙罗源县志》
3	正德年间	十六世纪初	增建	知县黄相干东西门外增筑捍御。《康熙罗源县志》
4	嘉靖三十七年	1468	增建	推官徐必进拓之，以防倭，延袤三里许，辟城四。《崇祯闽书》
5	万历二年	1574	增建	知县萧蔚增筑垛堞，移迎恩门当岐阳孔道。《康熙罗源县志》
6	万历七年	1579	增建	邑人郑子亨、黄元珍砌以大石。《康熙罗源县志》
7	万历年间	十六世纪末	增建	城墙增高三尺，加造敌台六座，周垣覆以串楼，重砌水关，辟五门。《康熙罗源县志》

八、福宁州城

城址：今霞浦县松城镇

筑城史：

	年号纪年	公元纪年	营建类型	营建活动
1	洪武四年	1371	新建	始筑城。《万历福宁州志》
2	洪武二十年	1387	增建	江夏侯周德兴撤东城，拓开一里，城增高三尺。《万历福宁州志》

(续表)

3	永乐五年	1407	增建	增筑四门月城，城复增高三尺，周围有濠。《万历福宁州志》
4	成化十七年	1481	整修	指挥朱珍重修门楼。《万历福宁州志》
5	正德中	十六世纪初	增建	知州万廷彩、欧阳嵩先后浚濠加广。《崇祯闽书》
6	嘉靖三十四年	1555	增建	知州钟一元帮拓西城二里，而旧西城犹在。《万历福宁州志》
7	嘉靖三十七年	1558	整修	夏潦，城崩，修复。《万历福宁州志》
8	嘉靖三十八年	1559	增建	拆卸旧城，增高四尺，厚三尺，城周一千五十八丈。《万历福宁州志》
9	嘉靖四十一年	1562	整修	知州夏汝砺增修。《万历福宁州志》
10	隆庆二年	1568	毁弃	州同王守中毁旧西城，辇其土石筑东敌台。《万历福宁州志》
11	万历十三年	1585	增建	分巡徐用检下令筑城，下用石，上用砖。《万历福宁州志》
12	万历十九年	1591	增建	城高二丈三尺，厚一丈三尺。濠阔三丈，深一丈五尺，城周一千五十八丈，濠州一千八百丈。《万历福宁州志》

九、宁德县城

城址：今宁德市蕉城镇

筑城史：

	年号纪年	公元纪年	营建类型	营建活动
1	唐		新建	城于白鹤山阳，即今所立四门：东曰崇仁，西曰和义，南曰德化，北曰朝天。岁久而圯。《乾隆宁德县志》
2	宋		增建	环以木栅。《乾隆宁德县志》
3	正德元年	1506	增建	县令高应易木栅以砖，开五门。《乾隆宁德县志》

(续表)

4	嘉靖四年	1525	增建	县丞李诏凿石厢北门及西南隅。《乾隆宁德县志》
5	嘉靖四十年	1561	毁弃	陷于倭，夷为平地。《乾隆宁德县志》
6	嘉靖四十二年	1563	新建	县令林时芳采石重造，辟四门，塞原小东门。内外马道，环以深濠，上通山涧，下接海潮。《乾隆宁德县志》

十、福安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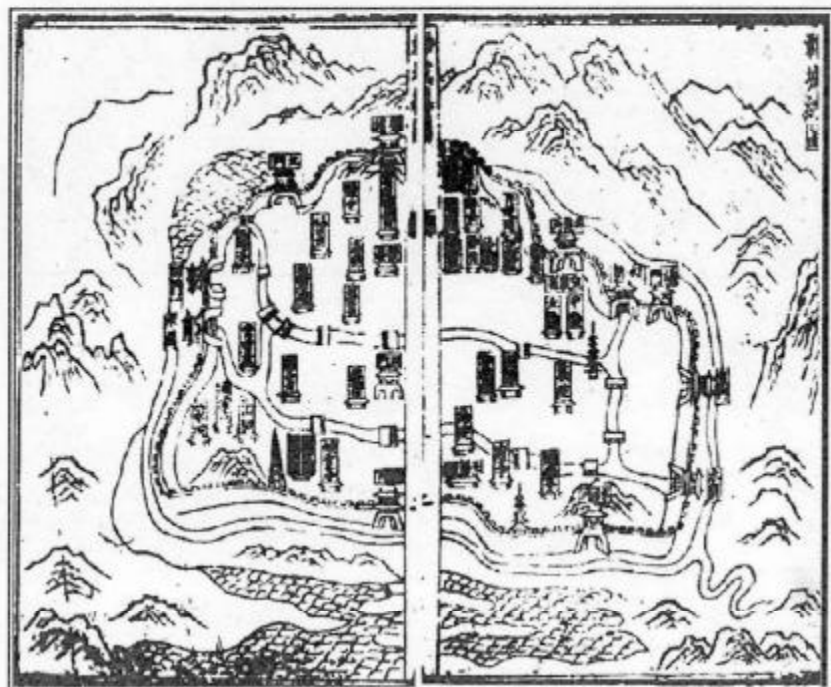
城址：今福安市韩阳镇

筑城史：

	年号纪年	公元纪年	营建类型	营建活动
1			新建	旧未城，惟土城墙，立四门，广袤各三里，周十余里。《崇祯闽书》
2	正德元年	1506	新建	累砖为城，开五门。《万历福宁州志》
3	嘉靖六年	1527	整修	重修以石，厢五门。《万历福宁州志》
4	嘉靖三十七年	1558	增建	改造。尚未完而倭至。《万历福宁州志》
5	嘉靖三十八年	1559	毁弃	城陷。分巡舒春芳相度城基，知县卢仲佃且筑且守。濠由大西门抵南门，浚二百九十六丈，广三丈，深三之一，增小北门。《光绪福安县志》
6	万历九年	1581	增建	大水夜至，全城漂没。死者数千，城尽圯。知县汪美修旧城之南而展其东。筑西门壩，高一丈八尺，以遏水。《万历福宁州志》
7	万历二十一年	1593	增建	县令陆以载以东城鹤山高逼，不利防守，议改仍旧址，于壩则略增高厚。是防水、预警之计两得之矣。《万历福宁州志》

附录二：文献所见闽东地区各城池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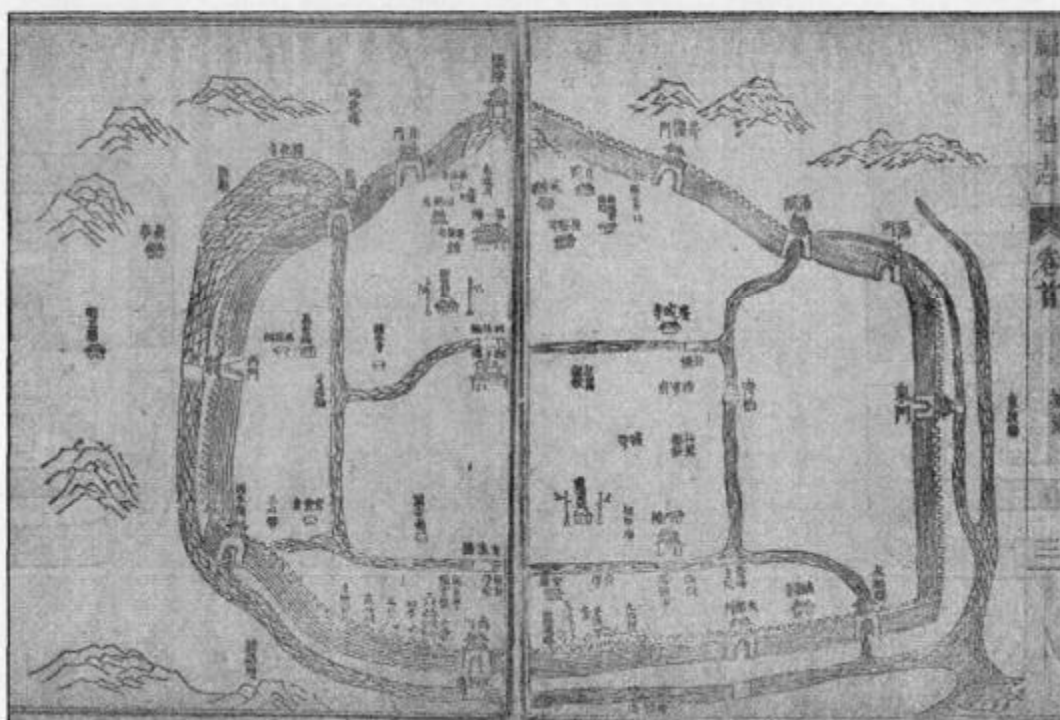
一、福建府城（福建省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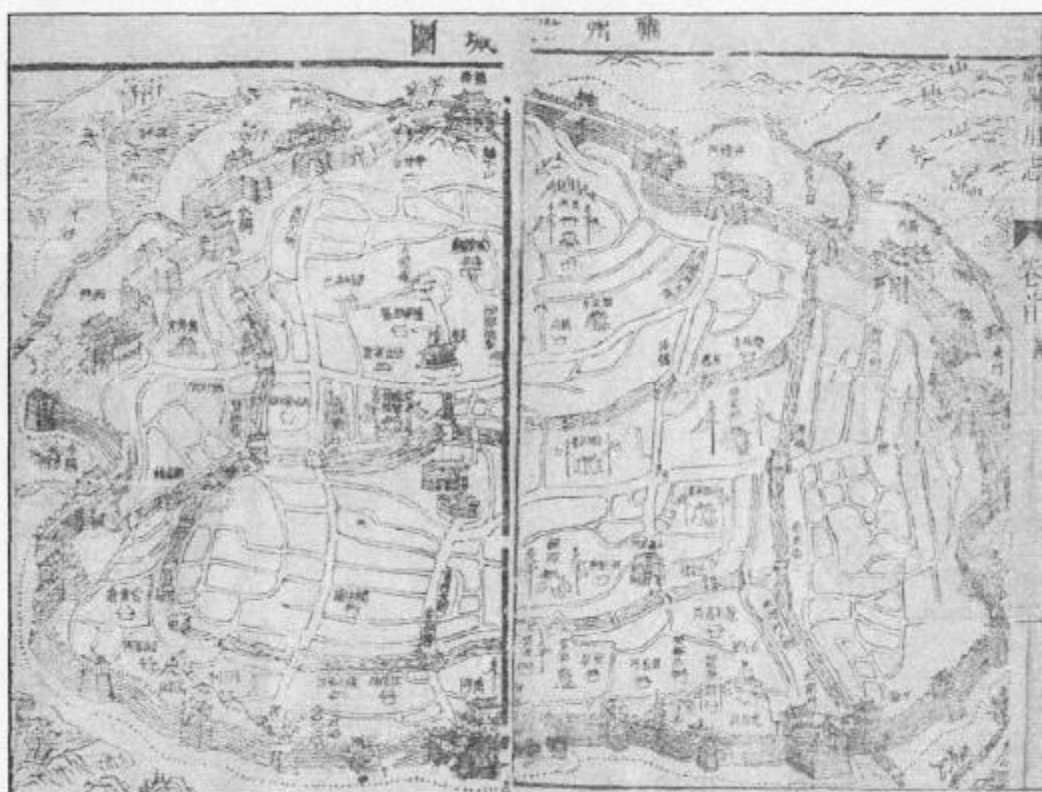
万历《福州府志》郡城图



万历《闽都记》福州府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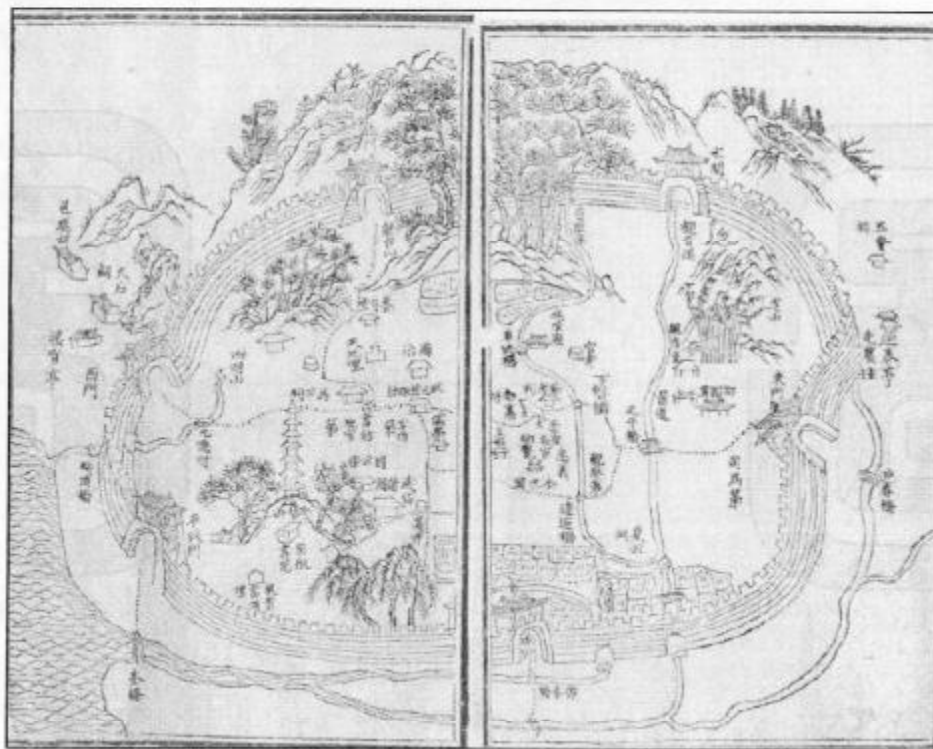


乾隆《福建通志》福州府城池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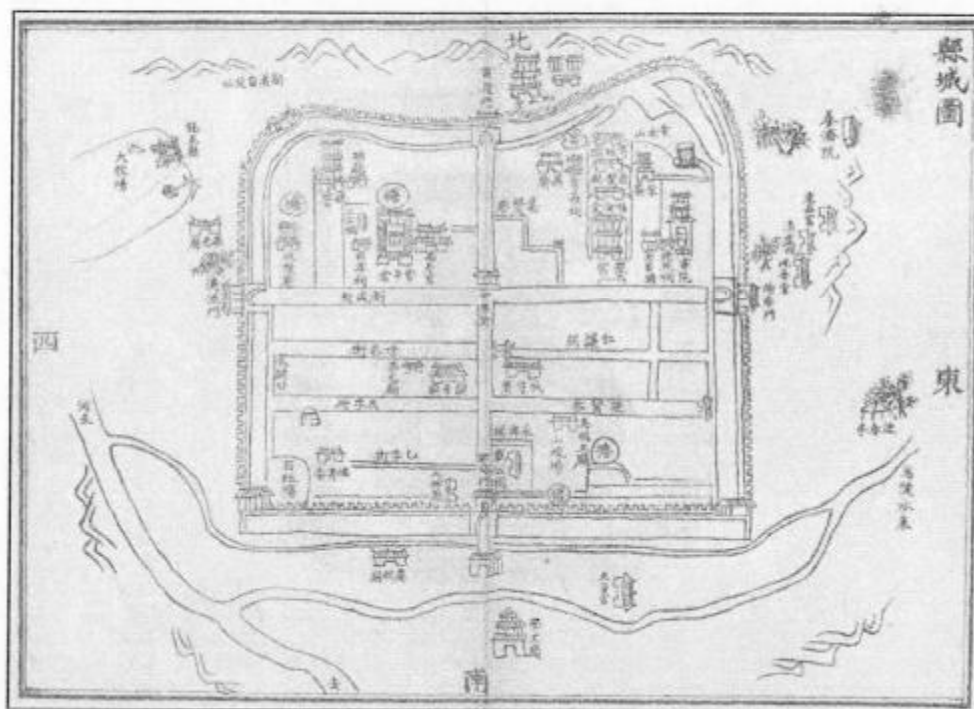


乾隆《福州府志》福州府城图

二、长乐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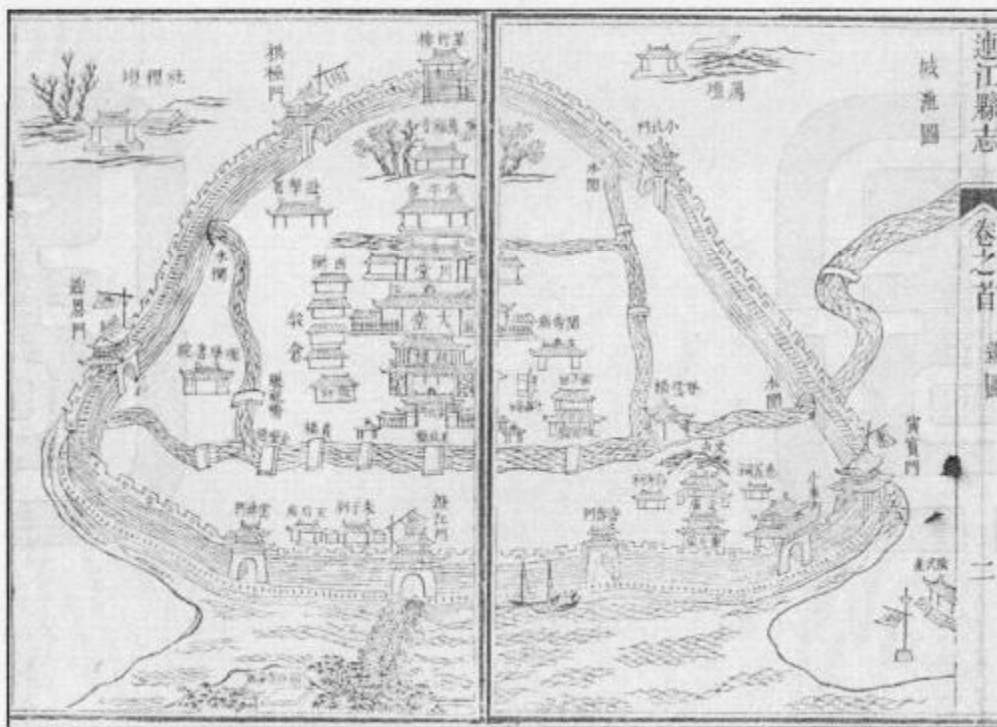


乾隆《长乐县志》县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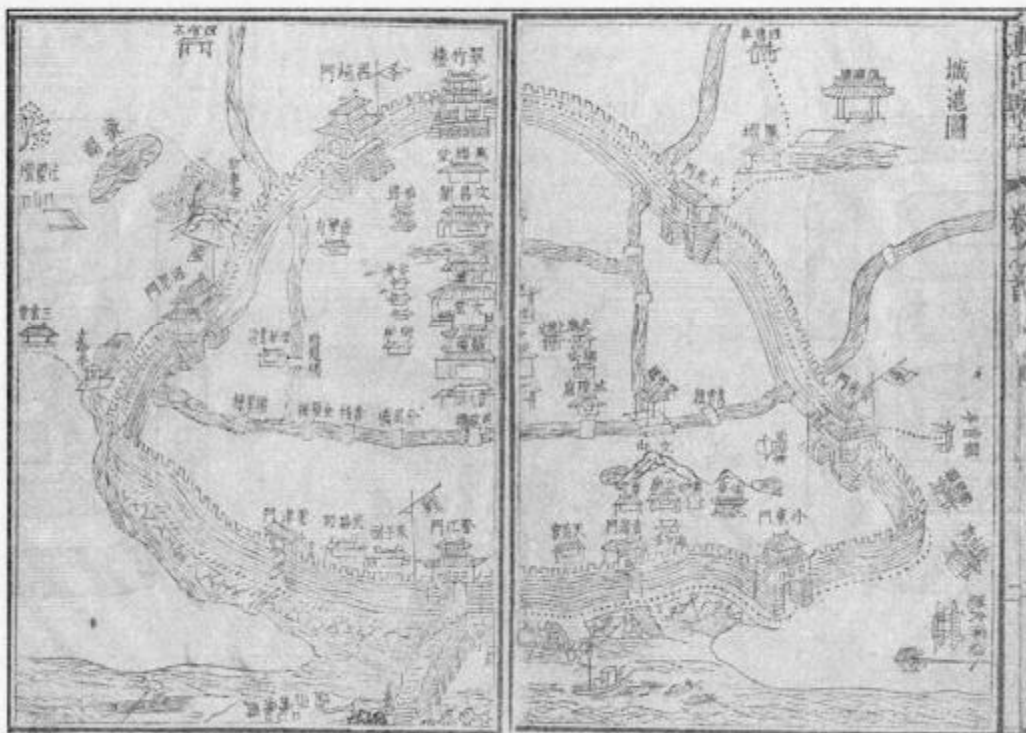


道光《长乐县志》县城图

三、连江县城



乾隆《连江县志》县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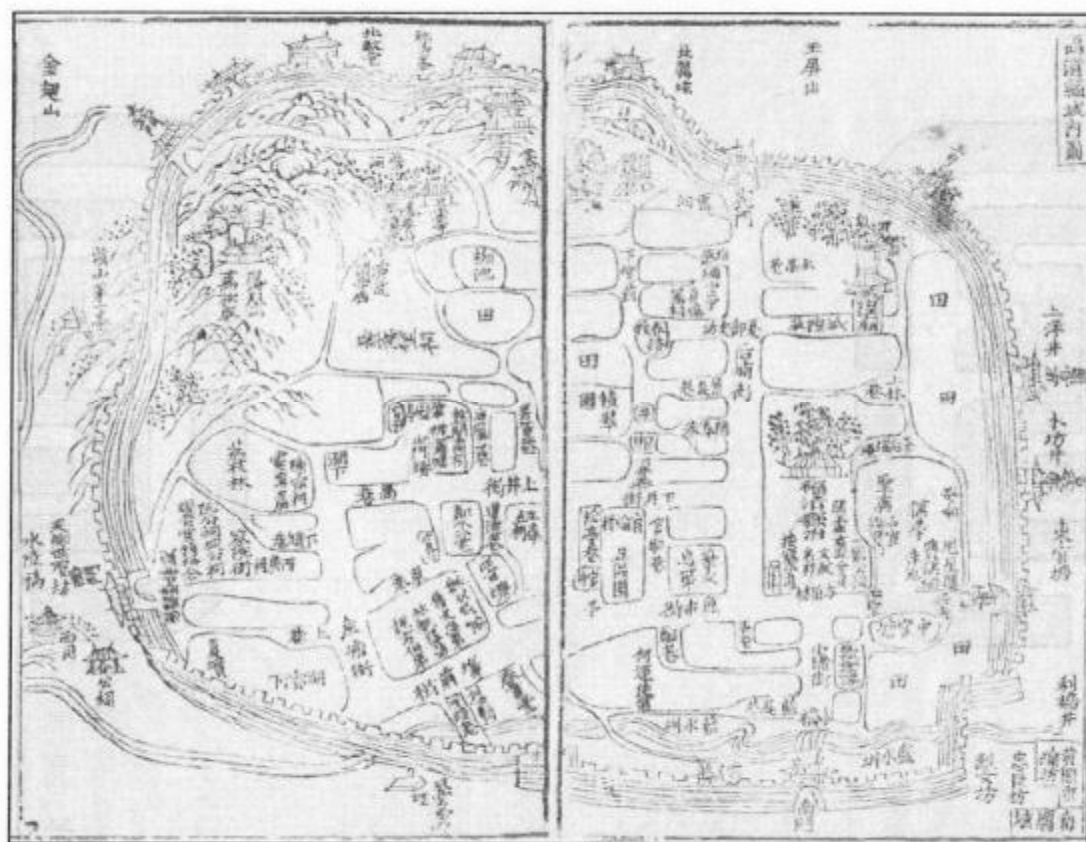


嘉庆《连江县志》县城图



民国《连江县志》县城附近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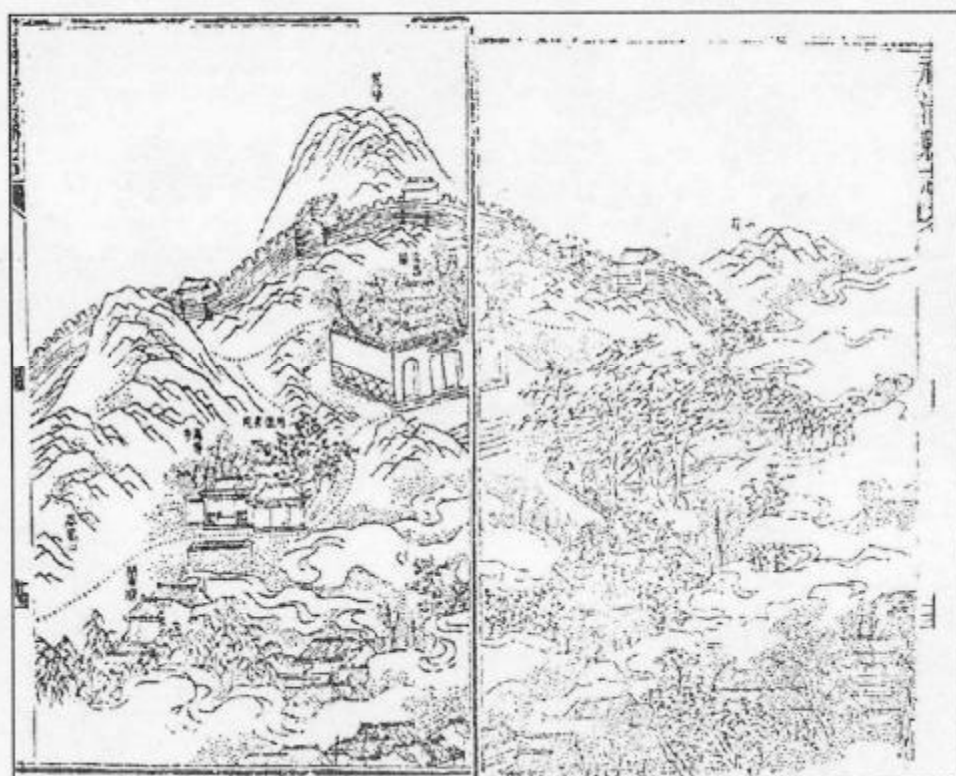
四、福清县城



康熙《福清县志》县城内图



乾隆《福清县志》县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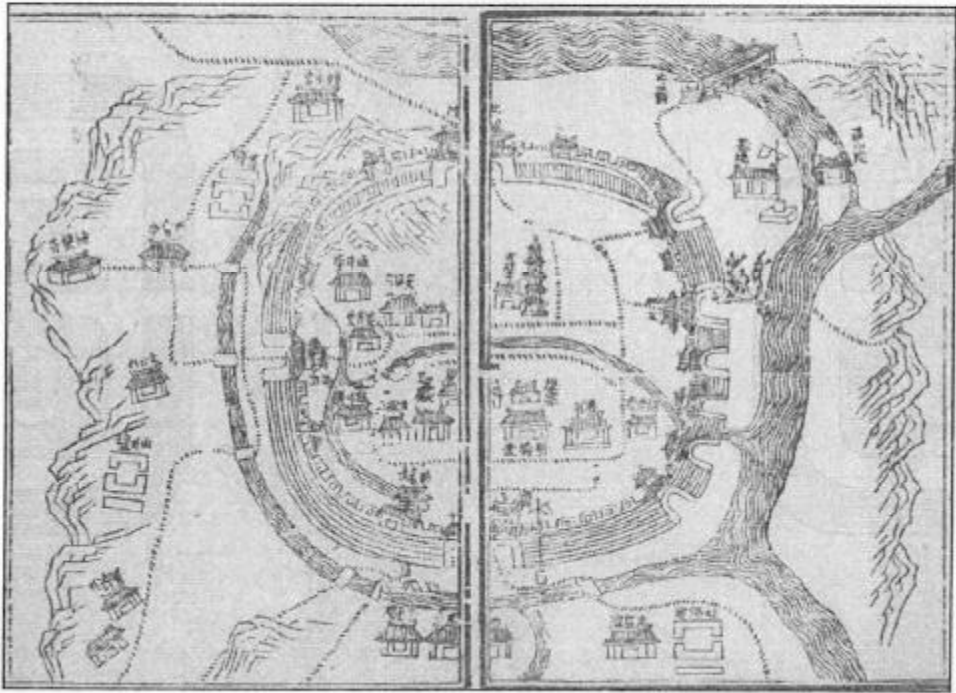


乾隆《福清县志》斗牛悬阁图

五、古田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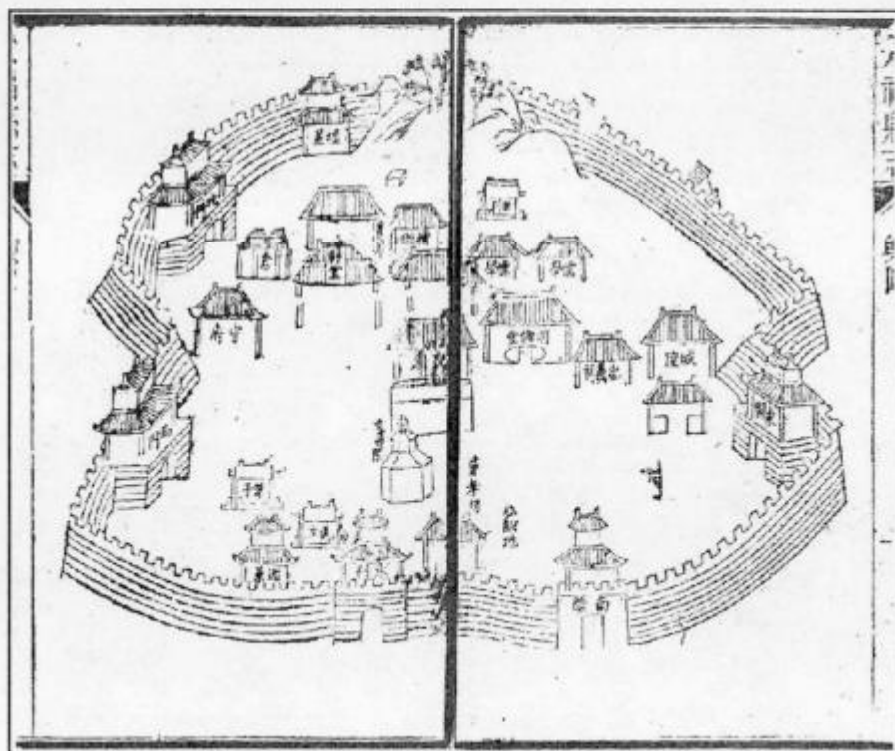


乾隆《福州府志》古田县疆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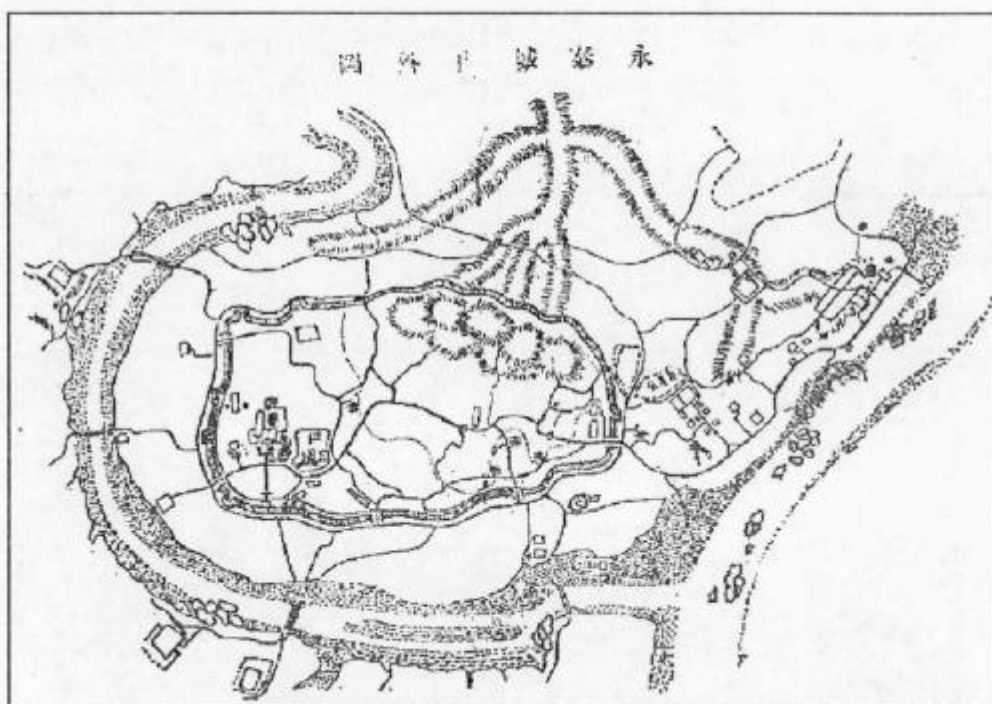


乾隆《古田县志》城图

六、永福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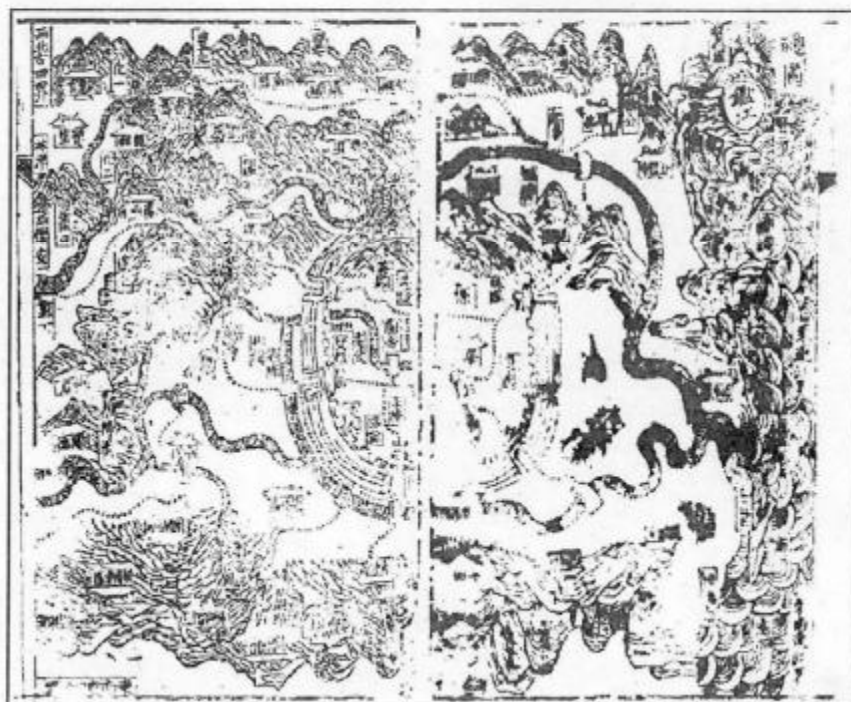


乾隆《永福县志》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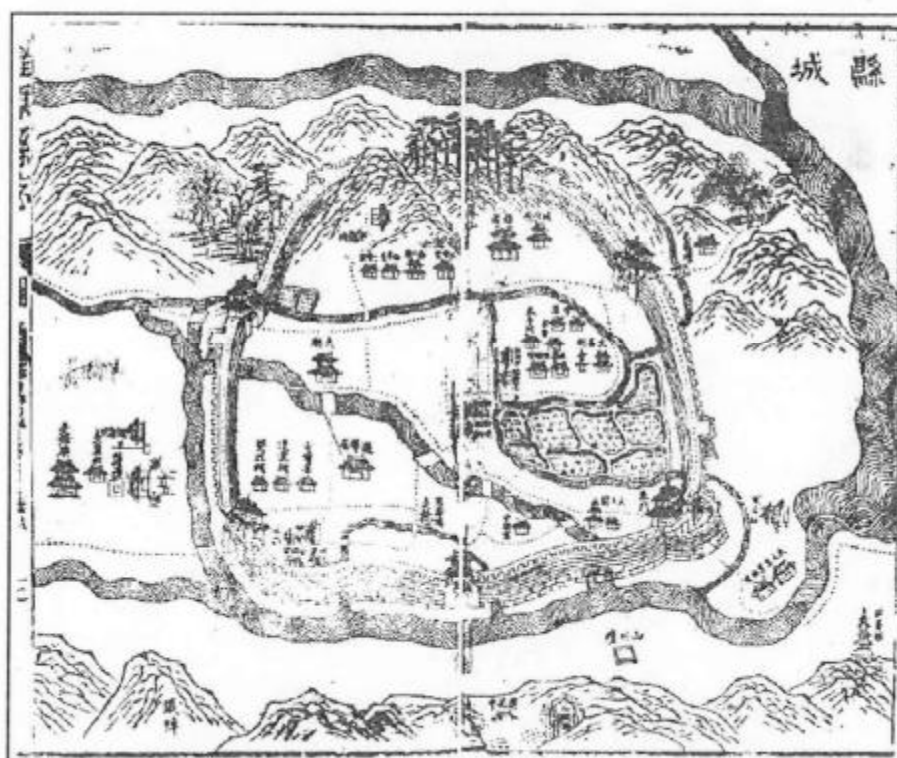


民国《永泰县志》城内外图

七、罗源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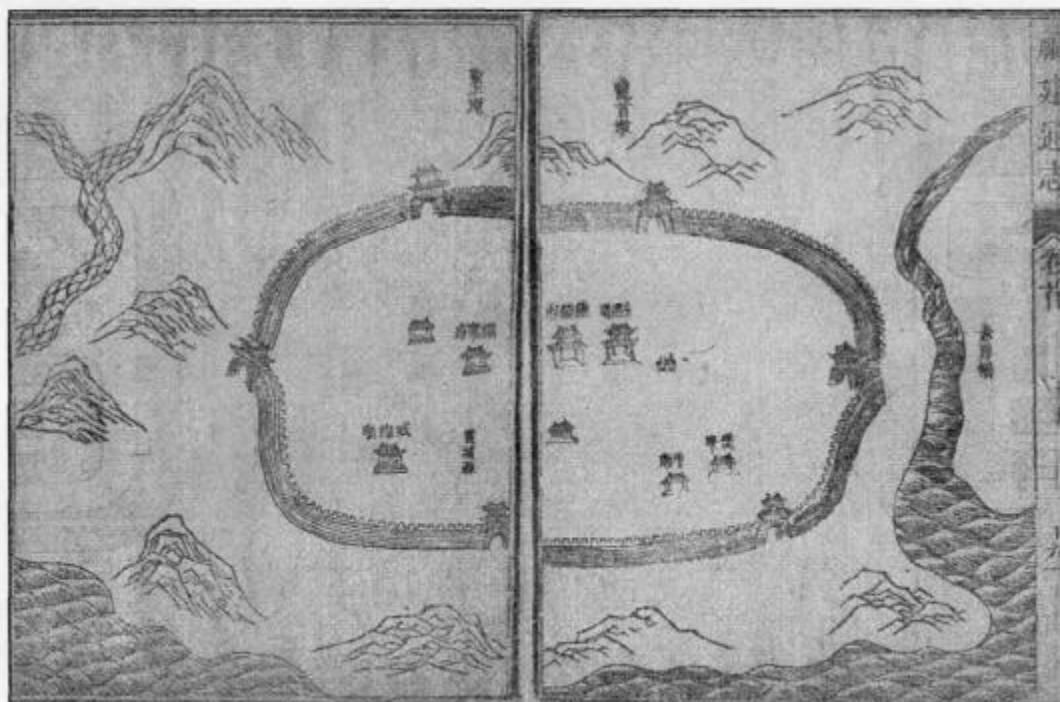


康熙《罗源县城》总图



道光《新修罗源县志》县城图

八、福宁州城



乾隆《福建通志》福宁府城池图



乾隆《福宁府志》府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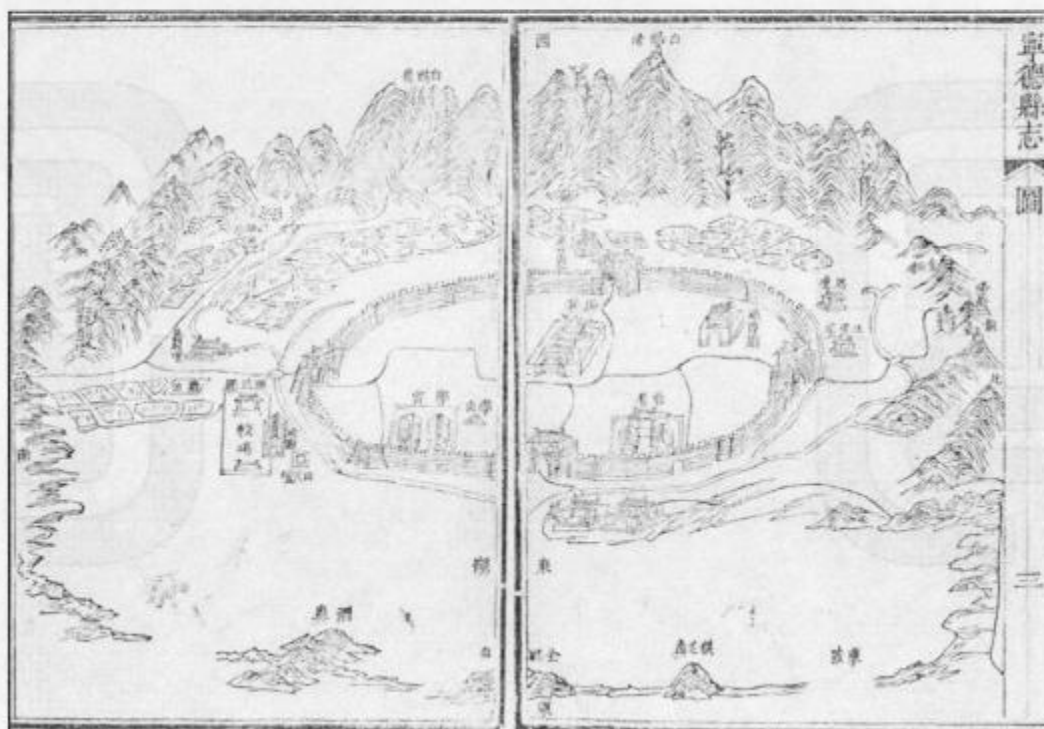


光緒《福甯府志》府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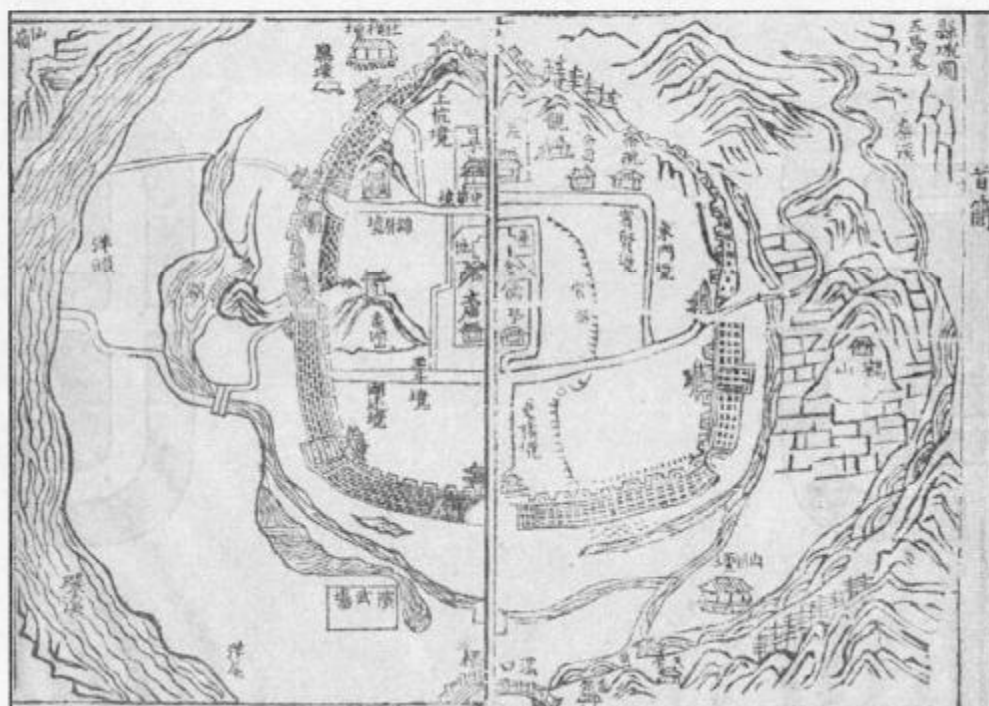
民國《霞浦縣志》城市全圖

九、宁德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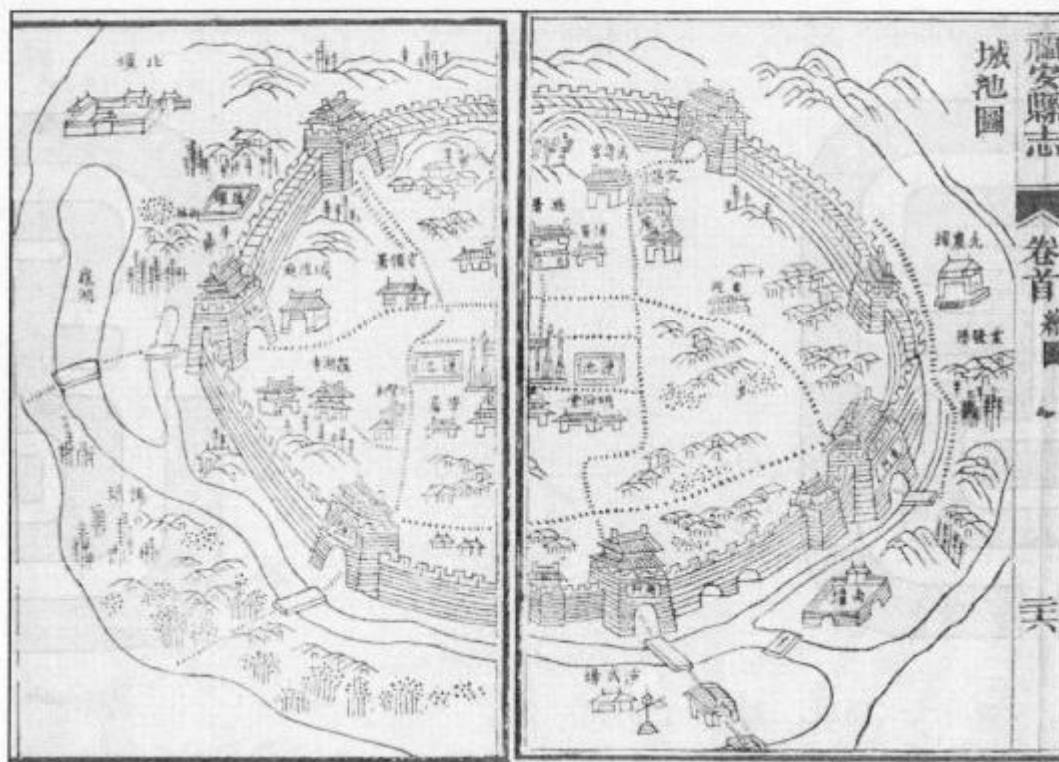


乾隆《宁德县志》县城图

十、福安县城



康熙《福安县志》县城图



光緒《福安縣志》县城图



光緒《福安縣志》龟湖夕照图

参考文献

古籍书目

（一）、正史与实录

- [1]（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版。
- [2]（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版。
- [3]《明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1962 年版。

（二）、地理总志与地方志

- [4]（宋）梁克家 著 陈叔侗 校注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整理：淳熙《三山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年版。
- [5]（明）黄仲昭 修纂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 整理：弘治《八闽通志》[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 [6]（明）何乔远 编撰 厦门大学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古籍整理研究所 校点：崇祯《闽书》[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 [7]（清）郝玉麟 谢道承等 修纂：乾隆《福建通志》[M]，清乾隆二年（1737）刻本。
- [8]（明）叶溥 张孟敬 纂修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整理：正德《福州府志》[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 年版。
- [9]（明）王应山 纂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万历《闽都记》[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 年版。
- [10]（明）林燦等 纂：万历《福州府志》[M]，《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版。
- [11]（明）殷之辂 修 朱梅等 纂：万历《福宁州志》[M]，《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影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
- [12]（明）阳思谦 修 黄凤翔 类编：万历《泉州府志》[M]，泉州志编纂委员会，1985 年影印汇刊本。
- [13]（清）徐景熹 主修 福州市旧志 点校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整理：乾隆《福州府志》[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 年版。
- [14]（清）朱珪 修 李拔 纂：乾隆《福宁府志》[M]，《中国方志丛书》（据光绪六年重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版。

- [15] (明)王涣 修 刘则和 潘援 纂:弘治《长乐县志》[M],明弘治十六年(1503)刊本。
- [16] (清)贺世骏 修 沈成国等 纂:乾隆《长乐县志》[M],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 [17] (清)侯坤元 修 温训 纂:道光《长乐县志》[M],民国间(1912-1949)铅印本。
- [18] (民国)李驹等纂 孟昭涵 修:民国《长乐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 [19] (清)戚弢言 修 孙发曾 纂:乾隆《连江县志》[M],清乾隆五年(1740)刻本。
- [20] (清)李萃 修 章朝枳 纂:嘉庆《连江县志》[M],清嘉庆十年(1805)刊本。
- [21] (民国)曹刚 修 邱景雍 纂:民国《连江县志》[M],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
- [22] (清)李传甲 修 郭文祥 纂:康熙《福清县志》[M],清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 [23] (清)饶安鼎 邵应龙 修 林昂 李修卿 纂:乾隆《福清县志》[M],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刊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 [24] (清)辛竟可 修 林咸吉等 纂:乾隆《古田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据乾隆十六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
- [25] (民国)黄澄渊 修 余钟英等 纂:民国《古田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 [26] (明)唐学仁 修 谢肇淛等 纂 永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万历《永福县志》[M],万历四十年(1612)抄本,福州:海峡书局出版社,2012年版。
- [27] (清)陈焱 修 俞荔 纂 永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乾隆《永福县志》[M],乾隆十四年(1749)刊本,福州:海峡书局出版社,2011年版。
- [28] (清)王楠 修 林乔藩 纂:康熙《罗源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 [29] (清)卢凤琴 修 林春溥 纂:道光《新修罗源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 [30] (民国)罗汝泽等 修 徐友梧等 纂:民国《霞浦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 [31] (清)谭抡 修 王锡龄等 纂:嘉庆《福鼎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 [32] (清)卢建其 修 张君宾 纂:乾隆《宁德县志》[M],乾隆四十六年(1781)刊本。

- [33]（明）陆以载 总修：万历《福安县志》[M]，《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
- [34]（清）巫三祝主修 陈晓梧 主纂：康熙《福安县志》[M]，清康熙二十年（1681）刻本。
- [35]（清）张景祁 修 黄锦灿等 纂：光绪《福安县志》[M]，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版。
- [36]（清）张廷球 修 徐铄 纂 龙岩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乾隆《龙岩州志》[M]，福州：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7 年版。
- [37]（清）林以采 纂：康熙《海口特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年版。
- [38]（民国）林宜恒 纂：民国《续海口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年版。
- [39]（清）佚名 纂：道光《长乐梅花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年版。

（三）、兵书与文集

- [40]（清）顾炎武 撰 谭其骧 王文楚 朱惠荣等 校点：《肇域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
- [41]（清）顾祖禹 撰 贺次君 施和金 校点：《读史方輿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版。
- [42]（明）郑若曾：《筹海图编》[M]，《中国兵书集成（第 15-16 册）》（据明嘉靖四十一年胡宗宪刻本影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辽宁：沈阳书社，1990 年版。
- [43]（明）陈子龙等 辑：《皇明经世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

现代书目

（一）、地方志与文史资料

- [44]福建省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第 1 册）》[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年版。
- [45]福建省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第 7 册）》[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年版。

- [46]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马尾区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 年版。
- [47]福清市编纂委员会编：《福清市志》[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 [48]长乐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乐市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 [49]连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连江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 年版。
- [50]福建省罗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罗源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年版。
- [51]永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永泰县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年版。
- 福建省宁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德地区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年版。
- [52]宁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德市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版。
- [53]福建省福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安市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年版。
- [54]福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鼎市志》[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3 年版。
- [55]柘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柘荣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版。
- [56]周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周宁县志》[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年版。
- [57]古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古田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版。
- [58]福建省霞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霞浦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年版。
- [59]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史志》[M]，1987 年第 2 期。

（二）研究著述

- [60]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 [61]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
- [62]施坚雅 主编 叶光庭等 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版。
- [63]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M]，北京：三联书店，1983 年版。
- [64]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
- [65]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版。

- [66]张驭寰：《中国城池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年版。
- [67]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M]，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版。
- [68]朱维干：《福建史稿（下册）》[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
- [69]吕进贵：《明代的巡检制度——地方治安基层组织及其运作》[M]，（台湾）明史研究小组明史研究丛刊 06，2002 年版。
- [70]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 年。
- [71]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 [72]黄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与游兵》[M]，（台湾）明史研究小组明史研究丛刊 01，2001 年版。
- [73]杨金森、范中义：《中国海防史（上）》[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年版。
- [74]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 [75]一丁、雨露、洪涌：《中国古代风水与建筑选址》[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年版。
- [76]福建省文物局主编：《福建北部古村落调查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
- [77]周振鹤：《周振鹤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 [78]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五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 [79]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十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三）学位论文

- [80]张利坤：《明蒙军事冲突下的筑城运动与地方社会——以山西治所城市为中心的考察》[D]，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
- [81]黄友泉：《明代前期福建的海防体系》[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

（四）期刊论文

- [82]Sen-Dou Chang, "Some Aspects of the Urban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Hsien Capital"[J], I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51, No.1, Mar., 1961.

- [83]Sen-Dou Chang, "Some Observation on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Walled Cities" [J], I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60, No.1, Mar., 1970.
- [84]成一农: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方法反思》[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第27卷第1辑, 2012年1月。
- [85]徐泓: 《明代福建的筑城运动》[J], 台湾《暨大学报》, 1999年1期。
- [86]陈支平、杨国桢: 《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J], 《中国社会经济史》, 1985年第2期。
- [87]楼建龙: 《福建土堡建筑综述》[J], 《福建文博》, 2009年第1期。
- [88]范中义: 《明代海防述略》[J], 《历史研究》, 1990年3期。
- [89]王日根: 《明代海防建设与倭寇、海贼的炽盛》[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4期。
- [90]黄敬斌: 《利益与安全: 明代江南的筑城与修城活动》[J], 《史林》, 3/2011。
- [91]郑振满: 《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兼论明中叶的财政改革》[J], 《中国史研究》, 1998年第1期。
- [92]马正林: 《中国城市的选址与河流》[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12月。
- [93]林拓: 《福建县级政区建置的地域分异及其整合过程——兼论自然区与行政区的关系》[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1年9月。
- [94]陈宏、刘沛林: 《风水的空间模式对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影响》[J], 《城市规划》, 1995.4。
- [95]阮道明: 《“会城重镇”——定海》[J], 《福州乡土》, 2004.04。
- [96]胡亚楠、李华珍: 《廉村传统建筑的审美意象透视》[J], 《福建建筑》, 2009年第3期。

(五) 地图集

- [97]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福建省历史地图集》[M], 福州: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2004年版。
- [98]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福建省自然地图集》[M],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年版。

电子资源

(一) 网站

[99]Digital Archive of Toyo Bunko Rare Books:

<http://dsr.nii.ac.jp/toyobunko/Lb-69/V-1/page/0104.html.en>

[100]USC Digital Library:

<http://digitallibrary.usc.edu/cdm/singleitem/collection/p15799coll123/id/49371/rec/1>

(二) 软件

[101]Google Earth version 6.2.2.6613

后记

时光如梭，三年的留学生涯即将走到尾声。犹记得三年前的这个时候，安老师通过越洋电话同战战兢兢的我进行面试。过程中没有苛刻的提问，更像是一个长辈和晚辈在闲聊。也因为这个缘份，后来安老师成了我的导师。安老师循循善诱，总是提醒我们阅读史料要着重分析，注意研究区域的社会背景，切莫淹没在史料当中，忘了学术研究的初衷。“对什么感兴趣，就写什么。”正因为安老师开明的态度，我得以在学术的汪洋大海中无拘无束地探索，度过了难忘的三年。

曾经为更换题目的事情担忧不已的我，于研一暑假的某个雨后拜访罗凯师兄。师兄和我侃侃而谈，鼓励我趁开题前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只要找到适合题目，安老师也会为我感到高兴。后来师兄到四川大学执教，他临走前我因为有事回国，错过了请师兄吃饭道谢的机会，至今仍然引以为憾。和周德春师兄接触不多，但每次见面，师兄温和的态度和殷勤的问候总让我印象深刻。郭岩伟师兄为人热情，他经常邀请我到访他的家乡张家口，让我看看明代的野长城。每次暑假都因为各种琐事而无缘拜访师兄，但是感激之情常在心底。穆俊学姐与我同时入师门，为人直率真诚，一起当会务的日子里，她见我忧心忡忡，百忙之余仍然不忘鼓励我，在寒冷的冬季温暖我心。此外，龙小峰师兄、田毅师姐还有魏玉帅同学都曾在我学习的路上多次协助，在此一并感谢。

研一那年和同学们一起上课的日子早已远去，偶尔经过教室，仍会想起那段美好时光。每一个学期末的同学聚餐，让我看到了大家课业之余有趣的一面。毕业在即，倒数的日子总让我心慌。骊歌响起以后，我会很想念老师们上课的身影。还有一众马来西亚的同乡，和你们郊游、聚餐的日子丰富了我的生活，让我见闻学习两不误。

最后，我必须深深感激我的父母。在一片不看好的声浪中，他们鼓励我坚持梦想。没有他们的支持，负笈上海的梦不可能实现。

蔡志鹏

2013年3月25日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 蔡吉鹏 日期： 2012.06.05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复旦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 蔡吉鹏 导师签名： 张 日期： 2012.06.05